

# 换了人间

懲前毖后  
治病救人



# 目录

## 日月奇谈

电影《决裂》：曾经被批判的“大毒草”，今天却成了一座艺术高峰.....	2
子午：《决裂》很好，但双减能实现“决裂”吗？.....	8
联合起来，向资产阶级中学反动教育路线发起全面进攻！.....	15
电影《决裂》开出了“北大空心病”的药方.....	21
爱情、婚姻和事业——左翼青年的人生选择刍议.....	24

## 日月今闻

中国教育改革究竟有利于谁？.....	29
巨震之后，教育能重获新生吗？.....	31
靠“一块屏幕”实现教育公平是谁的幻梦？.....	38
高考：独跃龙门又如何？.....	43
小学课本中的问题，不只是几张图片.....	45

## 日月精英

对教育是生产劳动一说的质疑 —— 关于教育劳动的性质.....	48
调研   在线教育行业工作体验.....	53
千万人的高考背后，教育资源是如何分配的？.....	58
从延安的撤点并校看中国现代教育的世纪争论.....	65

## 日月杂事

学生接连自杀，向“吃人”的教育制度开火！.....	78
结束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救救工人的孩子！.....	84
公平的维度——打击高考移民维护了谁的教育公平？.....	89
素质教育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95
拿什么拯救你，中国职业教育？.....	99

## 日月星长

张春桥 1999 年 3 月 28 日家书.....	120
----------------------------	-----

# 日月奇谈



# 电影《决裂》：曾经被批判的“大毒草”，今天却成了一座艺术高峰

原作者：乌鸦校尉 丰兄

编者：兔十一

在经历短暂的疾风骤雨后，七十年代中国大地逐渐恢复了秩序，文艺界也再次进行创作。在为数不多的作品中，有这样一部电影相当耀眼，也相当富有争议，以至于在上映几年后被贴上“极左”标签，被当做“大毒草”批判，甚至连导演也被禁止不得再拍片，这部影片的名字叫做《决裂》，在1975年公映，尽管它已经过去几十年，其中的价值观也被否定，但在新旧交接的时代展现在国人面前，无疑在背后，也暗藏着一场汹涌的路线交锋。

《决裂》提出了几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教育为什么人服务？谁有权接受教育？

围绕着这些问题，剧情就这样徐徐展开了，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记住三个年代：影片故事发生的年代，影片上映的年代，以及我们观看影片的年代。

故事背景是1958年，波涛汹涌的江面上，抗大出身的垦殖场场长龙国正，站在木筏上，撑着长杆，在湍急的激流中前进，溪流蜿蜒，处处险滩。此番情形，其实是在暗示，接下来的斗争将会异常困难。龙国正此行要去哪呢？去南方小镇鹅城，哦不……是去松山上任，担任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

龙国正衣衫褴褛，脚踩草鞋向老团长报告工作，

老团长笑着问：“又上前线了？”

龙国正立马回答：“刚下火线。”也就是说，未来的工作堪比上前线。

另一边副校长曹仲和领导们正讨论要把新学校建在何处，大家一致决定建在河边，因为风景优美，交通便利而且靠近城市。此时龙校长赶到了，他看大家讨论，于是插进来说就把学校建在山头上，有人反问这不就离城市远了吗？

龙校长笑着回答：“离城市远了，离贫下中农近了。”两拨势力的交锋就此开始了。曹仲尚不清楚新校长的来意，表示不急先跟他耍耍，然后把新校长请到了内屋，茶水相候。

曹仲的态度很简单：难办。他抛出一个招生问题，说缺少经费，缺少校舍，缺少老师，接着抱怨考生质量太差，文化水平很低。他打出一副牌，说自己要去城里招收高质量的学生，龙校长没接这一招，而是说要去招生站亲自看看。

镇招生站外，教育处孙子清，把着大门对报考的群众说：“我们这是大学，不是识字班，得有文凭啊！”考大学嘛，要有资格。

贫下中农气愤的说：“我们跑了一百多里路，把鞋都跑烂了”

“鞋子跑烂了，也怪我吗？山区老乡真不讲道理！”（孙子清）



门外青年怒骂：“他就是资产阶级把门人！”“对！”这句话，实际上已经点出了影片

的主要线索。如果将新大学比作社会的话，那么曹仲就是旧帝国的统治者，而孙子清则是他们的仆役。区别在于，统治者是需要被打倒的，而仆役可以经过改造。这也暗合了共和国的历史，新中国方成立时百废待兴，不得不使用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参与生产。但是让他们甘愿为贫下中农服务，必然是不愿意的。解决办法只有一条，那就是劳动改造。经过劳动改造思想，从而变为新社会人。

龙校长听闻了这些情况，对愤怒的青年农民表示：“既然走不进去，那就打进去嘛。”在龙校长的带领下，一行人打开大门，浩浩荡荡闯进了招生站。

有贫农出身的共青团员上过两年初中，后来在养猪场劳动，想学兽医。

龙校长大手一挥：“小伙子你考上了！”

有人让小伙子给校长敬礼，校长连忙说：“咱可不兴孔老二那一套啊。”

“哈哈哈哈……”（群众）

还有个铁匠铺里的学徒，从小死了娘，只上过一年中学，孙嗤之以鼻，插嘴道：“文化太低啊。”

龙沉思片刻，拿过铁匠的手来，看着那满手的老茧，说：“这就是资格！”

后来在批判这部电影时，这些片段被扣上了反智的帽子。然而只有仔细思考，才能看出里面的意味深长。

龙校长说：“解放刚刚九年，要那么高的文化上共大，实质上是把工农子弟拒之门外！”

这番话背后，龙校长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此时的中国，old money 虽然，但又死灰复燃，与此同时，new money 已经崛起。如果一味按照文化水平来招生，大学里只能是这些新老精英们的后代，贫下中农怎么也买不进这道门槛，而且也违背了革命者的初心。进一步说，孔老二象征的是什​​么，自然是封建儒教和宗法体制。而在当时的中国，更象征资产阶级法权。

龙校长说，不兴这套，其实是指新中国需要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遏制。从理论上说，劳动者翻身为国家主人，无产阶级变成了统治阶级，知识分子应该为他们服务。但是中国毕竟还是太落后了，必须借助资本，借助旧时代的人来进行建设。在这样的情况下，按劳分配就做不到，等级制度仍然客观存在。而就在这一年，一篇名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作者张春桥）的文章发表，人民日报转载时，教员批语：“张的这篇文章基本是正确的。”于是，继续革命时代就轰轰烈烈的到来了……

校址选好了，校长带着学生们，白天劈竹子，拾茅草，建校舍；下午就在溪边游泳，抓鱼，嬉戏，不亦乐乎。旁边有学生拿着国外大学的照片，说这才是大学该有的样子。

龙校长说：“看一个学校的好坏，不能只看有没有高楼大厦，也不能看有没有专家教授，要看这个学校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曹和孙两人是不同意的，又给龙校长出了第二张牌，搞出了一套把全国的名牌大学，甚至外国的好经验，都吸收进来了的教学大纲，还说：大批的工农学生跟不上就自然淘汰，这是个规律。

龙校长提意见表示半工半读，完不成那么多的课程。

曹回应道：“不能降低标准，孔夫子三千弟子，也不过只出了七十二贤人嘛。”

龙校长说：“孔老二，没什么了不起。既不会种田，又不会做工，他培养的学生，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今天我们培养的是无产阶级崭新的一代，绝不是培养几个所谓的尖子就行了。这是方向，但是有一条要牢牢地记住，我们培养的人才，必须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这是精英教育路线和平民教育路线的斗争。遗憾的是，几十年过去，精英教育路线终于占据了社会主导地位。今年年初，天津市津南区某中学班主任称，往届学生家长不是高官就是富商，这届学生都是平民百姓，并教训学生：“你爸妈一个月挣多少钱？别怪我瞧不起你！”恐怕我们对这样的言论早已习惯如常，只是在网络的发酵下，才显得有些刺耳而已。

回答了谁有权接受教育之后，接下来，电影就要讨论：教育为什么人服务？

教室里孙主任正在讲课，他高声讲道：“前几天我给大家讲了马的呼吸系统，马的消化

系统和马的骨骼特点，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马尾巴的功能。”

刚要开始就被门外的牛叫声打断了，一位老大爷说自己是山边生产队的，牛生病了，想请老师来看看。孙主任赶紧让他牵走，老大爷把牛拴好，偷偷摸摸进了教室。

孙主任发现后立马批评：“我们这是大学，不是兽医站，快走吧！”

大爷说：“春耕到了，队里等着用牛，给治治吧。”

孙主任说：“你不要打扰上课。”

这时班上一个叫徐牛崽的同学给老师提意见：“学校是不是准备派我们到内蒙古去养马呢？上课都几个月了，您总是讲马，可我们这马很少。特别是山区，就更没有马，就连这匹既不会叫也不会跳的石膏马，我也是第一次看见。再说您讲的我也听不懂，就更没用了。”

孙主任回应说：“越是听不懂，就说明学问越深呐，那就更应该学了。”于是回到讲台，拿起几张图来演示说：“你们看这是中国的蒙古马，非洲的斑马，世界上各种各样的马，我们都要讲到。”

很快教室外就出现了“少讲马，多讲猪和牛”的大字报。

曹副校长看到后，让徐牛崽把大字报撕掉，徐立马就撕了，却转手又贴上了比那张还要大好几倍的大字报。

正在又要被要求撕掉时，龙校长赶到了，他建起地上的烂谷粒说：“浸种的时候讲收割，收割的时候讲浸种，这不是脱离实际吗？教材的系统性应当适应于生产的季节性，这张大字报，他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呀。”

在后来批判电影时，人们的评语是“不尊重基础教育”显然这个批判有点欲加之罪的意思。

徐牛崽从来没有说过不要讲马，而只是希望多讲猪和牛，因为这是符合当时农业生产实际情况的。再往后深究，这仍然是教育路线的斗争。

我们知道，教员始终认为，课堂学到的东西是有限的。他毕生，都在追求学校与社会打通的梦想。而这自然要靠广大的工农子弟兵来实现。

1957年，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说：“我们高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20%，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

1965年12月，他又在杭州的会议上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其实教员强调，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最重要目的是，消除城市与乡村的差别，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这也是继续革命的一部分。因为与生产相比，教育是第二性的，当它凌驾于生产之上，并形成一個封闭的体系后，就会指向阶级固化，学阀之由来也是如此。

龙校长的无产阶级教育方式，得到了师生们的一致欢迎，但曹副校长却坚决反对，他找到了分管教育的赵副专员。

赵副专员说：“办共大，开始我就不同意，深山沟里办大学，能培养出好人才？现在既然办起来了，就要按我们的样子办。要正规化，那些工农学生赶不上，就让他们回家种地，各尽所能嘛。”“可老龙他……”“我们党内这样的同志不少，他们的脑筋还停留在战争年代，赶不上时代的潮流，我们要和他们作斗争，要改造他们，帮助他们赶上来。”

资产阶级改造无产阶级，资本家要把工人挂路灯，这里到颇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了，赵副专员具体是怎么做的呢，专区正在组织一批共大的负责人，去全国名牌院校参观。他让龙校长带着队，让他开开眼界。

火车奔驰，龙校长出发了。

在一所大学的试验田里，一位学生边拔稻子边拿着放大镜端详，农民伯伯劝他少拔一点，他却说：“比起我们毕业论文来，你这点稻谷算什么？”

在学校里，一位老大娘正在看望他上大学的儿子，他拿着自己亲手缝的衣服、布鞋让儿子穿上，儿子却说：“这么难看的衣服，我们能穿呢？”

老大娘反问：“你在家不也这样穿的吗？”

儿子回答：“我现在是大学生。”

老大娘回想起儿子小时候的情形，泫然流泪，连忙拉着他说：“这书咱不能念了，走，跟我回家。”

儿子不答应，老大娘说：“你临来的时候不是跟乡亲们说过吗，要回去改变家乡的山山水水啊。”

儿子说：“妈，我现在是有知识的人了，怎么能回到那小山沟里去呢？”

大娘难过地说：“你变了。”

窗外的龙校长目睹这一切，大娘反问：“好好的一个孩子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龙校长安慰道：“大娘，别难过，我陪你一起回去。”

回去的轮船上，龙校长在客舱里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披着衣服，来到书桌前，翻开列宁文籍，读到“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教育的奴化。”不禁大受震动。一夜无眠的龙校长清晨来到甲板上，凝望着满天朝霞，恰巧遇到了老友，老友问他此行的收获，他沉重的感慨：“我们党自己办的农业大学，为什么还办在大城市里，远离农村，脱离三大革命斗争的实践！？为什么教育大权至今还把持在那些资产阶级老爷的手里！？他们顽固的推行着一条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

在龙校长的归途中，山边大队的田里都发现了山区很少见的虫子，旷课检查虫情的妇女队长李金凤在夜校学过，知道这种虫是“夜强盗”，昼伏夜出，一夜之间就能把全大队的庄稼都吃掉。她建议当晚采取行动灭虫，但当日队里大部分劳动力都进城运化肥去了，于是他回校请示领导，发动全体同学灭虫。可是校内，学生们正在紧张预备次日专区统一布置下来的，关系到每个学生前途问题的考试。李金凤的要求自然被无情驳回，但同学们都执意要去。经过他们一夜战斗，虫子被通通消灭。

不久赵副专员秘书钱某，带着工作组到松山开展“三自一包”的试点工作，被同学反对。李金凤说：“‘三自一包’就是让我们分田单干，走回头路，这样下去，那不是跟旧社会一样，富的更富，穷的更穷吗？这是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能同意吗？”于是李金凤就被关押了，甚至连共大都被专区撤掉了，直到影片末尾，忽如其来的一封毛主席的来信，高度赞扬了共大说：“同志们，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同的！”欢呼雀跃之际，龙校长的教育路线似乎已经宣告成功了。

真的是这样吗？我们要记住一个时间点，那就是影片上映的年代即 1975 年，此时一段不存在的历史接近尾声，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也开始缓缓落地。旧历史终结，新历史就要开始了。

1976 年 1 月 7 日，人民日报刊登长篇评论文章，《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战歌——评彩色故事影片〈决裂〉》评价：“它通过创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初期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塑造了龙国正这一在教育革命中敢顶风开船、敢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旗帜鲜明、非常适时地参与到教育战线这场大是大非的辩论中来，有力地批驳了教育界的奇怪理论，回击了那股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的右倾翻案风，起到了鼓舞人心的战斗作用。”



而在三年后，1979年1月10日，人民日报再次刊文《一定要肃清<决裂>的流毒》，其中这样说道：“龙国正、李金凤、徐牛崽、江大年之流乱冲乱杀，使学校的教学工作无法正常进行，学校的必要制度遭到极大破坏。这样的人不值得歌颂，而应当抛弃。”

三年前还是无产阶级英雄，三年后就应该抛弃了。只因历史的方向产生了急转，革命被发展代替，斗争逻辑被市场逻辑更换。四十年来，无产阶级人民教师的姿态，早已不复存在。每年的教师节，俨然已经成为了家长送礼献媚的丰收节。在金钱的指挥下，面对来自贫穷的家庭和学生时，某些人自然会不由自主的飞扬跋扈与趾高气昂。据统计，1980年北京八所高校录取新生家庭调查：20%是农民、25%是工人、15%是干部、40%是专业技术人员；到1990年，北京录取新生1.7万人：干部军人子女比例已达78%、工农占比仅为21%。苏联的《真理报》曾以《深刻的知识是进入高等院校的通行证》为题发表文章，制造声势，他们胡说什么：招收生产工人的结果，不仅大大降低了教学的质量，造成了“惊人的淘汰率”，而且实际上，等于拒绝“有才能的青年”入学。

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改革春风中沐浴的年轻人，在功利主义的教育下成长，他们见识了资本主义的新奇玩意和五光十色，也第一次不解：明明“生产过剩”了，为何自己却只有可怜的消费；明明已经“物质极大丰富”了，自己为何却如此匮乏。那些精英子女的后代，从出生那天起就“注册”为世界公民，所谓的奋斗，大抵只是游戏人间的惬意潇洒；而工农的后代们呢，用列宁的话说：“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他们的安宁。”

影片的名字叫《决裂》，这个词来自于《共产党宣言》。第一层含义是说，从私有到公有，必须要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彻底清算；第二层含义则是，要把附着在私有制基础上的那些旧观念进行铲除。



随着前者的失败，后者也就高调复辟了。于是他们可以说“996是福报”“混日子的不是兄弟”，剥削打工人对他们来说像呼吸一样自然。于是官、产、学、媒四大利益集团勾连起来，组成一张前所未有的阶级屏障，压的人喘不过气来。



1958 年影片故事发生的年代，所谓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1975 年影片正式上映的年代，火热的太阳昏昏欲沉，时代的风也停了下来。

如今再看这部电影，仿佛是一个轮回，一切又回来了，一切即将重新开始。

他说：“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要记者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

讲完后，他吸掉手中的烟，站起来说：“看孩子们去！”

所谓的决裂，不仅仅是一种路线上的分道扬镳，更是一种人心上的涅槃觉醒。若干年前，权力下放给人民，却终究因为人心的不成熟，以至于一场革命无疾而终。



踽踽独行，那人走的太远了；蓦然回首，他想要所有人都跟上。由于太急切了，队伍自然便涣散。

斯人已去万事空，一代人未完成的事，自然要交给下一代人，乃至下下一代人。



人心可以被觉醒吗？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太阳依旧会照常升起！

## 子午：《决裂》很好，但双减能实现“决裂”吗？

昨天晚上，“乌鸦校尉”在B站上发布的一则视频引起了笔者很多朋友的关注和讨论。



一位朋友半开玩笑地说，“乌鸦校尉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笔者哑然，大致明白这话的意思。有些人在议论下个月第三份“总结”的事，寄予了太多的期望……如果是这样，笔者只能说，“你想多了……”

“乌鸦校尉”的这则为80年代被当作“大毒草”批判的电影《决裂》正名的影评视频，内容很好；如果说真有什么现实寓意的话，最有可能指向的，恐怕也是当前风风火火的“教改”。

半年以来，新“教改”的文件接连出台，“双减”政策一步步落地成型：今年4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5月，《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出台；6月，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宣布成立，严厉打击校外课业培训，教育资本巨头遭遇连环重创，股价暴跌；7月，“双减”意见正式落地实施……

10月17日，“上海、深圳、成都等12地被设立为教育部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的新闻再度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正式文件还没出来，网络上却先引出了一则谣传，主要意思就是“缩短学制”，“小学四年，初中三年，高中二年”“三分之一以上大学改为蓝领大学……为工业4.0打基础”。各地教育局很快就出来辟谣：



【#成都成为教育部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10月14日，教育部官网公布《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设立教育部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的通知》。根据通知，上海、深圳、成都等12地成为教育部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成都教育局辟谣实验区将缩短学制#**该文件发布后，网络上流传一种说法，称试验区将缩短学制，改为九年义务教育，小学四年，初中三年，高中两年，取消小升初。对此，四川观察记者向成都市教育局相关工作人员核实，网上该说法并非事实。🔗[网页链接](#)（四川观察）

其实作为“过来人”的城镇地区的家长都知道，旧的考试制度就是在摧残学生。但“缩短学制”的谣言并未引发多少家长的赞同，反而引起了恐慌。“缩短学制”的说法与毛主席1968年的“七二一指示”中的说法相近，但毛主席的原话是“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与谣传主要指向的“低龄职业教育”、“让打工人早点工作”的意思并不相同。

对于“双减”的用意，主流的解释大致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降低居民家庭教育开支、减少学童课业负担，如果“双减”真的能有效实施，这两方面的作用的确能达到——在贫富差距巨大、普通百姓家庭债务不断攀升、“六亿人月入不足千元”的背景下，“双减”对于缓解底层民众生存压力，激发育龄人口生育意愿或许是有很大大作用的；另一方面则是与谣传的方向相似，按照某些“大棋派”的说法就是改革不合理的“考试制度”，培养“对社会有用之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蓝领”，振兴实体经济，为工业4.0打基础……

应该说，“双减”至少在形式上跟毛泽东时代的“教育革命”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但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到，二者的时代背景和内容本质已经有了巨大差异，甚至是“天壤之别”，所导向的结果恐怕也会截然不同。

### 毛泽东时代的“教育革命”

而想要厘清二者的差异，还是得从毛泽东时代的“教育革命”以及电影《决裂》说起。（注：本段内容在笔者旧文《毛主席的教育革命：兼顾公平与“素质”》中大致讲过，为了说清楚问题，这里重新讲一遍，看过的朋友可以直接跳过去看下一段）

晚清“科举制”废除以后，现代高考制度逐渐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但解放前主要实行的是高校自主招生考试，教育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均以及民国时期严重的腐败，使得“上大学”成了地主及资产阶级阶层的富家子弟的特权。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新中国开始施行更加体现公平性的全国统一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制度。但是，和1977以来的这四十多年反复议论的问题一样，“一考定终身”的模式很快露出很大弊端。

1953年，北京一位参加高考的考生8门成绩只考了178分，而该生平时成绩还可以，这个问题在当时引发了大讨论：高考的成绩并不能体现考生平时的成绩，更与个人能力没多少关涉，反而导致中小学生的考学负担过重。此后，还出现考生高考成绩不理想，想要跳楼自杀的问题。四川一位家长在考前对学生说，“考取大学，你就穿新衣服上学去，考不取，你就拿着棍子和破锅讨饭去！”

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新中国第一份教育“减负”文件。但是，在所谓的“现代考试制度”之下，学生的负担根本减不下去。当时调查显示，城市学校比农村学校负担重，高年级比低年级负担重，一些高年级学校一周课时比规定超出5-10小时，多的甚至超出24小时。

究其原因，农业人口占据了90%以上的新中国，很多农村家庭的子弟依然希望通过高考进入城市；而城市工人家庭子弟也希望通过高考进一步实现阶层跃升。

毛泽东时代并不是后来所指责的“平均主义”，依然存在三大差别，依然存在“八级工资制”。新社会脱胎于旧社会，“旧的习惯和法权”还在，共产党人一开始也只能迁就现实，但必须以缩小差别为目标，绝不能反过头来去拉大差别。然而，一味迁就的结果却是迁就出一个“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等级制”来，“就不对了”（毛主席1974年语）。

因为客观存在的、短期内还无法彻底消除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知识分子不愿意到农村去、不愿意与工农结合，农村出来的学子也不愿回到农村，其结果就会造成农村教育资源、人才资源与城市进一步拉大，这与社会主义的公平目标是严重背离的，旧的“法权”不断侵蚀着我们的党和新生人民政权。

一方面，旧的教育制度、考试制度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反过来扩大了社会的不平等，并威胁着政权性质，这在毛主席、周总理那一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群体中，是有共识的。

另一方面，对于现存的考试制度能不能培养出社会主义需要的真正的人才，毛主席也是深表质疑的：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

“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

“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

“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见毛主席 1964 年 2 月 13 日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节录）

1966 年 4 月，教育部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很多人对考试制度提出了质疑，毛主席讲道：

“高考把学生当作敌人，公开袭击，定期袭击。高考助长学生死记硬背，不是引导学生活泼主动的发展。高考按平均分数录取，要学生门门功课都好。高考超出中学课程范围，高考出难题，学生家长抱怨。学生紧张，高考每年总有人晕倒，把学生考焦了。家长紧张。老师紧张，全国考生集中在三天考试，如临大敌，气氛紧张。高考三天决定命运，偶然因素大。考生填那么多志愿，只从高校出发，不考虑考生的实际情况！”

这些论述即便放到今天，也完全是切中要害的。

1966 年 6 月 1 日，中央批转了高等教育部党委《关于改进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文件；随后，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的学生给毛主席公开写了一封信，指出现存的升学制度的问题：使许多青年不是为革命而学，是为考大学而钻书堆，不问政治……、“成名”、“成家”、“个人奋斗”、“走白专道路”；使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而造成许多“特殊”、“重点学校”、专收高材生……把大批优秀的工农、革命干部子女排斥在外；对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

在汇集了种种意见之后，教育部宣布：从 1966 年起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然而，由于接下来群众运动形势的影响，教育部推迟招生工作的决定维持的不是半年，而是成了三年；随着大规模群众运动的退潮，恢复招生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1968 年 7 月 22 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运动之后）这个厂的技术人员队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反动技术“权威”被赶下了台，实践证明，从工人中提拔的技术人员比来源于大专院校毕业生的技术人员要强。

由此，调查报告提出了“教育革命的方向”问题，强调学校教育一定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调查报告刊出前，毛主席还为这篇报告的“编者按”亲笔加写了一段说明：

“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

这段话加于刊文的前一天——7 月 21 日。此后，各地相继仿效兴办这类学校，学制有全日制、半工半读、业余等，统称“七·二一大学”。

1970 年，部分高校首先开始以“群众推荐、组织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式，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与之同时，从 1968 年底开始，就有大批知识分子、知识青年下到农村去，大大提升了广大农村地区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基础，大大充实了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

当时高校招生基本的处理原则是：“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儿来哪儿去”，杜绝将升学作为阶层上升、拉开阶层差距的渠道。

断绝了阶层上升的渠道，并不是为了固化阶层；恰恰相反：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城市工厂实行“鞍钢宪法”，工人参与管理；农村兴办“社队企业”，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把农村建得跟城市一样好”——这样的做法，大大加快了三大差别的缩小，离真正的社会主义公平目标越来越近。



1975 年的电影《决裂》其实就是对毛泽东时代的这场“教育革命”浪潮的艺术化阐释。



电影《决裂》里讲，南方农村没有养马，照本宣科的讲“马尾巴的功能”是脱离实际，工农兵大学生真正需要学习的是那些能够满足生产实践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这样的思想被 80 年代的知识精英反复嘲笑，被用以指责毛泽东时代不注重基础教育，教育水平低下……事实上，无论从教师队伍数量、中小学学校数量，还是在校中小学学生数量等关键数据上研判，丝毫得不出“毛泽东时代不重视教育、不重视科技”的结论，反毛精英只好反复搬出关于“臭老九”的谣言、嘲弄电影《决裂》。

毛泽东时代结束以后，专业院校逐步被综合大学替代，简陋的土坯房被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所替代，专业课被大大压缩，“文化素质”课大行其道，生产实践被模拟实验所替代。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林专业的学生在黑板上“造林”、在纸上“育苗”……

不可否认，那个年代的教育主要强调的是偏技术、而非偏基础科学，强调的是实用性和可应用性，但这绝不意味着“低水平”！

1972 年 12 月，美国物理学会的杂志《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刊登了一篇美国科学家代表团到中国参观观感的报道，报道明确指出：“最近美国到中国的参观者发现中国集中于应用物理而不是基础研究，同时尝试使高等教育系统更加民主。”

报道对于当时中国在物理学方面的进步给出了高度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在应用物理的很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是最近 7 个美国物理学家参观中国并且跟我们讨论他们的观察以后得出的结论。他们看到了集成电路生产，受控核聚变实验，超导重力仪，望远镜……各种各样的科学仪器——全部产自中国。”

美国科学家发现：“学生不是在大学接受训练。当学生被录取，他们只接受一年新生的学习。到目前这些学生是在他们的第三年（已经开始科研和生产实践）。学生不再从高中录取，而是必须在公社、工厂或者军队里工作至少两至三年。他们是从同龄人里，按照智力，政治意识和健康的身体挑选出来的，但最终决定权在大学。”“学生们非常关心他们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和中国整体的进步。他们把他们自己的学习当作是他们可以为社会做贡献的方法。”“中国正在使科学训练，比之通常情况，比如美国，更加专业化……中国觉得这种方式可以快速的训练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

另外，参观的美国科学家还发现了一个全社会范围的试图使高等教育系统更加民主化的尝试。教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更加平等、更加友善，“已经没有考试了，而是代之以类似考试的课后作业”，“学生们现在有机会吐苦水，而不是像以前的教学体系那样。”

即便不采信美国科学家的观察，那些对于毛泽东时代耽误了教育、耽误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指责，也根本无法解释毛泽东时代快速工业化的历史事实。没有强大的科研实力和人才培养通道，毛泽东时代又怎么让新中国从解放初落后的农业国，跻身到世界六大工业强国的？

毛主席的教育革命，在培养出真正的社会主义人才的同时，又促进了教育的均等化和社会的平等化，与之同时却阻断了掌握更多资源的精英将阶层优势进行代际传播，因而才遭遇了大量的误解和诋毁。

### “双减”所引发的家长焦虑

上面说到，毛泽东时代后期高校招生基本的处理原则是：“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儿来哪儿去”，杜绝将升学作为阶层上升、拉开阶层差距的渠道。大量的青年人才涌入广大农村和工厂，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进步，与之同知也在一步步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脑差别。

目前的“双减”以及新教改的方向在某些形式上应该说与毛泽东时代的“教育革命”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但“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道理大家都懂，这也是明明可以节约家庭教育开支的“双减”反而引起很多家长“焦虑”的根本原因。

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毛泽东时代实行的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工农阶层是社会的主人，社会相对平等；免费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社会福利解决了劳动者的后顾之忧。

这些前提在今天早已不复存在了。且不说阶层固化之后老板与雇员之间不可逾越的阶级鸿沟，“白领”与“蓝领”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别和阶层歧视的；城市化过程中城乡差距事实上在进一步拉大，农业资本的扩张使得作为职业的农民逐步沦落到农业无产者的地位。

人们通常的印象是职业学校培养的是“蓝领”，而高等学府培养的是“白领”。而劳动者之间本来应该是平等的，无论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蓝领还是白领，所以，职业学校的存在从面向社会需求和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角度来讲是必要的。

从社会工作岗位的实际需求来讲，我们的确不需要那么多的本科生、硕士生甚至是博士、博士后。前几天，“985名校研究生开摩的”的新闻又引发了热议，还有此前的北大、清华以及海归博士到深圳当小学教师的新闻，这的确是对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



然而，资本对人的异化不仅造成了阶级压迫和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在无产阶级内部同样造成了阶层的分化，从而造成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蓝领与白领之间的实质不平等，并且借着这样的不平等塑造出一整套“奋斗成功学”的价值观和“鄙视链”，将无产阶级分化成各自对立的群里。在考试机器的筛选机制下，成绩好的就进正规大学、上升为所谓的白领阶层，成绩差的就进职校、下降为蓝领阶层，即廉价劳工。

尽管在阶层固化的背景下，“教育改变命运”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但从统计学意义上讲，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收入状况普遍高于只接受过义务教育以及接受过“职业教育”的

群体。名校毕业生就算当“保姆”工资也远远高于普通的“保姆”，深圳的中小学教师工资比二三四线城市教师工资也要高出很多。

从社会心理上讲，那些好不容易通过“高考”跳出农门成为城市白领的“新市民”，能坦然接受自己的子女成为“蓝领工人”的阶层下落吗？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按照现在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以及劳动者内部不平等的巨大程度，“蓝领工人”能够负担得起不断高涨的城市房价以及不断上升的衣食住行成本吗？

而另一个现实的问题上，目前的“职业教育”资本化程度比较高，管理松散、师资力量薄弱，送进去的孩子非但学不到真本领，反而“惯”出很多不良习气；很多职业学校更是直接堕落成了“学生工贩子”，把大批的职业学校学生送到血汗工厂当廉价劳动力；某些地方更是已经允许企业直接开办职业学校，招收劳动力后备军……

在这样的背景下，“双减”对于广大家长来说就成了给子女的命运“开盲盒”：小学及初中阶段不许公布学生分数及排名，然后在“中考”之后，突然有一半的学生要被分流到“职业学校”……家长们能不焦虑吗？

为了应对“双减”，种种奇葩的现象就出来了：顶级富人们打着聘请“高端保姆”或“家政工”的名义，以天价年薪招收“住家家教”、一对一辅导；一些中产精英配合培训老师打起了“游击战”，悄悄安排课业培训；而另一些中产精英为了防止不公平竞争，则扮演起了“朝阳大妈”的角色，掀起了“举报潮”……

## 教育“贵族化”？中产鸡娃不停，住家家教月入3万，要求“见过世面”



证券之星

10-17 11:53

证券之星官方帐号,优质财经...

关注

本文来源：时代财经 作者：徐晓倩



前几天在上海建平中学西校还发生了一件“新闻”，开学后学校进行了一次“月考”，这遭到了部分家长的举报：要求学校取消“月考”和“分班”，要求学校严格执行国家“双减”政策。此举也引发了该校另一批家长的强烈反对。

笔者认为，对电影《决裂》以及毛泽东时代的“教育革命”有所借鉴的“双减”及“新教改”的初衷及大方向都是正确的；笔者同样是所谓的“新市民”，同样是两个小孩的家长，笔者对这项政策举双手赞成。

但是，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从来都是社会不平等的结果，教育“内卷”从来都是社会“内卷”的结果。不改变生产资料的私有占有所导致的贫富不均和社会“内卷”，恐怕无法单纯地消除教育领域的“内卷”，富人的子弟除了可以请住家家教，还可以选择读私立的贵族学校，甚至可以把小孩送出国，照样赢在起跑线上。“中产”要想子女“抢跑”就要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其所带来的金字塔式的分化亦将更加明显，被抹平的顶多是下层“中产”以及整个下层；在贫富差别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职业教育的普及顶多让下层子弟不再有阶层上升的“奢望”，铸造“信息茧房”，对于该变“阶层固化”的现状，不会有太大帮助。

这一切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不简单是让家长“转变观念”的问题。

“决裂”整个电影的名字取的很好。《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同“传统的观念”“决裂”的根本，在于“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 联合起来，向资产阶级中学反动教育路线发起全面进攻！

作者/乌有之乡@赤燕  
集/Venti@red-venti.xyz

---

摘要：我们必须挣脱这一禁锢我们双手、禁锢我们大脑的锁链。同学们，联合起来！发起这一具体体现在中学，也体现在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的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的全面进攻，让一切具有压迫性的旧制度早日被历史前件的巨轮碾个粉碎！

---

马克思：“正如阶级的所有制的终止在资产者看来是生产本身的终止一样，阶级的教育的终止在他们看来就等于一切教育的终止。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

列宁：“旧学校是死读书的学校，它迫使人们学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的知识，这种知识塞满了青年一代的头脑，把他们变成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官吏。”

毛主席：“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么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 ——序

这些天，XX 中学那“干净、卫生”又“便宜”的饭堂卖出的宵夜里出现的一只小蟑螂可吓坏了不少人，但是，被吓到的不是吃宵夜的学生，而是学校里那一批带着什么“主任”啊，什么“长”啊一类官衔的官僚们。这些官僚们、“领导”们第一时间想的不是怎么解决问题，而是想到该解决一下提出问题的人。那一只小小的蟑螂吓得气冲冲的官僚们赶紧迈开“一身正气”的步伐，要找学生们“问个清楚”。可是，我们的同学做了什么，他们不过是用最合理的方法公布着事实，这一方法不仅合理，还合法，合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法权呢。官僚们却不管这么多，毕竟对于他们来说，你学生只是吃到蟑螂，可我们搞不好得丢了“乌纱帽”呀。“你家没有蟑螂吗？”请问你饭里面有蟑螂吗？“饭菜里吃出发和蟑螂不是很正常吗？”请问你们这些吃专属饭菜的庸人们难道天天吃蟑螂饭吗？“发布未经核实的照片。”请问你发布的这句话经我们同学们核实了吗？他们的丑态顿时布满了整个 XX 中学校园。

若不是同学们的坚持和努力，相信这群上位者们依然是轻描淡写的处理，将这件事像解决以往不少问题一样，以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为终止。XX 中学的官僚们不过是在“两权其害取其轻”的精致利己主义思想指导下，扭扭捏捏的向他们的上级汇了报，“自罚三杯”，便认为这件事就应该这样“结束”了。他们不会也不愿意去思考这件小事背后的原因，这样一来，尽管在这件事上学生们似乎“胜利”了一点，但类似的事情终究会重复发生。

我们不是怕三怕四的官僚，我们得思考的是，这一幕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原因，而我们要如何去解决。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一个资本家只有在自己更便宜地出卖商品的情况下，才能把另一个资本家逐出战场，并占有他的资本。”那么当价格保持一定时，只有尽可能压低生产成本才能赚更多黑心钱。学校外包的饭堂无非是减少食材管理进而减少成本，通过劣质食材谋取更多利润罢了，学校的官僚们不敢朝外包企业宣战，不敢向自己的政策宣战，那么也就只能朝着提出问题的学生宣战了。学校商品化、教育商业化，是这一起不大的事件背后的原因，不过深究起来，学校商品化只是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导致的必然结果之一，

XX 中学发生的这些侵害学生权利的事情之间的联系不是孤立的、单一的，而是普遍的。当我们用联系的眼光看问题时，便会发现正是这一条反动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不仅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蟑螂事件”，而且还是同学们学习时间越来越长、自由时间越来越少、作业越来越多、考试越来越密、一天中最有精力自由思考的时间被超长课时无情剥夺，乃至活跃与充满创新的大脑被堆积如山、无休无止的作业考试所钳制，人生最宝贵的青春时光被浪费在了这一种无意义的单一重复思考枷锁的禁锢之中。这一条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的背后，则是无休止的社会“内卷”，底层劳动人民的哀鸣与彻底奴役劳动人民、禁锢一切进步思想的血迹淋淋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

## 一、XX 中学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存在的社会基础与社会条件

一定时期的社会政策、路线根植于一定的社会基础与社会条件，而不是凭空出现又凭空消失的。以延长课时、频繁考试、严厉管控与无情打击为典型代表的 XX 中学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存在的社会原因是复杂的，但又大致可以归纳为这三点：私有制造成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阶级的存在与阶级固化加强的趋势；私有制生产关系造就的资本主义乃至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流毒。

私有制造成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在教育商品化、知识商品化与学校商品化的浪潮下，基于私有制原则而诞生的私立学校纷纷建立，它们的存在条件决定了它们选择立足城市，这造成了教育资源的地域性分配不平衡；而它们的经济条件又决定了它们能以更多的金钱、工资吸引更好的教育资源，这造成了教育资源的纵向分配不平衡。同时，私有制条件下公共教育资源投入也会不平衡，这是由私有制条件下社会的不平衡发展导致的，自由市场原则下的资本只会将资源投入到能赚取利润的地方而不是资源真正被需要的地方。这种社会的不平衡发展导致了公共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平衡。

来看看这组数据：2020 年 GD 省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达 3537.82 亿元，而仅仅是 GZ 市便占据了七分之一，高达 558.93 亿元，ZSJ 其他城市紧随其后。但与 GZ、FS 等大城市相隔不远的 SG 仅 60.14 亿元，这是何等的分配不平衡！私立学校在良好教育资源的基础上，再施加学生以严厉的教学纪律便使得这一类学校更具竞争力。且不说位于乡村，教学资源稀少的公立学校了，就算是城市里拥有着丰富教学资源的公立学校也不得不染上这一习气，否则，当升学率低于一定标准，竞争不过其他学校时，掌管学校的官僚们的“乌纱帽”可就不保了，这使得 XX 中学的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必然存在。

阶级的存在与阶级固化加强的趋势：私有制条件下必然导致阶级的产生。在工业时代及后工业时代，一部分人掌握生产资料，如机器、工厂等，另一部分人没有掌握生产资料而不得不为第一部分人工作谋生，正如恩格斯所说：“无产阶级是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这就是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像其它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动的影响。”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这句话是对当今社会的工人阶级生活的生动写照。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掌握大量社会资源的资产阶级享受着最好的生活，无产阶级只有每天辛勤为资本家工作才配维持生命，夹缝中生存的小资产阶级则眼巴巴地望着资产阶级，又生怕自己掉入无产阶级的队伍里，因而努力地攀附着。

资产阶级享受着最好的教育，就读着最好最贵的国际学校以便继承“家业”，而其他阶级如果想过上好日子只得让自己跻身资产阶级行列，可是他们没有所谓的“家业”，怎么办呢？那他们只好努力钻研“考试”这门学问，以便将来“飞黄腾达”。然而资产阶级早就垄断了教育资源乃至其他的社会资源，其他阶级是怎么“卷”也“卷”不过这些公子小姐的，这便使“唯一”能够“阶级跨越”的道路被封死了，阶级日益固化。继而，被固化的阶级只

能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哀嚎着，只有那些早已成为资产阶级的奴才们才会享受这一种恶性循环，并以之为自己的“荣誉”，妄想着自己也能有把劳动人民踩在脚下的一天，成为金字塔顶端的“猎食者”。

“可这就是事实啊，我们就应该努力啊？”

看，这就是那些充满奴性的声音。他们不去思考这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为什么存在，不去思考这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合不合理，完全丧失了分析能力，实际上当着统治者的奴仆与看家狗，向着底层劳动人民狂吠、维护着剥削制度与阶级社会的“合理性”。

这种阶级固化与“内卷”的恶性循环便是 XX 中学的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存在的又一原因。

资本主义乃至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的流毒：列宁指出：“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我们，一切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那么作为统治思想传播机器的学校自然也充斥着统治阶级的思想。

听听那些“学习改变命运”、“学而优则仕”的声音，封建社会读书人的座右铭反而成为当下不少同学、老师的理想，这种“理想”光环下遮盖住的反话——“命运无法改变，只能屈从命运”的阴影却在这种思想的信奉者身上不断地自我应验。这种思想其实是相信人们可以通过个人奋斗改变个人命运的个人主义思想，它使某些同学相信 XX 中学是个“大救星”，只要个人去服从老师、学校的安排就能获得“成功”，因而，无论 XX 中学有多么恶劣的行为，总有人为之辩护，就像古埃及食不果腹的奴才，看到主人的金字塔也会心生“荣耀”，听到主人被“攻击、污蔑”，便会第一个站起来为自己的主子辩护一样。这种个人主义思想强调个人奋斗而掩盖了阶级的存在与阶级矛盾，使得某些人看不到阶级，总想分得资产阶级的一杯羹。这种思想流毒的蔓延，也是 XX 中学的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存在的思想基础。

## 二、XX 中学在鼓吹什么迂腐谬论

### 社会达尔文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在近现代社会的变种，它是对创造世界财富的劳动人民的公开歧视，它强调“残酷竞争”、“适者生存”，它和个人主义一样，认为只要“奋斗”就能“成功”，而一切高高在上的“成功”人士都是值得尊敬的，因为这是他们“奋斗”的结果。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是在默许残酷的弱肉强食，维护等级制度、剥削制度、剥削社会和不平等的合理性，一句话，便是“剥削有理”。

“你看看饭堂那些清洁卫生的阿姨，你看她们每天那么辛苦才赚多少钱，但是我想告诉你，这就是现实。你们不想成为那样的人，你们就只能好好学习了！”这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货色。在 XX 中学，不少同学时刻都能听见这种言论。没错，这就是“现实”，它是“现实”的一部分而不是“现实”的全貌，那么工人阶级是创造财富的主要阶级是不是“现实”呢？她们的大部分劳动成果被资产阶级剥夺以至于“每天那么辛苦才赚多少钱”是不是“现实”呢？说这种话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高高在上鄙视劳动人民的事实又是不是“现实”呢？好一个“只能好好学习”，有些人“只能好好学习”才能勉勉强强保持一个相对“体面”的工作，可是那些“企业家”、官员们的公子小姐呢，似乎不用“学习”过得也能比“饭堂那些清洁卫生的阿姨”过得好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双标丑态已然完全暴露。

## “努力就能成功”的个人主义

“学习改变命运”的老话同学们不知听过多少遍了，“态度决定一切”甚至有次还赫然印在答题卡上。请问“命运”存在吗？“态度”是上帝吗？“苦头婆心”地跟我们说着这些的老师往往展现出一副惊人的老成与世道，这种老成与世道和他们奥斯卡影帝般的表演结合在一起，俨然一副“大贤者”、“大学问家”的样子。但掩盖在这层薄薄的面纱之后的是什么呢？无非是以实现个人目标为理想的个人主义，以自我成功为目标的利己主义。遵循着这种“指示”的学生自然“无可挑剔”、“十分合理”了，毕竟他们也俨然成为个人主义的样板，任何事的一切动机都是利己。他们没有看到，这样的“利己”实为害己，一切仿佛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动机实际上成为他们思想上的一道枷锁，让他们的头脑无法摆脱这一道异化的阴影，无法真正的发展他们自己的全部才能。这就是XX中学所宣称的“努力论”的全部内容。

## 服从“秩序”的奴隶主义

生活在法西斯集中营似的学校里，“服从纪律”、“严格按照要求”、“无规矩不成方圆”的咆哮我们也听过不少了。作为XX中学的“秩序人物”，这种秩序、规定、纪律自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且这种秩序、规定、纪律还得是永恒的，否则，一切不就“乱套”了？当这些“秩序人物”举起“违纪处分”的大棒时有没有想过自己就违反过无数次这些规章制度。按照“秩序人物”的观点，秩序是写在纸上的只能经过符合秩序的程序才能进行更正的“神圣文字”，可这些人有没有想过，高一开学时发的载有“正式”规章制度的小红本里的文字有没有真正实行过？明文写在纸上的作息时间有没有真正实行过？同学们的自习时间、晚修开始时间可并不是按照纸上的制度而是按照“秩序人物”口中的东西规定的。只要说晚修几点开始，就几点开始；自习什么时候结束，就什么时候结束。“秩序人物”口中违纪的人恐怕是自己吧！同学们“违纪”时便要处分，自己随意更改纪律却不用处分，那么这种纪律实则不要也罢。“你们怎么能违反纪律呢？”可你也违反了纪律呀。一百五十一年前的巴黎市民们不就违反了“共和国”的“纪律”吗？沙俄时代的工人不就违反了沙皇的“纪律”吗？奴隶主们也说奴隶社会的秩序、规定、纪律是不可动摇的；封建帝王也说封建社会的秩序、规定、纪律是万世一统的；俄国资产阶级也对圣彼得堡的工人说这种雇佣关系的秩序、规定、纪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可历史告诉了我们他们的结局。当规定可以朝令夕改时，它就失去了意义，要求我们奴隶般服从纪律维持秩序，正如同向埃及的奴隶说“只要遵守纪律，你也能拥有一座自己的金字塔”般荒谬绝伦。

## 三、XX中学学生的风气

在这么一种社会风气的诱导与反动教育路线的灌输下，一部分同学听信了官僚们的教唆，信奉那一套“努力论”，以至于在XX中学不时能听见一些歧视劳动人民、歧视工人、赞叹剥削阶级、渴望成为剥削者的声音，甚至能听到某些对马克思主义的嘲笑、对社会主义的讽刺。殊不知，这一理论正是他们冲破压迫，消灭剥削，开创一个让“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新社会的锐利思想武器。

而另一些人则在严密的管控中找乐子，在“内卷”中“躺平”。

“内卷”与“躺平”是辩证统一的，那些实行着严厉压制学生的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的老师与“领导”、官僚们没想到的是，正是他们提倡的“内卷”才造就另一些人的“躺



平”，像是资产阶级造就了他们的掘墓人无产者一样，这群官僚的政策也造就了他们最不愿看到的“躺平人”，矛盾就是这样对立统一着的。

但是，我们同学们中的大多数仍是好的，只是在这么一种压抑的环境中或多或少的听信了那么一些谣言；我们的同学还是有青年的朝气与斗争精神的，大多数人在面临自身权利被侵犯时，依然有奋起反抗的觉悟，毕竟，我们年轻一代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我们才是这个世界的未来。

只有那极少部分的同学，完全深信不疑社会达尔文主义、“努力论”的谎言，变成麻木的翻书机器，听着枯燥的废话，一味地服从属于上位者的老师、学校的命令，成为了资产阶级教育出来的以赚钱盈利为人生哲学的统治者忠诚的奴仆，成为剥削制度的忠实拥趸，“骄傲”地对着劳动人民说“只要努力，你也能这样。”他们或许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但他们却无法真正的从这整个社会中毕业，无法真正的成为自己的主人。

## 四、XX 中学的老师、官僚与政策

XX 中学的老师只是官僚们反动的教育路线的执行者，他们中的一部分对学生仍有一丝关怀，成为官僚政策与学生之间的“调和者”，甚至有些老师还能成为学生们的同情者，真正深入同学之中。但另一部分老师却彻底沦为官僚们的帮凶刽子手，对同学们“毫不留情”、“无情打击”。他们实际上是只为个人名利的法西斯帮凶。

XX 中学的“领导”，也即官僚们则用自身实践践行着官僚主义的含义。他们机械呆板地执行无谓的政策，比如那些令同学们苦不堪言的停餐制度、粗暴的干预学生的课外活动时间，但在维护自身利益时却又“手段灵活”、“迅猛快捷”，一只小小的蟑螂便让官僚们吓破了胆，马不停蹄的去找出那些提出问题的人，开除只是普通劳动群众的饭堂阿姨，对自己的反思也不过是“自罚三杯”。

他们似乎永远无法彻底反思，不然“乌纱帽”都丢了，还怎么“赚钱”、怎么生活呀。

“九天之上”的官僚们一方面歧视着“九地之下”的劳动群众，一方面却又在出事时立马将“九地之下”的劳动群众当作自己的挡箭牌。某些官僚甚至认为劳动人民拒绝“996”是反动的呢！毕竟在他看来，007 才是“进步”的，才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

这就是 XX 中学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的实质，它维护着官僚们的利益，维护着官僚们背后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掩盖着官商勾结的黑幕，还涂上了一层“关爱学生”的“温情”油漆。官僚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代表了社会上一小撮人的利益，在实际上压制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 结论

在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际，毛主席写到：“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 XX 中学的行政楼也写着类似的文字，然而在“太阳”落下后的黑夜，吸血鬼的魔爪伸向了曾被灿烂阳光照耀的土地，这种“标准提法”成为了官僚们装门面的一层“温情面纱”，实际上以“教育者”自居的官僚们无时无刻不在践行着那套站在“标准提法”对立面的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

XX 中学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是我们在学校遭受压迫的原因，但它仅仅是这个畸形社会所造就的畸形教育，它在实质上反映着这个社会真正的统治者的意志。当然，它是也只能是—定社会历史所造就的产物，它根植于私有制条件下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支配的社会中，也必然随着私有制的彻底灭亡而灭亡。

我们是 XX 中学的学生，XX 中学承载着我们成长的一部分，但 XX 中学存在的黑暗面却在事实上压抑着我们每个人的真正发展，因此，真正热爱 XX 中学的人一定是毫不犹豫揭露 XX 中学黑暗面的人，是希望 XX 中学能真正成为实践正确教育路线的学校的人，是希望 XX 中学能真正成为让每个人的潜能得到充分发展的舞台的人。

我们要做的，正是自下而上的全面揭露 XX 中学的黑暗面，让那一条反动教育黑线彻底灭亡！

我们青年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我们青年是未来世界的主人，为了开创一个不受压迫的新世界，为了让历史大踏步地向前进，我们必须挣脱这一禁锢我们双手、禁锢我们大脑的锁链。同学们，联合起来！发起对这一条具体体现在 XX 中学，也具体体现在全国各地，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的全面进攻，让一切具有压迫性的旧制度早日被历史前进的巨轮碾个粉碎！

胜利必将属于我们！

## 电影《决裂》开出了“北大空心病”的药方

“不要问篝火该不该燃烧，先问寒冷黑暗还在不在；  
不要问子弹该不该上膛，先问压迫和剥削还在不在；  
不要问正义的事业有没有明天，先问人间不平今天还在不在。”

教育确实病了，而且病由已久，病入膏肓，从小学到大学，一路病到失业。校园暴力、学生跳楼、叫兽性侵、学术造假层出不穷，直至近期所曝北大四成新生患“空心病”觉得生活没意义及名校骄子感叹身在 985、211 却一无所有，不能实现阶级的上升。这一切告诉我们：“高考”的致幻剂开始失效，我们撕掉那温情脉脉的面纱，用“一塌糊涂”来形容我国的教育毫不为过！



可是总有人逃避现实而诉诸精神鸦片。明明就是让人痛苦不堪的填鸭式扼杀，可是总有人泼鸡汤说这种“人造的苦难”是人生的财富；明明是用一套新自由主义学说在给青年人洗脑，将人异化为人力资本随即抛向市场进行贱卖，可是总有人在糟糕透顶的大学教育中挑一些非大学特征来慰藉自己的青春——读大学我毕竟认识了一群朋友。难道其他地方就没有友谊天长地久？明明是受害者，却要为杀戮者唱赞歌，把人民对当今教育的“批评”曲解为“抱怨”，并以一副技术官僚的姿态唱到：“你有本事改变吗，没本事就接受！你有更好的方案吗？没有就闭嘴！”这种论调并没有显得他有多么伟大，恰恰揭示了教育的阶级性——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

教育绝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更不是拿出一个单维度的教育方案就能迎刃而解，一定社会的教育总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决定的，因此“如汝要诗成，功夫在诗外”。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社会制度，决定着不同的教育目的、教育方针、教育内容和方法，而占统治地位的教育总是统治阶级的教育。教育的阶级性也很容易区分出来：贵族学校、重点学校（能买得起市中心天价学区房人的子女能上的学校）是一种阶级的教育；民工子弟学校、农村学校、代课教师都不能保证的学校显然是另一个阶级的教育。

《决裂》这部电影本质上反映的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教育路线的斗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教育路线发生了 180 度的华丽大转身。小学、中学自不待言，大学的变化更大。专业院校被综合大学替代，简陋的土坯房被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所替代，专业课被大大压

缩，“文化素质”课大行其道，生产实践被模拟实验所替代。可悲的是林专业的学生在黑板上“造林”、在纸上“育苗”。“马尾巴的功能”式的资产阶级教育怎能让学生不得空心病？离开了实践的假理论，伪科学如何让学生感到人生的意义？



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學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劳动。

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么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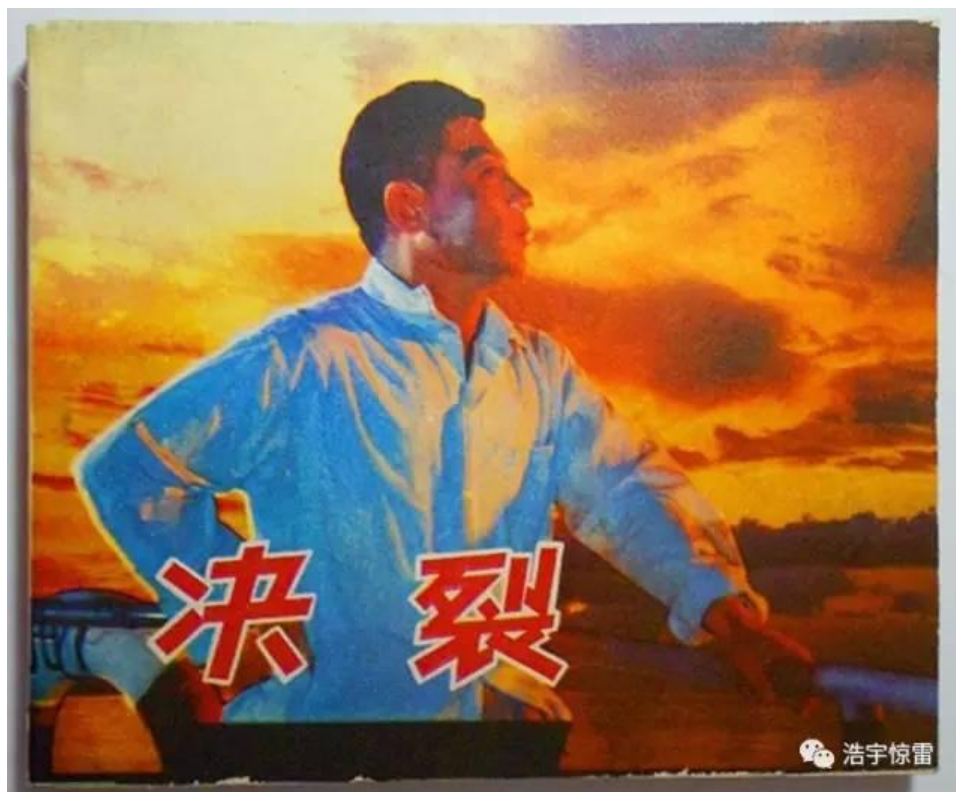
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选自《毛泽东论教育革命》）





### 高考集中营

我们生活在这个原子化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不仅“身体被掏空”，而且灵魂也会有——一种深深地被抽离感。一方面看不到向上流动的希望，失去了“定一个小目标”的期待和激励；另一个方面赖以维生的工作又只是给别人赚钱的“异化劳动”，自己无法从中收获劳动的意义和价值感。于是无追求、无意义，整天漫无目的地刷微信和朋友圈，以至于北大四成学生都“空心病”了。现在忽然可以理解鲁迅先生当年留学日本时的“弃医从文”了：病，是时代病，需要治时代；时代不治，光让身体健全，病是不能好的；是时候治一治时代了！



谁是“时代病”的始作俑者？而谁又是阻止我们治病的背后力量？这才是问题的关键。面对不公，难道我们要做替人圆谎代人受罪的应声虫吗？这不是我们的态度。我们闭嘴就能改变糟糕的教育？我们闭嘴就能消除两极分化？让我们闭嘴就能阻止屠杀和战争？我想你真的理解错了，面对操蛋的人生，我这不是在抱怨，我这是在抨击，只在批判，是在骂始作俑者和助纣为虐者！诚然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我们决不能忽略笔刀的作用。如果我们的呐喊惊搅你的美梦，稀释了你体内的麻醉剂，那么请站起来将燃烧怒火的目光对准真正的刽子手，和它们决裂吧！

文 / 李南 迅行



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恶化和内卷加剧，倾心于马克思主义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此时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摆在这批新生的左翼青年面前，那就是如何面对自己的恋爱和婚姻。

人是社会的动物，与对象交往是其中的一部分。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左翼青年热衷于线上交流，在网络上寻找存在感，在现实中和他人的交集很少。现实的交流在大多数时候都是构建更为紧密人际联系的基础，把交际重心放在线上自然很难有机会与他人接触，更不用说恋爱了。但也有很多左翼青年开始在现实社会中开展工作，随着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和人接触的机会以及恋爱的可能性也会增加。

对于社会经验还不够丰富的左翼青年而言，恋爱关系是令人无所适从的。究竟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它呢？不同的阶段需要有不同的态度。

恋爱的初期是两个人互相熟悉至浓情蜜意的阶段，这时候最容易出现也最需要避免的情绪是过分的自得。在恋爱的初期，面对朋友的祝福和支持，还有两人情感关系的升温，保持一颗平常的心态尤为重要，否则很难面对即将面对的严峻挑战。现在大量年轻同志长期单身，恋爱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会被视为成功，性关系更是经常被作为炫耀的资本。在过去的十几年二十年里，左翼中不乏有影响力的人士借助自身的学识和组织里面的地位导致情感状况混乱的，这需要引以为戒。

随后就是恋爱关系里最严峻的一段时期了，随着双方的互相熟悉，三观的冲突逐渐浮出水面，这种冲突对于左翼青年来说更加剧烈。目前来讲，左翼青年想要追寻的东西和社会主流价值观定义的个人成功几乎背道而驰，如果说恋爱双方志同道合情况还会好些，如果不是，左翼青年会面对的最坏的状况是对方之前没有经过这方面的理论学习或社会实践（毒打），根本无法理解你的思路和立场。“确实有很多人过得不好，可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确实现实有各种问题，但为什么非得是我们来解决？”这是最容易遇到的诘问。有朋友去工业区打工实践，可他（她）的对象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最后俩人只能告吹。哪怕是俩人都已经走出校园，感受到生活的艰辛了，没有科学世界观武装的伴侣也会更容易把生活的不易归咎于自身选择错误或者努力不够，难以认同是社会大环境存在问题。他们或许会把换个职业，换个城市生活作为自己的救命稻草，寄希望于这样生活能够变好。

世界观的不同让双方难以在对社会的认知上达到一致，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不同让双方难以在生活目标乃至生活重心上达成一致，左翼青年中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而且，就目前现状而言，想要完全说服对方是非常困难的。虽然社会整体上经济危机早已出现，从数据来看财政赤字、房地产泡沫等问题也已相当严重；但就社会大多数人而言，日子还未绝望到一点盼头都没有，仿佛只要选择正确再加上多努力一点，生活仍旧能有改观。对现有路径绝望的预言和对激烈变革的向往在一个长期安稳的社会总是不那么讨喜的，即便这种安稳正在缓慢而持续地流逝。理论的分析往往换来的是“你现在没法证实”，摆数据往往换来“那日子总得过吧”。如果既要维持恋爱关系，又要坚持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长期的争论是难免的，而且很有可能在数月和数年中，争论都无法有任何的结果。长此以往，两种情绪很容易出现，一种是对恋爱关系的怀疑，怀疑自己当时为什么要谈一场恋爱；一种是对自身能力和思想的怀疑，怀疑自己为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都无法让另一个人接受自己看起来如此显而易见的道理，这样又如何让更多地人信服左翼的道路呢？

对自身能力和思想的怀疑并无必要，目前社会发展的方向还没有那么地显而易见，追求个人意义上的成功的仍是社会的大多数。无法在短时间内说服不代表着不能持续地对其思想进行影响。对当前恋爱关系的怀疑是必要的，它能够帮助我们判断现在的恋情是不是确实事不可为。但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下，它不应发展到因噎废食的地步，即拒绝一切的恋爱关系的地步，因为这实质上是一种逃避。在将来，左翼青年终归是要去做通社会大多数群众的思想工作的，再没有比两个人的恋爱关系更好的场合了。

1920年代，共产党人恽代英在编辑《中国青年》杂志时，曾遇到名为“立木”的年轻人提出与今天类似的困惑，他说：

“代英：我几年来饱尝婚姻的痛苦！几次提及离婚；终没有达到目的。现在我已觉悟在旧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推翻以前，婚姻问题是不能解决的；惟有牺牲一切，为革命而奋斗，才能解放自己，解放人类。然有人对我说：‘你的妻子虽不好，你应当加以改造，若你对于自己的妻子都不能改造，还配说什么改造社会？’这些话听起来很有理由，但我与我的妻子，已完全没有爱情，我不独不喜欢与她见面，就使远远听到她说话的声音，也觉得讨厌，这样还说什么改造呢？我希望你对于我这件事加以详细的批评和指示！”

恽代英的回信简洁有力地提供了一个方案：

“立木：这个问题是很简单的。我们要宣传一切的人使赞助革命，以根本打破现在这种违反人性的社会制度，而消弭一切由此种社会制度所产生的罪恶痛苦。我们要对于比较易于接受革命宣传的人去努力宣传，不能专门和那绝对不能接受革命宣传的人厮混，虚耗了我们的精力时间。**你的妻子亦不过是我们所应当宣传的人中间一个人而已，而且对她的宣传事业，在革命运动上面还没有对一般学生农工群众的宣传重要，所以即便不能改造她，并不见得即便不应努力改造社会。**古人所谓‘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这是封建时代以家庭为中心的思想，其实说到非改造寡妻，决不能改造兄弟，非改造兄弟决不能改造家邦，任何人亦说不出一点道理来。”

或许经过长期的努力，你依旧没有办法说服对方。但是，在现在的社会亦很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在俩人走出校门，如牛马般工作几个月后，对方亦开始吐槽起自己的工作单位，自己的上司。这时，即便他（或她）没有这么快把思想转变过来，仍旧认为自己的苦难是职业或者生活城市选择的问题。但这时，想要在对方心中升起一丝对劳动者整体的共情，对你所做的事情多一分理解包容，亦会比之前更容易一些。在现在的工作单位中，又哪里会缺不把人当人使的老板和领导呢？

如果一段恋爱关系顺利维持了下去，那么结婚就是下一步需要面对的考验了。我们的父辈们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时代和我们不同，也因为他们对我们的关心，所以更为期待我们能够安安稳稳地通过努力过上好日子，他们的思想也更为传统保守，更为顽固而不可改变。在单身或者是恋爱时期，往往只有自己的父母给自己造成影响，一旦走上婚姻，对方的父母也会牵扯进来。在大多数时候也不用指望他们会比自己的父母更加开明。在婚姻的过程中，有很多东西容易形成矛盾点。彩礼、首饰、婚礼中的种种陋习……有很多在新时代左翼青年看来是封建糟粕的东西，往往是父辈们所坚持的。这时候，如果男女双方能够统一战线，糊弄过去还比较容易；如果对方也没特别认同进步的立场，这些压力就需要自己扛着，也考验着左翼青年处理多方关系的能力。

结婚之后马上就会开始面对生活的更多重压，包括给家庭找个合适的住所，生育、抚养小孩等等。大量的时间精力会被投入到工作和生活之中，开展理论学习和社会工作的精力就会减少。有人会说，如果是这样，那干脆不要恋爱，不要结婚，不是会有更多的精力可以放在自己的理想当中了么？这并不正确。**个人如果是实践之后经过深思熟虑，最终选择为了做更多的事情不再恋爱，不再结婚，这没有问题。但直接因为畏难而选择不去面对恋爱和婚姻，这本质上还是一种逃避。**婚姻是一场考验，它或许会占用我们的精力，让我们无法把更多的时间花到我们的理想中；它或许会动摇我们的意志，让我们怀疑自己多年来的坚持是否正确，自己的能力是否足够影响更多的人。但它也会锤炼我们，让我们学习如何去争取自己的盟友，让我们不断审视自己的理想。如果在担起生活的重担数年之后，仍然不忘自己心中那份坚守，那这应该就是我们毕生都可以追随的道路了。

历史上，坚定的革命者没有因为婚姻和生孩子而放弃革命的，反而他们在有了家庭和孩子之后，更加坚定了给下一代创造美好社会的责任感。说的唯心一点，孩子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要使我们的后代摆脱内卷的痛苦和异化的人生，只能靠社会的变革和先觉者的努力。就像红岩革命烈士说的那样：“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愿意把这牢底坐穿”。

无论如何，我都反对以自己的对象思想落后或者家庭负担重为理由给自己逃避事业和工作找借口，因为共产主义事业是伟大的，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虽然很艰苦，但是很有意义，这种意义完全压倒个人的小确幸，完全不是被小家庭的幸福和不幸所能代替的。民国时期，曾一个署名南方大学的学生王永德在给恽代英的书信中谈及他的一个朋友曾经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而如今除了恋爱对其他公共事务都无所用心，甚至一味消沉。因此他咨询编辑有何方法可以改变其友人。恽代英对此做了斩钉截铁的回答：

“永德：你的朋友当真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一定知道在经济制度未完全改造以前，是没有美满的恋爱生活可言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反对恋爱，他们愿意牺牲一切以谋改造经济制度，使人人得美满的恋爱。但马克思主义者为了要改造经济制度有时要牺牲一切（包括恋爱在内），若在工作上所必要牺牲的不能牺牲掉，甚至于因为贪恋任何事物，反牺牲了他的正当工作，这只是愚昧的鄙夫，决不配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

另一方面，我也反对因为恋爱和婚姻会占用自己的工作精力，让人持续对自己的工作能力产生怀疑从而逃避恋爱和婚姻。左翼青年即使面临对象不理解所造成的矛盾，也应该有所舍弃，有所坚持，而不应该蹉跎岁月，在自怨自艾和自我麻醉中度过一生，即使在挣扎之后发现自己成为不了战士，也可以为前线战士送点粮草，或者在旁边鼓个掌，加个油。不要逃避、勇于面对；不问结果，坚持斗争，这应是左翼青年面对社会运动时的态度，也应是左翼青年面对自己个人的恋爱和婚姻时的态度。



日有今開

# 中国教育改革究竟有利于谁？

作者/@中国劳工论坛  
集/Venti@red-venti.xyz

---

摘要：我们需要一个保障年青人受教育权利和工人阶级利益的健康制度，而非一个由精英所控制的以及通过牺牲年青人的未来以维持自己统治的畸形教育制度。随着中国发布新的教育改革，基层家庭的学生、甚至无产阶级中较为富裕的家庭，也被官僚和富人的子女“甩在身后。”

---

今年以来，中国下发了多份关于教育的文件，包括控制初中生升学比例和取缔课外补习机构。3月，中国教育部发布了一份文件，要求各省保持高中生和职业高中入学比例控制在1:1。7月，中国教育部再次下发文件，开始打击校外培训机构。广东、湖北等地更是出动了“扫黄打非”办公室，使用行政力量开始“整治”。

一系列教育改革政策在舆论中掀起激烈地讨论。例如，有人认为，这些政策是为了保障教育公平，避免补课的内卷竞争，因为有钱人过去可以通过补课来接受更好的教育；另有一些人认为，尤其是家长，这剥夺了他们的子女通过教育实现晋升的权利。有一名家长在采访中表示，即使去一所稍微差点的高中，也不愿意自己的儿子进入职业中学——因为那样的话就会在就业上遭到歧视。

## 补习班被禁的影响

中国的教育改革真的是为了保障教育公平吗？实际上，在取缔了公开的补习班之后，官僚和富人的子女仍然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来获取更多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一种方法是通过“地下补习班”或者家教等渠道来补习，鉴于政策影响，这样的补习班将会更隐蔽和昂贵。例如在黄山，一名教师被爆料在自家的别墅开补习班，一节课收费数百。另一种方法是直接跳过高考，通过高中“国际部”（实际上就是留学预科班）去国外读书，或者参加分数要求更低的“国际学院”。这种情况更是官僚集团和富人的专利，因为出国或在国际学院接受高等教育需要支付的费用高达一年十几万甚至数十万。

穷人失去了公开补习机构之后，也就更难获取额外的教育资源，从而失去实现阶层晋升的唯一选择（虽然这根本不是选择）。他们将很难在高考的“独木桥”上与官僚和富人的子女竞争。不仅如此，初中毕业生还面临“分流”的问题。在现行制度下，由于政府要求对毕业生升学比例进行控制，大量的初中为了完成“指标”和提高升学率，连同职业高中一起，劝说班级上成绩不好的学生放弃中考，直接和职高签约。而另一边，家教、私立高中、留学中介等机构将会获得更大的市场。工人阶级中稍微积累了一点财富的家庭也不得不把他们的血汗钱投入其中。即使在今天，大学生的就业前景不容乐观，但在中国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只能尽可能获得更高的学历才能取得高收入的职位，否则只能沦为“廉价劳动力”。

中国教育问题的根源是不健康的制度。由于教育资源不足（这种资源不足本身是中国僵化的系统造成的，很多地方教职工拖欠工资，或是设施老化；像在四川、河北、河南这样的劳动力输出省份，政府更倾向于让学生“落榜”来维持劳动力输出），学生学习周期极短，每名学生都不得不在极短的时间内生吞活剥教学内容，进而发展为畸形的“填鸭教育”。在这种教育体系下，学生几乎完全没有自由发展的空间，只能沦为“考试机器”。

## 教育到底为了谁？

另一方面，中国正在面对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的危机。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报告，一些机构的预估中国的劳动力缺口可能在未来达到 1100 万。届时，中国将无法继续保持“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这是改开以来中国资本主义得以快速增长的原因之一。中国的劳动力短缺不仅仅是人口问题，而且是青年在愈来愈重的剥削（高房价、过度加班等）下，不愿意继续扮演“廉价劳动力”的角色，但是资本家不愿意提高工人工资——他们已经习惯了压迫工人阶级。因此政府选择用中考分流政策来逼迫他们回到工厂去，美其名曰“强化职业教育”，但实际上是限制学生接受教育的权利。

我们需要一个保障青年人受教育权利和工人阶级利益的健康制度，而非一个由精英所控制的以及通过牺牲年轻人的未来以维持自己统治的畸形教育制度。随着中国发布新的教育改革，基层家庭的学生、甚至无产阶级中较为富裕的家庭，也将被官僚和富人的子女“甩在身后”。我们主张一个民主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大力增加公共教育支出，取消学费及一切学校杂费，适当地延长学制，来保证每一名学生无论家庭条件如何都能享受免费公平的教育。只有这样才能消灭畸形的教育系统和社会不平等。

## 巨震之后，教育能重获新生吗？

---

七月，针对教培行业的新规，造成了资本市场的又一次巨震。此次新规不仅是限制资本对于教育产业的过度介入，同时包括其他一系列旨在减轻学生和家长负担的举措。这是政府针对死磕多年的教育难题，进行的又一次政策调整。然而，看似生猛的举措真的能够彻底解决当前教育面临的诸多问题吗？

### 一、教育：一个多年的病灶

人口基数决定了中国必然是一个教育大国。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显示，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51.89 万所，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 2.76 亿人。这样庞大的规模全球仅此一家。

但是，庞大规模的教育事业成了攀援于中国肌体多年的一大病灶。这体现在多个方面。

从宏观来看，教育资源地域上的分布不均衡、阶层间的分配不平等是当前教育事业面临的巨大症结。沿海与内陆之间，东中西部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处处体现着分布不均。从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从师生比到优质学校数量，从教学设备到教师水平，各项指标间的巨大差异都反映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而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收入差异，逐渐演化为身份差异，不同阶层的人所受教育可谓是天壤之别。当富家子弟享受着高级私教、多样的课余活动时，农民工子弟却还苦于没有在城市接受稳定优质的义务教育的资格。

从教育制度来看，尽管政府已经开始干预资本对于教育的过度介入，但是，业已深入人心的政府与市场作用互补的这一大的框架，仍是教育体制机制进行改进的基本前提。金钱逻辑和精英主义依旧不断地在腐蚀教育本该具有的公益普惠性质。

选拔是中国式教育模式的核心指要。虽然这种模式仍被舆论评价为世界最公平的一种人才培育路径，但面临的问题也十分突出。这一模式的必然产物是应试教育。考试是大多数选拔的门槛，成绩即成为了学生需要完成的指标。只要步入学校的大门，开始自己的受教育之旅，选拔性质的考试就会片刻不离身。这直接导致了学校教学育人方法的扭曲，撕开“一切为了孩子”的标语，背后显露出的是凿刻在墙上的“一切为了分数”。成绩既成了学生的生死线，也变成了学校的 KPI。

即使步入大学乃至研究生阶段，学业上的军备竞赛仍在继续。分数竞争变成学历竞争，学历教育成为划分三六九等的电镀池，镀金胜于镀银。“内卷”一词流行于青年学生之间便不再费解。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状态切实地发生于社会，也发生于教育的每一个阶段。

教育串联起的各方之间，也是矛盾重重。

学校中的师生矛盾历来是一个难解之题。本该教学相长的师生关系异化为上级下属或是猫鼠关系。个别现象或许还是偶然，但这种普遍存在并愈发成为一大社会问题的现象，则定有其社会根源。

对于大多数家长来说，除了挣钱养家，最头疼的莫过于孩子的教育问题。怎样上到好学校？如何能够提高孩子的成绩？孩子考试总失利怎么办？教辅行业挂出的广告词确实是众多家长的真实心声。

焦虑背后是更加沉重的经济负担。早在 2010 年，全国妇联发布的《中国和谐家庭建设状况问卷调查报告》就显示，“孩子的教育费用高”成为家庭生活面临的三大困难之首。另有多个调查数据均显示，教育支出已经占据了城市家庭年支出的 30%-40%。费用轻者如动辄几千的课外辅导费、高端电子学习用品，重者则有几万至十几万不等的择校费，以及天价学区房。不同的配置既显示出阶层间的巨大差异，也将普遍存在于家长间的焦虑，通过经济力量的刻画展现的淋漓尽致。

孩子既是教育的受益者，更是受害者。不可否认，成体系的教育和丰富的课外体验能够促进孩子的成长。从个人成长来看，现在的孩子普遍要接受到更广博的知识、具有更开阔的视野，尽管之间存在差异。但是，大多数孩子身处应试导向的单一片面的成长环境，也是现实。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传统落实为对孩子教育的巨大投入，在父母眼中，孩子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投资品，有投资便期待有收益，收益率越高越好。亲子关系潜在地发生了变质，以至于双方都未能意识到而予以默认。

## 二、教出了怎样的一批人

在分析教育病症背后的原因之前，有必要审视一下当前教育的成果：教出了怎样的人？

阶层固化的当下，教育愈发成为阶级再生产的手段。契合马克思在《宣言》中所说，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教育也在不断地再生产出两类人。

一类是受市场欢迎的精英。如果将教育比作工厂，精英的出厂设置绝对须是一流的。不过其内部又有划分，大体也可区分为两种。一种出生于精英家庭，享有优渥的生活条件，也就是所谓的“官二代”“富二代”。这种精英的再造相对比较容易，家庭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撑子女的成长。子女即使没有真才实学，也可以仰仗家中资源做一番包装。而依凭打娘胎里带出来的上层社会关系，即使没有这层包装，亦可轻松跨入精英阵营。另一种则主要是依靠自身在学业上的精进努力。不过，这类人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于家境较好的家庭。

第二类则是所谓的“残次品”，学历不高、成绩不佳、能力不彰、颜值不够……诸如此类的不符合市场标准的次等人才。与各地针对高端人才开出的优越条件相较，这类人大多只能以谋生作为自身的第一旨趣。



然而，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两类人的生产也严格遵循二八定律，作为市场眼中残次品的占多数，精英只是少数。在一个非等级社会，依靠教育重塑出来的对人的等级划分，已经成为众人默守的一般规则。

本是同一阶层的人，因为教育也可能分道扬镳。

虽然教育给予阶层跃迁的孔隙愈发缩小，但终归是留下了一束光。阶层跃迁的美好梦想成为横亘在相同阶层人之间的一道难以戳破的隔膜。残酷竞争头戴奋斗光环，身披努力就有收获的斗篷，成为这一束细弱微光播撒的福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教育还是改变命运的最佳通道，他人只能是前进道路上阻碍或陪衬。

对于个人来说，拒绝接受教育、拒绝应对教育中的竞争，往往意味着失败。这种失败认证作为外在的强制力得到广泛承认，个人只能被动接受。

不管是精英人才还是次等人才，其间还有多层划分，但总的来说，新一代受教育者大都是偏向个人主义的：依靠个人的奋斗、追求个人的享受、回应个人的期待……关照集体的出发点往往是自身的得失。“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或许是这类新生群体最恰当的形容。

虽然这种画像略显单一和偏激，但是现实无不告诉我们，相比于父辈的家庭观念和集体意识，近几十年来的教育，愈发让人变得脱离集体，走向个人，而这往往被积极地形容为独立自主的精神强了起来。只有过于偏激的个人主义才会被冠以孤僻、自私等负面词汇。

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在市场经济高歌猛进的今天已然式微，但在学校教育中仍旧占有一席之地。应该说，即使面对这样笼统的要求，现今的教育成效也是彻底失败的。

教科书中虽保留有大量的政治语汇，政治和历史课程也是中国各层次教育的必备内容。但是，去政治化在教育中以并不张扬的形式完美实现了。当前的官方意识形态强调立德树人作为育人的根本，本身就是一种去政治的政治。

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的号召虽朗朗上口，实操却毫无推进，成为纸上宣言。“我们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也只能通过歌曲进行回味。

### 三、教育畸形的背后

畸形的教育背后，是畸形的社会。

上世纪七十年代，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面临经济增长停滞的危机。原有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政府适度干预）未能取得成效，这直接导致相对立的自由主义经济信条（主张限制政府，强调市场作用）得以抬头。而在两个强力领导人（撒切尔和里根）的支持下，这股思潮在英美两国转化为政策而得到了落实。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世界政治格局发生逆转，西方推行的发展方案成为唯一可信的路径，新自由主义浪潮席卷全球。

中国也受到了这股浪潮的影响。①从 80 年代起，中国开启了一段至今仍未走完的市场化改革征程。教育不过是庞大的改革工程中的一小部分。

在破除思想“禁锢”之后，教育领域的市场化也在大政方针的指引下推行起来。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1992 年，十四大提出，在“各级政府要增加教育投入”的同时，“鼓励多渠道、多形式社会集资办学和民间办学，改变国家包办教育的做法”。1993 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出台。1994 年，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指出，“鼓励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力量按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多渠道、多形式办学。有条件的地方，也可实行‘民办公助’、‘公办民助’等形式”……

逐渐放开的口子，使得不断走强的资本也开始侵入教育的各个阶段、各个方面。教育的诸多症结都能够从中找到资本的逻辑。

一是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出口战略和城市化倾向的政策，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崛起以及各大城市的突出发展。所谓教育放权的改革，一方面让地方教育水平与地方经济紧密相连，另一方面，教育也成为地方官僚升迁的政绩。同时，农村集体经济的瓦解，也从根本上破坏了农村教育依赖的资金支持。紧密相连的各项社会政策，促使经济发展的地方差距扩大，进而使得教育水平开始形成明显的高低之分。而落后地区包括教育在内的公共服务逐渐依赖财政转移，拨付不够、投入不足才成为后面愈发凸显的问题。

“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把发展基础教育责任交给地方”

“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

——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而阶层间的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教育不过是又一个现实的反映。

二是教育成为固化阶层位置或实现阶层跃迁的途径。精英阶层为了延续自身的经济或政治地位，使得血脉继承更具有合法性与隐蔽性，教育成为了最佳手段。好的学历和出众的能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驳斥“靠的是父母”等反对声音。同时，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精英家庭也有没落的可能，教育是必要的续命手段。这是教育焦虑成为中产家庭重大困扰的原因。

日益激烈的人才市场竞争和不稳定就业的威胁，使得底层出身的人寄希望于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实现阶层跃迁。即使实现不了跃迁，好的教育也往往意味着更稳定的工作、更体面的收入。在教育的阶层再生产中，资本扮演着很大的角色。私人办学、教培行业都为资本的繁衍扩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而这满足了大多数阶层的实际需要。

三是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的功利化。经济发展方向的转型，使得竞争成为可靠的人才选拔机制，而学历就成了竞争最直观的指标。应试教育、精英教育与激烈的社会竞争有着很强的联系，这直接导致教育理念的扭曲和教学方法的简单粗暴化。规范、标准、高效这类工厂追求也成为老师们的执行准则。这些成果凝结到学生身上，就逐渐形成了一种脸谱化的、个人主义的、精英主义的思考方式和行事风格。

四是教学内容与现实存在隔阂。教育局限于书本，以分数（履历）为导向，脱离实践、脱离劳动。脱离劳动的教育和精英生活的理想建构，让受教育者愈发远离劳动阶层，而难以切身体会到底层民众生活的艰辛。即使现在已有少数城市学校开始增添实地劳动教育，但对习惯于城市生活的孩子来说，劳动更多地成为了一种课余玩物。至于实践和游学活动，则往往与履历挂钩。

五是职业教育、劳动教育的没落。单单依靠多筹建职业学校、安置师资是不够的。这种没落既在于社会整体的意识观念，将职业进行三六九等划分，更在于各职业的收入及福利待遇水平存在极大差异。而这又与整个经济体制和政策对于不同阶级的偏向有关。工人农民支持下的孩子，最终的愿望是远离工人农民，对于个人来说或许是个喜剧，对于社会来说却不能不是个悲剧。

#### 四、应该寻求怎样的教育？

阳和平在介绍其母亲寒春的事迹时，往往会提及寒春小时候所接受到的教育。寒春的母亲是一个信奉杜威思想的教育家，主张教育要与劳动相结合、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反对清高而不会动手的理念。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改开前的教育理念和教学内容不谋而合。而寒春自身在学业上取得的成就以及后来选择的劳动人生，不能不说与这样的教育有关。

毛时代的教育理念、教学内容以及具体政策的实践，以今天的视角来看，或许显得夸张和过激。不能否认，当时的教育资源和水准，确实不可与今时同日而语。但是，有限条件下，实现基础教育的普及、推进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尝试，不可谓不是一件创举，其中仍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一是接受教育的资格问题。毛时代的基础教育面向所有人（义务教育很大程度上是这一方向的延续），大幅度提高了受教育率，打破了数千年官僚贵族对于知识的垄断。同时，有序开展大范围的扫盲运动，1949年至1965年，全国年均扫盲600多万人。这一时期，数十万名工农干部、劳动模范和产业工人相继受到中等和高等教育。

比较有争议的是通过阶级身份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入学资格。1968年7月，基于上海机床厂的培训经验，毛泽东通过编者按的形式播发了“七二一指示”：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这一指示直接影响了工农兵学员选拔制度的形成。

有人会觉得这十分荒谬，认为这种欠缺规范标准的选拔和缩短学制的举措，不仅不利于高精尖技术的教学，而且将实务技能和理论知识搞混了（实务技能可以短期培训，但理论知识的研究推进需要更加完备、长久的教学）。的确，基于出身的评判略显机械，但是，不能由此否定当时对于教育公平的追求，以及社会主义教育模式的探索。不能将正确的方向和存在偏差的具体政策混为一谈。

二是教育理念。“为人民服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向工人阶级学习”等号召能够反映当时的教育理念。首先，明确受教育目的不单纯是为了自身的个人利益；其次，教育的任务不是要培养出脱离群众的官僚精英；最后，要学习劳动人民的智慧，并切实有利于生产，帮助劳动者、成为劳动者，而不是纸上谈兵。

这一时期的教学内容往往被诬蔑为“洗脑教育”。实际上，社会主义的教育就应该洗刷掉精英主义思维、剥削压迫观念以及各种糟粕价值观。

三是教学内容。基于革命的教育理念，教学内容往往偏重于满足生产实践的需要，而且所涉内容十分广博。1966年，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中这样讲到：

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从这里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学习内容的单调更多的是时代限制，而不是方向的错误。

## 五、教育的新生有待社会的决裂

前些年，资本对于教育领域的入侵十分猖狂。2020年，全国学前至高中的校外机构近50万家（民办私立学校中除了出于慈善目的的，很多都具有盈利性质，其中还有些发展为精英子弟学校，具体数据未有统计）。而互联网技术的加持和在线教育的流行，更让资本主导的教育模式遍地开花。



近两年，对于资本的频繁出拳已为大众所知，教育行业也包括在内。此次刹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层对于资本扩张的隐忧。但是，现有的举措所能够引向的前景并不乐观。上世纪 80 年代，韩国也曾针对辅导班的过度发展，颁布了《规范教育和消除课外补习过热的措施》，但这使得原本宽口径的辅导行业，转型为高端高价的私人辅导，进一步隔绝了底层民众试图通过辅导提升成绩的一线希望。后来的结局是，为了满足社会呼声而放松限制，辅导行业再次迎来春天。而宽松教育，就欧美和日本的经验来看，在资本主义市场竞争的环境下，只能让底层民众更加丧失生存和斗争的能力。

这种情形在中国恐怕也不会例外。恐慌刚过，一些高端私教便已经上线，相应的费用不是一般家庭能够承受起的。另外，本身新规对于非学科类培训的限制力度是有限的，这直接促使诸多教培机构进行业务转型。如新东方就于 8 月初成立了北京新东方素质教育成长中心，下设艺术创作文化馆、人文发展研究所、语商素养沉浸馆、自然科创空间站、智体运动训练馆、优质父母智慧馆六大板块。这无疑给原本只有余力参加学科类辅导的家庭增添了额外的负担。

教育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是复杂的。教育的转型除了教育本身内部的调整外，更关联到宏大的政治经济变革，仅从教育内部针对所涉问题进行补救，只能是扬汤止沸。教育的问题绝不仅限于教育，技术方法层面的改良不足以彻底改变教育的面貌。没有更加完备、彻底的经济和政治变革，教育政策只能在已有的框架中，进行左右横跳式的调整。而这种调整往往被动而效微。

除此之外，还要正确区分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具体的教育理念、政策和方法。后者不能尽善尽美，但是教育公益普惠的性质是确定无疑的，培育具有抗争和集体主义意识、尊重劳动和善于劳动的新人也该是社会主义教育的应有之义。而教育方向的偏离，理念和方法就可能沦为维系阶级关系的工具，公平政策也只能是空中楼阁。教育这块阵地，人民不去占领掌握，就要由资本及其代理人占领掌握。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

正如电影《决裂》中，“共大”师生要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教育要获得新生，恐怕也有待于社会整体与以往的所有偏离来一个彻底的决裂。

# 靠“一块屏幕”实现教育公平是谁的幻梦？

作者/@于山

集/Venti@red-venti.xyz

摘要：《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日前一则报道引发关注。报道称，全国 200 多所位于贫困地区的高中，通过直播技术跟着程度的“超级中学”成都七中一起上课，学生的成绩有了显著提高，有的学校本科升学率翻了十几倍，有些学校甚至出了省状元——报道认为，是直播的屏幕改变了这些孩子的命运。

文章将成都七中和位于直播“远端”的云南省禄劝县第一中学形容为“两条平行线”：成都七中去年有 30 多人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外国名校录取，70 多人考入北大清华，一本率超过九成，是中国最好的中学之一；而禄劝一中的中考最低分数线比省会昆明最差学校还低 100 多分，生源全都是大城市挑剩下的，全校一年才有 20 多个学生考过一本线。

但文章并没有反思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反而默认了这一现实，并将其作为一个“科技创造奇迹”的故事的铺垫。尽管差异如此巨大，但靠着一块屏幕、一条网线和成都七中名师们的课堂视频，两条平行线就有了相交的可能。事实上，这种差异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以成都七中为代表的重点中学制度参与制造的一一省会重点中学对地方普通中学的资源掠夺和生源收割，造就了中国教育目前城乡分治、重点/非重点分治的双重二元结构，也让陷入这一二元结构中成都七中和禄劝一中成为了两条遥远的平行线。

另一方面，两条平行线相交靠的也并非技术万能的神力，而是那些收入微薄却默默坚守的乡村教师们，这些在名校名师光环阴影之下的配角，才是真正的幕后英雄。“科技一键消除教育不公平”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乐观，它不仅掩盖了科技背后巨大的人力付出，也给了人们制造了一个不需要动摇任何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就能实现公平的幻想，在这个幻想里，作为科技代言人的既得利益者可以尽情地自我感觉良好，而不需要对自身的特权做任何检视和反思。而这一幻想，恰恰是通向公平最大的障碍。

## 重点中学：是教育公平的最后保障，还是资源不均的首要原因？

《冰点周刊》的记者探访了直播教学的两端：成都七中和位于国家级贫困县的云南禄劝第一中学，同龄的孩子身处的几乎是两个世界。对于禄劝一中来说，生源不行是“先天不足”，禄劝的中考最低分数控制线是 385 分，比省会昆明最差学校还低 100 分，“能去昆明的学生都去了。”留在禄劝的学生大多数是留守儿童，父母双双在外务工，孩子在学校出了状况，班主任反复致电，家长就是不来——或者说是来不了，甚至有家长在电话里直接说，“我的孩子就不是学习的料。”一位今年考上北大的学生从两岁开始留守，直到大学开学前，班主任才第一次见到了前来致谢的父母，夫妻二人在福建给人杀鱼，一个月赚 5000 块，父亲的手指甚至积劳致残。

而在屏幕的另一端，成都七中的大部分学生来自优渥的中产家庭，家长花大量时间为孩子规划学习和课余生活，甚至帮他们争取与诺奖获得者对话的机会。透过屏幕，禄劝的孩子感受着这些差距——他们中的很多人至今没出过县城，而成都七中的同龄人们已经在课堂上讲述自己去英国、美国游学的经历了一一贫穷，的确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

除了学生的家庭条件，大城市的重点中学和贫困县里的普通中学的师资水平也有着天壤之别。《冰点周刊》记者在成都七中随机旁听了几堂课，并评价这些课为“公开课水平”；语文老师在课上讲解了以“规则”为主题的议论文，先播放了重庆公交车坠江的视频，然后让学生自由发言讨论；政治课也紧追热点，刚刚落成的港珠澳大桥已经成了课堂练习的分析材料。相比之下，一位考上北大的“农村娃”向《冰点周刊》记者回忆说，在他过去就读的

那所中学里，老师时常醉醺醺地来上课，动不动就安排学生上自习。很多学生都听得出老师讲错了，很多练习卷子直到高考都没有讲评，甚至连标准答案也没发过。



乡村学校

然而这些不平等似乎只是铺垫，在文章结尾，成都七中的名师们被塑造成了拯救者的角色。一个老师去九寨沟旅游，找了一位当地的导游，见面时导游愣住了，兴奋得满脸通红，惊呼“老师”，他这才知道，这个兼职做导游的孩子就是自己在直播屏幕另一端的“学生”。另一位老师去远端学校做分享，离开时发现全校的学生都挤在教室窗前，和他挥手告别。还有老师特意将远端学生的优秀作业拿到课堂上展示，后来听说，这个学生所在的班级在看直播时集体激动到落泪，接下来的一个月都在拼命学习。

一个充满善意、泪水和感恩的故事。

不可否认，这其中的善意是真诚的，但善意真的可以抹平这巨大的不平等吗？更讽刺的是，重点中学、超级中学，以及它们所代表的那套靠不断掠夺地方、基层教育资源来堆砌出光鲜的升学率、状元数量甚至是海外名校录取率的制度，以及这制度运行过程中的集中与不均，才是这巨大的不平等的首要原因。

在《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一书中，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中清等学者曾对北大和苏大这两所精英大学从1952年到2002年期间50年来的学生学籍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发现，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国家恢复了文革前十七年的精英教育路线，否定了建立在家庭出身基础上的教育歧视，然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却不是真正的平等，城乡之间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巨大差异，使得农民子弟在精英大学学生中的比例开始显著下降。然而，《无声的革命》的作者认为，在新时期，农村孩子要进入精英大学并非完全没有途径，这剩下的唯一一个通道，就是与精英大学构成对接关系的重点中学。

统计数据说明，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的学生来源非常集中，少数几十所中学为这两所大学输送了大部分生源。而对于农村学生来说，县一级的重点中学是他们进入精英大学最重要的途径，这似乎是将重点中学当成了教育公平的保障。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应星和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在《“无声的革命”：被夸大的修辞——与梁晨、李中清等的商榷》一文中称这一结论是“别出心裁”。文章指出，教育学界对于重点中学制度的利弊一直存有争议，但即便是这一制度的辩护者，也只是强调重点中学有利于培养精英人才和更好地发挥教育资源的效益，而并不会将其作为教育公平的保障。

应星、刘云杉认为，重点中学是以垄断优质师资和生源为前提的。国家在设立重点中学之初，是希望重点中学能够集中资源，摸索教学经验，由点及面逐步推广，起到通过重点中

学带动普通中学的作用。然而在具体实施层面，重点中学非但没能带动普通中学，反而要靠排挤普通中学来巩固其重点地位，少数重点中学甚至成为了高分学生的“收割机”、优质师资的“抽血机”。同时，不同层级的重点中学之间也存在着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比如，县中学即便算是重点中学，但在教育经费、师资力量等方面还是难以与大城市的同类重点中学比肩。这种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配不均，在欠发达地区尤其严重。禄劝一中的例子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现状，但凡好一点的生源都去了昆明，留在县里的都是城市中学挑剩下的学生。在这一意义上，重点中学制度非但不是弥合城乡之间、阶级之间差距的通道，反而构成了一种制度性的排斥。有学者将这种城乡分治、重点/非重点分治的重叠现状称为“双重的二元结构”，正是这一结构影响了中国的教育公平。



“两条平行线”

应星和刘云杉还指出，的确有少数拔尖的农村学生通过被选拔到重点中学，有幸被以城市为中心的精英教育体制所吸纳，但这一少数人的幸运非但没有改变城市对乡村教育的支配格局，相反，他们的成功模式——即作为农村学生中的佼佼者而被顺理成章地抽离农村的中学以及农村整体的教育环境——反而使这种既有的权力支配格局变得更加牢固。在成都七中和禄劝一中的关系里，我们可以发现类似的成功个例的反噬效应。正如博主“常井项”所指出的，一方面，禄劝一中本身就是这一支配结构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它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只能靠求助于位于支配结构顶端的省会超级中学（成都七中），而当它通过直播授课进入良性循环之后，也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变成了成都七中的县城低配版，开始新一轮的向下掠夺游戏。我们可能通过不断地复制再生产一种强权结构实现公平吗？答案似乎不言自明。

#### **直播授课：我们有可能靠一根网线解决教育不公平问题吗？**

对于这些贫困地区的孩子来说，直播授课并不是新鲜事。开设直播班的东方闻道网校负责人王红接对《冰点周刊》记者表示，早在2002年，四川省就将远程教育作为了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成都市教育局和成都七中都很下力气。16年来，7.2万名“远端”学生跟成都七中的师生一起走过了高中三年，其中88人考上了清华北大，大多数成功考取了本科。

但王红接透露的另一个细节似乎又说明，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靠一根网线达成的。直播在刚被引入学校时，曾遭遇过老师的撕书抗议，有些老师觉得自己被瞧不起了，于是消极应对，上课铃响后很久才晃进教室，甚至整周请假，让学生自己看直播学习。禄劝一中的老师也在采访中谈到，高一的班级里总是哭声不断，这里的孩子单科考试的平均分和成都七中能差出70多分。通过三年的努力，差距在慢慢缩小，依靠的不仅仅是神奇的屏幕，更多的，是这些收入微薄的乡村教师默默的坚持和付出。他们耐心安慰受挫的学生，帮他们



减轻压力、重建信心；他们彻夜批改作业，每天分析上百份试卷，第二天就要讲评；他们将七中老师发来的课件整编成学案，提前布置给学生预习；在直播中，他们记录下学生面露疑惑的瞬间，在直播间隙见缝插针地给学生答疑解惑；他们每天凌晨一点才下班，早上六点就要出发去学校……他们看似是这个“科技改变命运”的动人叙事中的配角，但事实上，他们可不可能是真正的幕后英雄呢？

中国 SOS 儿童村协会的官方微博“阳光 child”就指出，禄劝一中今天的教学成果，是县教育局、禄劝一中的校长和全体老师苦心经营十二年的结果，并不是一句“科技改变命运”就能概括的。所有的 MOOC（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平台都在面临相同的问题：注册率高，课程的完成率却低得可怜，徘徊在 5% 左右，几乎沦为了“捡拾落后地区天才或超强毅力者的捡漏之举”。名校名师资源不难获得，真正难得的是能够帮助学生消化远程教育内容的老师们。MOOC 过去二十年的发展历程已经足以证明，技术不是万能的，只有满足一定条件时，技术才能发挥作用、真正推动教育平等——而这一条件，就是人。

靠一块屏幕、一根网线“一键解决教育不平等的问题”的确是一个相当诱人的方案。它听上去像极了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极力鼓吹的“削平化运动”：当每个人都能借助电子设备和网络技术学习到足够的知识，我们就迎来了一个没有落差、没有壁垒的平坦的世界；在这个 21 世纪的乌托邦里，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竞争，优秀的人自然会脱颖而出，而弱者和失败者再也没有借口，将自己的无能归罪于结构性的不平等了。换言之，在技术乐观主义者看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机会平等的一个重要前提，或者说有效途径，是先实现人与人之间在科技近用权（access to technology）上的平等。但事实上，且不说基础设施层面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仍尚未完全抹平，即便无线网络已经实现了全球覆盖，科技近用权也不仅仅等于物理接口，它还包括使用数字技术的技能和资源，也就是所谓的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简单而言，网络接口、电子设备等硬件决定了人们能否使用数字技术，而数字素养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文化因素则决定了人们如何使用数字技术。



“数字鸿沟”

事实上，就在四天前，《冰点周刊》发表的一篇题为《村里的孩子，被游戏工业捕获了》的文章，似乎就构成了“屏幕改变命运”的另一种叙事。文章援引了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叶敬忠团队的一份关于留守儿童游戏沉迷现象的调查报告。报告认为，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寄宿制学校的压抑，以及乡村生活的单调无聊是留守儿童极易被游戏“捕获”的原因。一方面，游戏中的“无身份感”——没有好学生和差学生的差别，也没有农村孩子和城镇孩子的差别——让留守儿童获得了一种虚拟世界里的平等；另一方面，游戏也在留守儿童中间建立了新的区隔，“铂金玩家”会瞧不起“青铜玩家”，同龄的孩子里总有人因为游戏打得不好而被

孤立。叶敬忠的团队认为，这说明电子游戏正在侵蚀留守儿童的现实生活，改变他们对现实的理解方式。

有趣的是，在这篇报道文后的评论中，网友纷纷指责文章逻辑本末倒置。其中一条评论这样写道：“对于社会问题，我们不需要解决，只需要找一个背锅的就好了。80年代，武侠小说背锅；90年代，港星背锅；新世纪，游戏背锅。对于农村孩子来说，真正的问题远不是游戏，而是贫瘠的教育资源和娱乐方式，以及城乡之间的隔离。”和“屏幕改变命运”一文在社交媒体上制造的集体高潮相比，这篇文章引发的反响似乎要冷静得多。

当技术“作恶”时，我们知道这不完全是技术的“锅”；而当技术“创造奇迹”时，我们为什么就都禁不住跟着感动雀跃，而丧失了理性判断的能力呢？大概是因为，技术创造的“奇迹”让我们——位于技术“近端”、教育天平倾向一侧的人——不免获得了一种良好的感受，仿佛是我们以及我们所代表的先进的技术、先进的教学拯救了那些挣扎着寻找出路的孩子。这一奇迹的本质，是无需动摇任何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就能实现公平。这样的公平是不存在的；而真正的公平，要从既得利益者放弃这种虚幻的良好感受、反思自身的特权开始。

文 / 杜平



中国古代有个叫范进的穷酸秀才，屡试不第的他终于是高中举人。平日里对他没个好脸色的屠户老丈人也对他毕恭毕敬起来，县里的举人老爷也急忙送来银两与之称兄道弟。连着家里的亲戚朋友也跟着面上有光，真可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用极致的现实诠释了“知识改变命运”。

像这样的事，到了今天竟也屡见不鲜。若是谁家孩子高考考入名校，主家自是也要大摆宴席，脸上有光。若是被清华北大录取了，便称“状元”，三五好友前来庆贺自不必说，教育部门也会有五万十万不等的雪花银奉上。若是在农村，乡亲们说起某某状元是我们村的，内心也是充满自豪，就是村子里的狗碰上邻村的野狗狂吠之声似乎也更胜从前了。可以说高考已经“科举化”了。但是高考果真能和科举一样改变命运吗？

作为小镇做题家的笔者可以现身说法。笔者出身于地地道道的河南农村，从小成绩优异，每每升学都能考到比同学更好的学校。妥妥的父母口中别人家的孩子。经过数十年寒窗苦读，经过高考，考入了北京某文科大学，成为村子里第一个到北京上大学的学生。看似前途光明，然后命运就是在这里急转直下。大学同学多是城市中产以上家庭出身，眼界、知识面表达能力、综合素质是我远远所不能及的，而大学对人的要求却不只是刷题那么简单，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也让自己更加迷茫。这时候我发现，对于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来说，大学不是走向人生巅峰的起点，大学就是你的人生巅峰。在大学你获得了与城市中产以上家庭的孩子、老板们、教授们的孩子一起读书，一起喝咖啡的机会。这也许是你们差距最小的时候。毕业后张同学被家里安排出国，李同学听从大学教师爸爸的指导成功保研了名校，赵同学的爸爸给他在烟草局疏通了关系安排好了职位，就连那个天天和你一起逃课打游戏的刘同学也回家继

承了妈妈的公司……而你这时候还是浑浑噩噩，开始海投简历，最后只有一家教培机构愿意要自己，于是你进入教培机构，开始忽悠学生家长报班……曾经和同学们一起坐在宽敞明亮的大礼堂里聆听校长开学典礼时你憧憬着，“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如今处在过去的未来，听着学生家长的抱怨、领导的花式职场 PUA，你又迷茫了，仿佛是一场梦。

很显然，对跃上“龙门”的绝大多数孩子而言，高考的确改变了命运，但改变的只是被剥削的形式。我们的父辈在工地上扛着钢筋水泥、在田野里挥洒汗水的时候，他们感受到了命运的不公。而经历过寒窗苦读，高考中第的我们，坐在逼仄的格子间，面对写不完的代码，批改不完的作业，堆积如山的报告，我们同样感受到命运的残酷。在“资本化”的现实面前，我们都只是用于榨取剩余价值的劳动力而已。当脑力劳动者的供给远远大于需求时（大学扩招，经济衰退），曾经骄傲的知识分子们也不得不面临裁员、失业、过劳，不得不为了获取稳定的工作而疯狂内卷。

但是读书参加高考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改变个人命运吗？抱着读书改变个人命运目的而读书的人，假使他成功了，那么其中的大部分也只不过是摘下了自己脖子上的锁链套到其他人身。当官的，贪污腐败危害百姓。经商的，偷工减料压榨员工。因为他们本身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对于他们的付出，需要用百倍的价值来偿还。范进当了老爷，那他会变本加厉的鱼肉乡里，不然怎么对得起自己多年的寒窗苦读呢？如果这些人上位，其后果可想而知。因为“科举化”的高考本质还是要为统治阶级选拔人才，用以维护旧体制。

对大部分人而言，高考改变的只是被剥削的形式。少数通过高考等手段跻身“成功者”行列的佼佼者，又会骑在我们的头上让我们给他们做牛做马。出路和在？那时的我迷茫、彷徨……

直到有人告诉我，“知识分子应该与工农相结合”，“方向不对，知识再多也是无用”……直到我发现，曾经有那么一群知识分子为国家民族发出呐喊，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直到我听见，“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当你我在考场上内卷的时候，马克思写下了：“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当你我在为高考分数担惊受怕的时候，毛泽东写下了“故吾辈任重而道远，若能立此大心，聚爱成行，则此荧荧之光必点通天之亮，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势，翻天覆地，扭转乾坤。”你心中所念只是可怜的分，而他们却早已胸怀大海。

其实知识改变命运并没有错，问题是需要改变命运的不是我们自己那点可怜的小确幸，而是千百万跟我们一样受压迫受剥削的底层人。没有阶级的解放，自己的解放也无从谈起。问题是我们应该行动起来，将我们的知识和汗水付诸千百万劳动者的解放事业中。事实上随着劳动者文化素质的提高，他们也比以往更易于接受先进的理论。而原本属于小镇做题家的我们，大部分人注定也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能为劳动者接受先进的理论带来更多方便。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时代的大潮正在把两者更加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同学们，决定你未来命运的不是高考。而是你能否认识到，你我皆是底层，你我的命运要靠我们千百万同胞的团结，知识的力量不是在于刷多少题，考多少分，而是在与千百万底层群众的共同实践中迸发力量！

## 小学课本中的问题，不只是几张图片

---

最近小学数学课本的插图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人教社的回应把它归结于“画法画风”的问题，舆论追究的是崇洋媚外的问题，但是，阶级社会的课本里存在的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被遗忘了。

实际上，现在中小学甚至大学课本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大陆发表于 1956 年到 1976 年的文章已经被尽数删除！

有的人会说，《谁是最可爱的人》不是那个时候的吗？可是这篇文章写于 1951 年，有的人可能说《驿路梨花》不是那个时候的吗？对不起，这篇文章发表于 1977 年。

发表于 1956 年到 1976 年的文章被从课本中尽数删除，从小学到研究生，不留任何余地。

为什么删除课文会专门对准那个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是社会主义时期，人人劳动，不准剥削，互助友爱，封资修的东西开始逐渐退出中国的文化舞台。追求高尚、脱离低级趣味、有道德的精神境界，弘扬劳动光荣、集体主义、互助友爱、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成为那个时候语文课文的主流。

当然，转型为市场经济，是不能容忍这些东西存在的。因为市场经济要塑造的是人的原子化、堕落、懦弱、自私自利、蝇营狗苟的精神世界。

《陈涉世家》被删除，删除的是造反精神。

《蜜蜂引路》被删除，列宁的名字从小学课文中消失，删除的是革命。

《雷锋日记》、《草原英雄小姐妹》、《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被删掉了，删除的是集体主义、互助友爱、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夜走灵官峡》被删掉了，删除的是工人阶级的伟岸身影。

鲁迅的《一件小事》、《“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友邦惊诧论》、《论“费厄泼赖”



应当缓行》早已不见踪影，删除的是知识分子对自己、对反动派的斗争精神。《纪念刘和珍君》也只是在网友斗争下，才得以幸存于高一的语文课本里。

近几十年来语文教材的删文运动，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最为惨烈的一次文化清洗。政治挂帅，真的只是毛泽东的专利吗？只是毛泽东敢于公开申明而已。

想把社会主义从下一代的头脑中连根拔除。何其歹毒也！

肉食者们拿着巨额的经费，过着资产阶级的奢靡生活，利用研究生干活，各种教材的拙劣，难以卒读。

他们害怕人民的反抗和清算，给下一代填喂着精神毒品，试图让他们忘记尊严、权利和反抗。

可是，肉食者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在“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处，“大楚兴，陈胜王”的呼喊声划破了沉寂的夜空，《陈涉世家》被删除，大泽乡精神永存。

在海河之畔，年轻人稚嫩的呐喊，完全继承了 1956-1976 年的斗争精神，刺破了无声的夜空，使肉食者们胆战心惊。

肉食者们的企图，真的能实现吗？

历史，最终属于人民！

课本承载着成年人的美好回忆，关系到年轻一代的精神世界。现在教材质量的低劣已经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把可爱的孩子画成唐氏综合征患者的形象，而且竟然通过了层层审核，这到底需要何等的精神卑劣才能达到？这里面的官僚主义和腐败已经到了何等的程度？

一线教师已经对这些教材中出现了问题反映了十多年，但为什么被视而不见，迟迟得不到改正呢？这些管理者的精神境界和水平甚至远不如老百姓。这再次证明了老马克思的教育观——政府应该被人民教育，而不是政府教育人民。

教材应该摆脱精英控制，变成人民群众能够参与和管理的对象。人民教材人民编，人民教育人民管。真正尊重民意，选择真善美的课文和图画，告诉孩子们一个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是可能的，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鼓励青少年为人类解放而奋斗，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是社会主义教材的使命。

日月精華

# 对教育是生产劳动一说的质疑 —— 关于教育劳动的性质

作者/察网@屈炳祥  
集/Venti@red-venti.xyz

---

摘要：我们可以对马克思的生产劳动作一个简要概括，这就是，凡是能为社会生产物质财富、又能为社会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否则，就是非生产劳动。再来看看教育劳动是否属于生产劳动的问题。对此，我们的答案只能是否定的。

---

随着劳动与劳动价值理论的讨论再一次兴起，教育劳动的性质问题的争论也热闹了起来。许多同志认为，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使生产劳动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现在，它已经不再局限于物质资料生产领域，就是那些非物质资料生产领域的劳动也成了生产劳动，如教育就是如此。这些同志之所以认为教育劳动也是生产劳动，其主要理由是：

- 一是教育劳动是生产劳动力的劳动；
- 二是教育劳动是总体工人劳动的一部分；
- 三是教育能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等等。

我们认为，这些都不能作为教育劳动是生产劳动的足够的论据。

在此，我们特说明自己的理由。不妥之处，恳请学界师长和朋友批评指正。

## 一、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一般规定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有必要对什么是生产劳动作一个简要的说明。不然，我们的讨论就没有一个准。

众所周知，一种科学的生产劳动的理论，是马克思在批判与继承英国古典经济学、尤其是亚当·斯密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中，马克思运用了从抽象到具体和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从一般社会财富的生产及其特定社会形式两个方面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作了严格的规定。

第一，生产劳动必须是直接生产物质产品或商品的劳动。

马克思指出：“如果整个过程从结果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劳动资料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的这一规定，是抽象了劳动的各种具体社会形式，单从一般物质资料生产的角度进行考察得出的。他指出：这是我从“物质资料生产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定义”，或者说是“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物质资料的生产，在商品经济社会里它表现为商品生产的形式。所以，要生产社会财富，就必须生产商品。在这里，只有生产商品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马克思指出：“生产工人的特点，是他们的劳动物化在商品中，物化在物质财富中。”还指出：“只要劳动物化在商品中即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统一中，这种劳动就始终是生产劳动。”由此可以看出，是生产劳动，必须是生产物质产品或商品的劳动，即必须是既生产使用价值又生产价值的劳动。非如此不可。

第二，生产劳动必须是带来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劳动。

马克思在给生产劳动下最初的那个定义时特别指出：“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于是，他接着对生产劳动这一范畴又作了深层次的规定，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不仅是商品生产，它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不是为自己生产，而是为资本生产。因此，工人单是进行生产已经不够了。他必须生产剩余价值。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请注意，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生产”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即它既包括严格的、真实意义上的生产，也表示那些能给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各种形式的经营活动，如对商品、货币的经营以及各种形式的服务性经营等。这里应当强调指出，能给资本家带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劳动是生产劳动的规定，是从单个资本家的角度来看的，但如果从整个社会的观点来看，情况就不同了。对此，马克思又作了更深一层的规定。

第三，生产劳动必须是能直接为社会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第二卷中曾以保管费用为例，对生产费用和非生产费用作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用于保管的费用，一方面，如果从单个资本家的角度考察，它们可以起创造价值的作用，成为发财致富的源泉。另一方面，如果从社会的观点看，它又可以是单纯的费用，是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非生产耗费。这说明，一种劳动要真正成为生产劳动，不单是要为资本家个人带来剩余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为社会创造剩余价值。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马克思的生产劳动作一个简要概括，这就是，凡是能为社会生产物质财富、又能为社会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否则，就是非生产劳动。

请注意，这里所说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是特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情况。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这种特殊生产关系抽象掉，那么，其基本原理仍然适用于我们今天的社会。因为商品、货币、价值、剩余价值或利润仍然是我们今天社会最基本的经济范畴。这样，我们就可以十分容易地得到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界说了。这就是，凡是既能为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物质财富，又能创造社会纯收入的劳动，就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劳动。反之，就是社会主义的非生产劳动。

## 二、关于教育劳动是生产劳动的商榷意见

在我们明白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之后，再来看看教育劳动是否是生产劳动的问题。对此，我们的答案只能是否定的。

第一，教育部门不是物质资料生产部门，教育工作者的劳动不生产任何物质产品或商品。

教育工作者的劳动是一种智力物化活动。他们劳动的对象是人不是物，其劳动的结果是人的劳动力而不是物资产品。这一点，是谁都明白的，就是那些主张教育是生产劳动的同志也是不否认的。现在，有人以劳动力是商品为由来证明教育劳动是生产劳动。（因为马克思曾说过生产劳动必是生产商品的劳动。这一点，我们在上文也说过。）但我们认为，这个理由不能成立。因为劳动力作为商品，它是它的所有者即受教育者的商品，而不是教育者或学校的商品。另外，也有人提出教育劳动是一种服务，服务也是一种商品。由此来证明教育劳动是生产劳动。我们认为这个理由也不能成立。因为服务本身不是物、不是商品，只是一种活劳动形式。因而，服务劳动不是生产劳动，而是一种非生产劳动。马克思指出：“服务这个名词，一般地说不过是指这种劳动所提供的特殊使用价值，……但是，这种劳动的特殊使

用价值在这里取得了‘服务’这个特殊名称，是因为劳动不是作为物，而是作为活动提供的”。关于服务劳动的性质，马克思确认它是非生产的。因为它符合非生产劳动的一般特点。他指出：“非生产劳动者为买者生产的只是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使用价值，而决不是商品。非生产劳动者的特点是，他不为自己的买者生产商品，却从买者那里获得商品。”在许多地方，马克思还直接用“或”字将服务与非生产劳动联系起来。可见，这种种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教育也不为社会创造纯收入。

众所周知，教育是社会的一项公共事业，它不生产任何物资产品，因而没有任何价值与利润的生出。同时，它又不是一种经营性部门可参与社会财富与利润的分配，因而，它不为社会创造和提供纯收入。在西方国家，人们之所以把教育当作一种产业，把教育劳动当作生产劳动，是因为校董把知识的物化当作一种经营性的活动，当作一种发财致富的途径。这种情况在我国现实社会生活中也部分地存在着，如一些民办或私立的学校就是如此。即便如此，它也够不上是什么生产劳动。这是因为它一不为社会生产物资产品，二不为社会创造任何纯收入。唯一获利的是校董自己。这一事实，即使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是认可的。比如，亚当·斯密，他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就把劳动力的生产或教育与物质资料的生产相区别，并且把它从生产劳动中撒开。他之所以这样做，正如马克思所说，是因为他本能地意识到，如果他在这一劳动包括到生产劳动中去，“那它就为各种冒充生产劳动的谬论敞开了大门。”

第三，教育不仅是非生产的，而且还是一种纯消费的。

众所周知，教育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一切物质条件都是社会物质资料生产部门提供的，是社会财富的一种扣除。在人类社会的初期，根本就不存在有什么作为独立的、具有专门职能的教育。这是因为人的知识积累和经济发展都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这时的教育还处于它的朦胧状态，混存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中。经过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使人的知识积累和经济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以后，教育才从物质资料生产中分离出来成了社会的一个独立的职能部门。这是社会分工的一大进步。当教育产生以后，为着它的生存与发展，社会要不断地从物资资料生产部门抽出一个相当的部分来作为它的实现手段与发展条件。这样，教育一开始就作为一种纯消费性事业存在。如果我们假定没有教育这回事，社会不是可以将更多的人、财、物用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吗？这样，社会的物质财富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不是可以生产得更多吗？社会的财力不是也会更充裕吗？

可见，教育不是生产部门，教育劳动也不是生产劳动。

### 三、关于教育劳动是生产劳动的再商榷

以下，我们就论者关于教育是生产劳动的几条主要理由作出具体分析。

首先，劳动力的生产在本质上是一种消费行为，不能证明教育劳动是生产劳动。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在上文作了说明，此不赘言。然而，需要说明的是，一些同志为了证明劳动力的生产是生产行为，进而证明教育劳动也是生产劳动，还特别以马克思关于生产和消费（或消费和生产）的直接同一性原理来说明。我们认为，这是误解了马克思的原意，是不正确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指出：“生产和消费的这种同一性，归结为斯宾诺莎的命题：‘规定即否定’”至于人本身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一方面，马克思这样说道：“例如，



在吃喝这一种消费形式中，人生产自己的身体，这是明显的事。而对于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从某一方面来生产的人的其他任何消费形式也都可以这样说。消费的生产。”然而，在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指出：“这种消费的生产——虽然它是生产和消费的直接统一——是与原来意义上的生产根本不同的。生产同消费合一和消费同生产合一这种直接的统一，并不排斥它们直接是两个东西。”据此，我们认为，教育，不过是马克思在这里所指出的是一种“消费的生产”“是与原来意义上的生产根本不同的”，它同原来意义上的生产同样也“直接是两个东西”。可见，即使是从生产和消费的直接同一性的观点来看，也得不出教育劳动是生产劳动的结论来。

其次，教育劳动不属于总体工人劳动的一部分。

总体工人和总体工人的劳动是马克思在研究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时发明与使用的两个经济范畴。它的基本规定，仍然是、并且首先是直接居于物质资料生产领域里的工人的劳动。马克思指出：“就劳动过程是纯粹个人的劳动过程来说，同一劳动是把后来彼此分离开来的一切职能结合在一起的。……单个人如果不在自己的头脑的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动起来，就不能对自然发生作用。正如在自然机体中头和手组成一体一样，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来了。后来它们分离开来，直到处于敌对的对立状态。产品从个体生产者的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可见，马克思在这里把总体工人和总体工人的劳动是限定在物质资料的直接生产过程之中的。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一书中还指出：总体工人就是“工场的总劳动者”，他们同劳动对象之间有一种“直接存在的关系”。当然，根据当今社会分工的发展，那些虽不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但却与物质资料生产过程直接相连、并为之直接提供生产服务的那些部门的劳动，即马克思所说的“直接与资本相交换的劳动”也可作为总体工人的劳动存在。然而，教育却既不在物质资料生产领域中，又不与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直接交换，因而这里的劳动不够成总体工人劳动的一部分，所以，它不是生产劳动。

最后，不是所有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

我们知道，教育是一种知识物化活动，它的确能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但是，这并不表明教育就具有生产的性质，教育劳动是生产劳动。因为国民经济增长是在劳动者受教育之后，而不是他在受教育之时，因而它不是教育劳动本身的直接结果。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开药方的医生不是生产劳动者，而配药的药剂师倒是生产劳动者一样，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其道理完全一样。

还有，如果把凡是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劳动都当作是生产劳动的观点能够成立，那将会导致理论上的重大错误。我们知道，能促进经济增长的，除了人的劳动，还有资本、土地、科技，制度，道德，等等。是否可以说，在促进经济的增长中它们也劳动了呢？它们的劳动也是生产劳动呢？如果按照论者的逻辑，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但是，这样一来，我们不可避免地将要重蹈历史的复辙。在历史上，以麦克库洛赫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曾经把一切在经济过程中发挥过作用的都称作“劳动”。他说：“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把劳动定义为任何一种旨在引起某一合乎愿望的结果的作用或操作，而不管它是由人，由动物，由机器，还是由自然力完成的。”进而他还认为，这些动物、机器、自然力的作用，不仅是劳动，而且还是生产性的。它们不仅生产了使用价值，而且还生产了价值和剩余价值。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才使

他自认为“排除”了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同价值规律之间的矛盾，弥补了李嘉图经济学的不足。对此，马克思曾讥讽道：“是啊，在日常生活中也确是谈到役畜劳动和机器劳动，而在诗的语言中还有这样的说法：铁在熊熊的烈火中劳动，或者在锻锤的锤击下呻吟，劳动。”他还指出：麦克库洛赫这样作，不过是一种为资本辩护的种种说法的改头换面而已。即使撇开这些不谈，就谈劳动本身，除了经济活动中的劳动之外，还有上层建筑领域内的各种劳动，如从事国家行政管理、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科学研究，以及从事文学艺术创造的劳动等等，不都能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吗？试问，这些劳动是否也是生产劳动呢？如果按照论者的意见，那就应该是。但是，这样一来，经济生活与上层建筑的区别就没有了。一切活动都成了经济活动，一切劳动也都成了生产劳动。这不是太可笑了吗？可见，那种把凡是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劳动（包括教育劳动在内）都当作生产劳动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到此为止，我们的商榷意见已经说完了。但是，为了避免误会，我们不得不还多说几句。我们否定教育劳动是生产劳动之说，并不是要否认教育的重要性。恰恰相反，我们认为，教育具有极大的社会经济功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并且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教育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没有教育的极大的发展，就没有经济的增长与社会的进步。教育的社会经济功能与教育是不是生产劳动是两回事，不能同日而语。否则，就会谬误百出。因而，我们决不要因为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而可以跨越和藐视真理。

### 公司发展历史

我所在的公司是国内一家从事线上教育的独角兽公司，该公司获得国内外资本的多轮投资，在线上教育细分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从 2015 年发展到现在有 4 万多员工，在发展初期对员工管理较为宽松，工资待遇较好，随着线上教育行业越来越激烈地竞争，公司的发展压力越来越大，管理也越来越严苛，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缩减劳动力成本。

### 管理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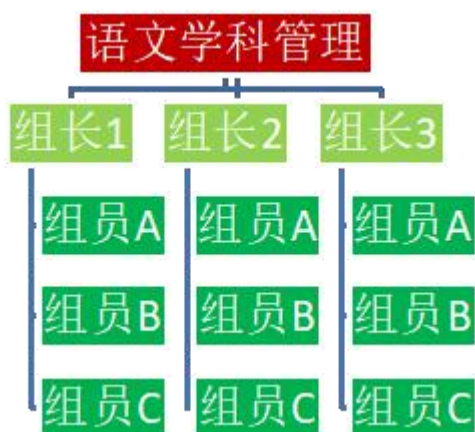
#### 部门分工和劳动时间

公司分为 16 个部门，部门较乱，各岗位按工作性质可以分为教师、销售、班主任、程序员、人事、财务、培训师、行政。

下面介绍一下个别岗位的工作内容（因为我只负责教学，对其他岗位工作内容只能进行大致描述），销售应该是类似电话销售，不停地打电话向客户推荐课程，公司还有地区承包商，应该会和各学校进行合作，尚不知哪种为主要销售方式，也听同事说有部分电话销售外包给其他公司，所以对销售方面不是特别了解。每个成功转化的学生都有班主任专门负责，班主任的工作是给学生安排课程，和家长沟通学生的学习情况以及后期续费，和家长谈续费应该是班主任的主要工作内容，所以班主任算是大半个销售。销售和班主任的工作地点都是在公司，工作时间是下午一点到晚上九点，每周休两天，不过一般不会准点下班，周末也存在加班情况，之前我和一位班主任聊过，他晚上十一点左右才下班，主管到点不下班，手下员工就不敢走，有的班主任凌晨才下班，也听说过班主任忙的时候一个月只能休一两天。销售和班主任周末是否经常加班不了解。教师的工作内容是对学生进行授课，除了授课没有其他工作任务，绝大多数老师是在家办公，周三到周五是两点到晚上九点上班，周六周日是上午九点到晚上九点上班。综上，公司的整个业务流程是：销售先对客户进行销售，老师对学生试听课授课（一节免费课），转化成功之后班主任负责对接，和客户（学生家长）沟通课程安排和续费，老师再负责正式课授课。

### 层级和薪资

班主任和销售的工资比教师高，月薪 1 万+，业绩好的可以拿到 2-3 万。班主任的离职率较高，有的是工作时间长、压力大离职，有的是业绩不达标离职，销售的离职率不清楚。教师分为三类，全职教师、专职教师、派遣教师。全职教师和专职教师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专职教师公司不予以缴纳五险一金。派遣教师是第三方劳务公司的派遣员工，不和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教师基本不是师范生，原来大多也不从事教育行业，多因为原行业工资低选择线上教育。同一学科的教师分为不同小组，每组有一位组长，教师的直接上级就是组长，组长是从教师中选拔的，主要工作内容仍为教学，所以组长一般站在教师的阵线。



所有教师又分为 9 个等级，不同等级薪资不同，具体见下图：

老等级	新等级	底薪	50h-80h	80h-100h	100h以上
7	特级-A	6000	65	75	85
6	特级-B	5600	65	75	85
5	高级-A	5200	65	75	85
4	高级-B	4800	60	70	80
3	中级-A	4400	55	65	75
2	中级-B	4000	50	60	70
1	初级-A	3600	45	55	65
0	初级-B	3200	40	50	60
01	初级-C	3000	35	45	55

教师本来没有这么多等级，最低的几个等级是公司为了降低成本新增的，具体后面会谈到。-1 级和 0 级月工资大概 5000-6000 元，1 级和 2 级月工资大概 7000-8000 元，3 级到 4 级月工资大概 9000-10000 元，以此类推。等级越高人数越少，整体呈金字塔形。低等级老师对同工不同酬有很大怨言，但也没有什么办法。

## 剥削制度和压迫文化

由于对销售和班主任的工作不熟悉，公司对员工的压迫和剥削只能从教师方面进行描述。

## 课标

课标就是教师每个月的课时任务量。在公司发展初期，教师每个月只需要完成 50 小时课时任务就可以，多上课的话，超出 50 部分计课时费。后来公司规定，每个月课时达到 80 小时除了多余部分算课时费之外，还可以额外获得几百元绩效，这样一来很多老师为了拿到绩效都会上满 80 小时。再后来，公司每个月制定了课标（一般是 120 小时左右），同一组的平均课时要达到某一规定值。达到标准组长可以获得额外的几百元，达不到标准对教师来说没有什么惩罚，但个别组长管理严格会和教师进行谈话，或者要求教师做一份教研材料作为

惩罚。这样的组长不多见，会被教师们背后骂。虽然达不到课标没有什么惩罚，不过组内老师一般都会尽量达到课标，不让自己的课时在组内倒数。

## 劳动强度与工伤

周中的工作较为轻松，一天两到三节课，周末的工作强度相当大。周末的上班时间是上午9点到晚上9点，一般老师周末每天排10个小时的课程，这样加上课程之间的间隙时间，工作经常会从上午八点开始到晚上九十点才结束。工作的10个小时中人是每分钟都集中精神对着电脑显示器的，所以周末的两天工作劳动强度相当大，一天下来身体腰酸背痛，眼睛因为长时间的刺激会非常难受，干涩、酸痛。

长期的这种高强度工作势必会给身体带来伤害，颈椎病、腰椎病这样的都不必说，之前就听说某组教师三十岁还没到得了心梗，该老师还是和公司直接签订的劳动合同，好像也没有工伤赔偿，同组的教师自发发起了捐款，后来那位教师病情好了之后就离职了。怀孕的老师流产发生过好多起。目前尚不清楚对于怀孕的教师课标是否降低，在公司的内部社交app上可以看到孕期教师对课时量的吐槽。在内部app上搜索“流产”、“小产”发现不下于10起，公司应该是没有任何赔偿的。除此之外，每年的寒暑假是课时量的高峰，经常会看到有教师上课累到去医院。类似严重的工伤应该较多的。

教师没有缴纳过工会会费，也没有参加过和工会相关的活动，没有人知道公司存不存在工会。

## 员工的自我剥削

近两年大家在网上对996的工作制度发起了声讨，与此相反的是制造业的工人却渴望加班，如果哪个企业的流水线不加班，工人是不愿意去工作的，挣得工资不够开销的。和制造业工人相似，有些在线教师为了挣得更多的工资拼命加班，有时甚至到了不要命的地步。比如，周末每天24小时，有的教师一天能上16-18小时。某次课时排行榜上看到当天10点20分的时候，课时排行榜第一名已经上了6.33个小时，今年2月5日晚上9点，我在排行榜上看到第一名这个月已经上了92.83小时，按照五天平均算，一天平均上15.56个小时。每年寒暑假有课时比拼比赛，最高的我记不清了，360小时是有的，平均一天12小时。组内交流群里大家经常会吐槽这种为了要钱不要命的行为，还有就是拼命上课会拉高月课时标准，也会拉高等级晋升的标准。怎么看待这种员工的自我剥削呢？我之前将这些老师视为工贼，后来发现不能简单等同，有些课时多的教师思想反而更觉悟。这教师拼命上课所挣的钱到时候要拿去支付彩礼、房子首付，房贷、车贷等，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劳动者不只被某一个资本所剥削。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极大的增加了猝死的风险，从根本上看是房价物价借了某一资本的刀杀了人。

## 降低成本的一系列操作

去年，随着在线教育领域内不断加剧的竞争，公司采取了一系列操作降低成本。首先，对劳动关系进行了调整，全职教师在现有劳动合同尚未到期的情况下被要求换签另一家公司，新公司和原公司虽然也有联系，教师们普遍不愿意，有人在内部app发帖质问这种操作是否



合法，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最终大家只好妥协。换签后，教师们工龄、薪资待遇没有影响，目前不清楚公司换签的目的以及等劳动者的影响。

其次，公司新增了专职教师和派遣教师两种用工模式，专职教师和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不予缴纳五险一金，派遣教师和公司没有劳动关系。这两种用工模式每年可以给公司节省下不少成本。

另外，公司新增了更低的等级，我刚来的时候是1级，后来新增了0级和-1级，新进教师要从最低等级开始算起，-1级太过于难听，公司把等级又换了个名字，据说现在-2级都有了，只是不叫这个名字。这种同工不同酬的制度直接的就是为了降低成本，教师进行的劳动完全是一样的，所获的报酬却不一样，此外等级制度无形之间弱化了教师们之前的团结。

还有晋升制度的改革，之前每年有四次晋升，晋升也较为容易，后来缩减为一年两次，晋升的评价指标几乎只是课时数。去年的一次晋升引发了众怒，大家都想要晋升，拼命上课，拉高了课时，同时公司为了降低成本，晋升名额骤减，结果就是大家上的课时比之前多很多反而不能晋升。晋升那几天教师们纷纷在内部app发帖吐槽晋升中的内卷，教师们越是拼命上课，晋升的标准就会定的更高，晋升就会变得更加困难。此外，晋升的不透明也被教师们吐槽，晋升中的各项数据（包括自己的）教师一无所知，只有最后一个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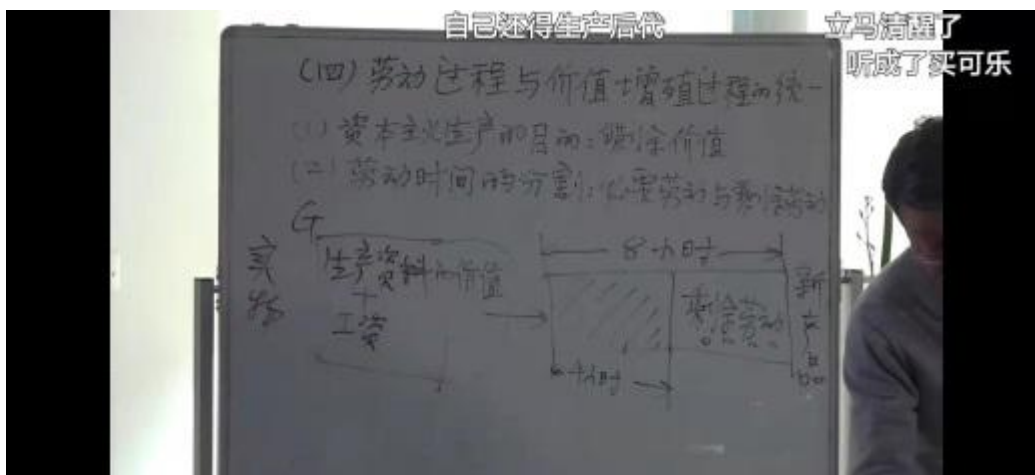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公司又建立了降级制度，如果课时数过低教师将被降级。这项措施同样引发了教师的愤怒，最后公司发布通告称，降级率非常低，为百分之几，且最多只会降低到刚进公司时的等级。这一手段对教师起到了分化瓦解的作用，因为有些教师刚进来时就为较高等级，这样一来本来大家作为全体教师对降级制度进行的抵制就被轻易的瓦解了，从通告发出后app里也没有人发帖吐槽了。教师们就在各种制度的驱使下拼命的上课，就好像工人被疯狂的流水线催赶一样。

## 严苛的规章

公司为了管理教师制定了严苛的规章，如一个自然年两个月月课时低于50小时直接辞退，且没有任何补偿，迟到和早退次数过多进行罚款，课后app未进行总结进行罚款等。最近一次的十大制度又引发了众怒，教师纷纷在app上发帖抱怨、吐槽，最后不了了之没有实行。十大制度基本上是荒谬且违法的，比如迟到两次或者上课时周边声音过大（无论是否可控）可以直接辞退且无任何补偿。

## 员工思想

由于教师在家办公的特殊性，教师们之间仅通过微信群（私下群）进行交流，个别教师偶尔吐槽一下公司和资本的剥削，大家不敢在群里说过激的言论，彼此缺乏信任，教师之间的团结变的更加困难。平时有相当多的老师具有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甚至觉悟到被资本所压榨，内部app里可以见到类似的帖子，下图为某贴中配的图片。



目前在线教育平台的教师尚不能作为一个群体有目的地进行斗争，公司制定不合理措施时，教师会自发地发帖吐槽或者抱怨，有些热帖会有较高的浏览量和评论。公司会进行删帖，并且约谈发帖人，对其施加压力，对官方账号发布的帖子进行控评，或者干脆禁止评论。组长是工资高的劳动者，被剥削的较少，但压力大，一般情况下会站在教师一边，在组里从不参与对公司剥削员工相应话题的讨论。

## 总结

随着在线教育行业内不断加剧的竞争，公司不断采取各种措施降低运营成本，提高教师课时量以获得更多的利润。与外卖平台类似，劳务派遣会逐渐成为公司主要用工模式，这样公司既可以降低成本又可以规避一些责任。总的来说公司加大对劳动者的剥削力度，可以预见这种剥削只会越来越强。在高强度的教学劳动下，还会发生较为严重的工伤，甚至是猝死。面对不合理的制度，教师们目前会自发的进行反抗。最后说一下在线教育本身，在线教育并不会像广告上所说的将优质的教育资源用于资源匮乏的地区，并不会促进教育公平，相反这只会加大教育的不公平。能够支付起高昂学费的家长，他们的孩子可以不用东奔西跑地去各种辅导班，可以节约很多时间用于学习，无论刮风下雨在家就可以有老师指导。相比之下没有报辅导班的孩子，可能一个知识点没有掌握就会落下一个章节。高昂的学费也是中等收入家庭的重负，低收入家庭可以通过花呗等贷款的方式支付学费从而背上债务。学生被困在做不完的题目和试卷中，成绩好的学生都非常讨厌学习，整个群体比 996 的白领还要辛苦，长大成人之后，也不过是从预备役的劳动力转正而已。

## 千万人的高考背后，教育资源是如何分配的？

---

关于高考，总有关于资源分配和公平竞争的讨论，早在十年前，时任总理温家宝就曾疑问：“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农民收入逐步提高了，农村孩子上学的机会多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

这其中当然有城镇化不断推进、农村人口比例逐渐降低的原因，但这似乎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人们之所以尤其关注高考，是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以个人能力为本位的人才选拔制度，也是高等教育资源的重要分配机制，不仅关系到教育机会和资源的公平分配，也关系到社会阶层的划分和流动。

### ■ “高考成为了一道隐形的墙？”

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 1071 万，比去年多了 40 万，千万考生的命运又一次被摆上天平。但在前些时日，某男艺人在直播中曝出自己高考身份造假，之后又有大量高考冒名顶替事件浮出水面。关于那些“被偷走的人生”，网络上又重新掀起一场针对高考公平的讨论。

很多人认为，至少高考让所有人都站在了相同的赛道上，在形式上体现出了公平竞争。

媒体人唐驳虎曾研究衡水中学的发展历史和招生模式，发现衡水中学之所以如此“出类拔萃”，是因为它像抽水机一样，聚集了周边县市甚至外省的优质学生，同时以极端军事化的管理方式让学生在三年里接受高强度的高考备战。

衡水把教育视作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产业，慢慢形成了以“衡水模式”为核心的“衡水系教育产业”。因为教育资源有限，又有众多家长相信衡水中学会帮自己的孩子考上理想大学，于是竞争开始下沉，“无论高中还是初中，都越来越抢手，学费越来越高，压力巨大的家长们，甚至已经把竞争延伸到了‘小升初’阶段”。

对于青少年来说，高中三年高强度、灌输式的教育已经是一种挑战，如今还要蔓延到初中甚至小学阶段。同时，在单一的选拔模式下，这种极端的教育形式和资源形成了一种畸形的竞争力，但公费生名额有限，教育越来越成为一扇隐形的墙，将资源匮乏的低收入人群阻挡在外。高考成功的前提也越来越提前，进“最好的”高中之前要先去“最好的”初中、去“最好的”小学。学生疲于备考，家庭倾注各种资源。

唐驳虎将衡水中学形容为“中产阶级的私立学校”，写道：“想进衡中上学，要么就得顶尖聪明、考得进衡中极其有限的公费生名额，要么就是家境宽裕、付得起高价择校费，而显然后者是大多数。面向顶尖聪明学生（大部分本来也就是城市中产家庭）的掐尖，面向广大中产、次顶尖学生的收费，这就是衡水模式做大的双轮驱动。”



与衡水一中、志臻实验中学相邻的“衡中公馆”，“房天下”显示目前房价为 9500 元每平方米。2013 年，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衡水中学与当地的房地产公司达成合作协议，投建“衡水第一中学”。此后，衡水中学（本部）依然是面向衡水本地的公立高中，一中则是面向河北全省掐尖，市场化运作、自主招生的私立高中，同时全面享用衡中的教学资源。但从校长、老师、管理制度、班级编号看，两所学校是一体的。© fang.com

关于高考，前年还出现了一块“改变命运的屏幕”，在 200 多所贫困地区的中学，学生们通过网线和一块屏幕，与著名的成都七中同步上课、作业、考试。因为有了这种形式的网班，一些学校的升学率迅速提升，不少人考上了清华北大。

有亲历过网班的学生后来回忆，那块“屏幕”并未出现在全校，学校专门组成了“网班”，投入最好的师资，甚至单独为两个网班安装了柜式空调，每个教室两台，而其他的班级则要等到一年以后才会陆续安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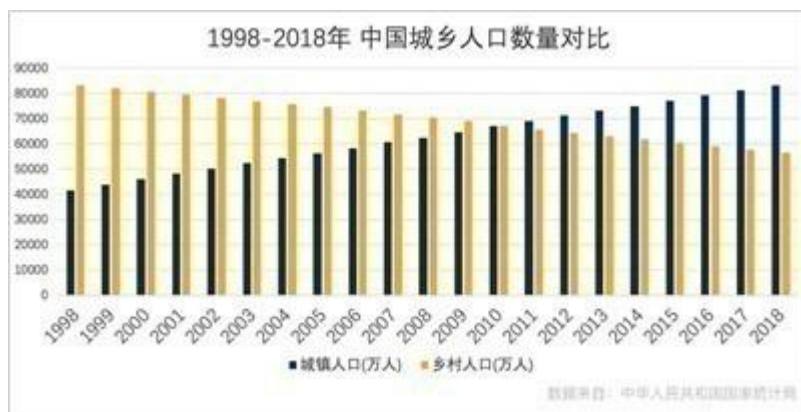
亲历者发现，网班的成功依然在于“资源的集中”，与其他关于教育资源分配的质疑并无二致。双倍的投入，换来了 93% 的一本率，但其他的理科班和文科班成绩则有些令人失望。“这是意料之中的结果，因为这种做法无非是在外部教育资源倾斜的基础上将内部教育资源倾斜，老师的配置、课程的安排、学校的重视程度无一不是如此……”

在这种应试教育的竞争下，成功者除了拼努力拼天赋，往往还得拼运气。运气好的，生在了付得起高价择校费的家庭、被选进了举全校之力打造的网班，就有更多的机会考进更好的大学。运气不好的，生在了隔壁县、交不起择校费、没进到网班，机会就少一点。可能仅一墙之隔，能获得的教育资源就是天壤之别。更别说东部和西部、城市和乡村这样的差距。

## ■ 扩招之后，更多农村学生去了非重点的地方院校

关于高考，一个最常见的困惑在于，为什么身边的大学生明明越来越多，依然有很多人认为高考并不公平？

温家宝 1960 年从天津南开中学考入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1964 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城镇化率仅为 17.58%。到 2019 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 60.6%，乡村常住人口降至 5.5 亿人，较上一年减少了 1239 万人。



理想状态下，如果公办教育的资源公平分配，大学里的城乡人口比例应该和全国的同类比例大致相同。但是对比城市化率和城市生源入学比例可以看出，至少在 1989-2005 年间，占总人口比例更少的城市学生获得了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



改变开始于 1998 年底，教育部发布《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不仅提出了“双创”（创建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还指出要积极推进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培养大批高层次应用性人才。彼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 9.76%（1977 年恢复高考，1978 年时仅为 1.56%），到 2019 年，这一比例已达 50.6%，在校生达到 4002 万人。

因为大学扩招，入学名额更多，农村学生的机会也更多，只是更多的人去了专科院校。对比四川高校的城乡学生比例，专科院校的城乡学生入学机会差距一直处于缩小的态势，到 2010 年时几乎实现了机会对等。早至 2005 年，国家教育科学“十五”规划的一个课题组也发现，农村生源确实因为扩招而增加了，但是主要分布在非重点的地方院校。

## ■ 农业大学的农村学生也变少了？



不公平感主要来自重点高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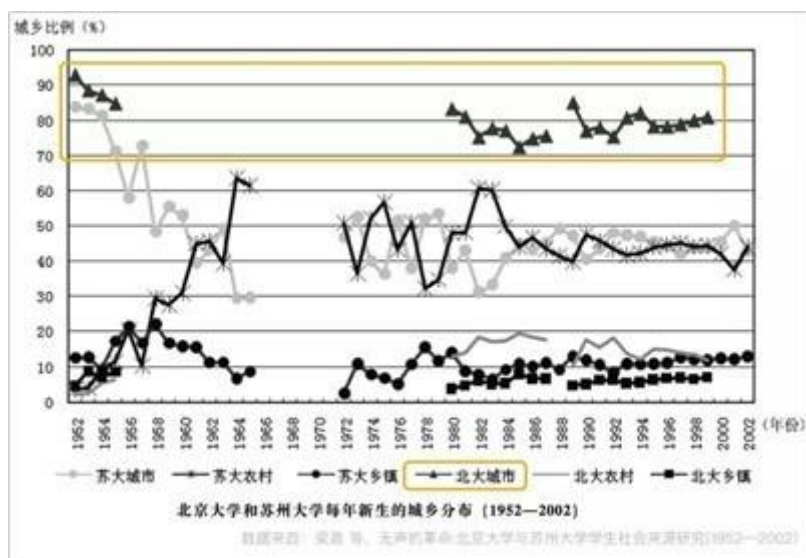
2011 年秋，从湖北农村到中国农业大学入学的新生小李发现，班上 30 多人，只有不到 10 个来自农村。连农业大学也把农村学生抛弃了吗？1999-2001 年间，中国农大的农村新生比例均在 39% 左右，但是到 2011 年，这一比例首次跌破三成，仅为 28.26%。

在排头的清华北大，这一比例更低。1952-2002 年（除开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大学来自城市的学生比例一直处于绝对优势，高于 70%。另外有研究发现，1978-1998 年间的北京大学，居住地在农村的学生还集中于 20-30% 之间，90 年代中期以后，农村户籍新生的比例下降并保持在 10-15% 之间。

对清华大学 2010 级的一次抽样调查也显示，当年该校农村生源仅占总人数的 17%。而当年高考考场里，农村考生的比例是 62%。

至少还有一些农村学生进了重点大学，看似终于在人生的赛跑中赶上一程。

但是距离还在。对比北京大学 2004-2009 年 1.6 万名本科生四年的成绩与省份来源，整体来看，优秀学生多集中在沿海或者经济发达省份。因为经济积累、基础教育设施、家庭背景及家庭参与教育，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成果更好，并且会将教育优势从初等教育保持到本科教育。



学者梁晨等人曾研究 1952-2002 年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学生学籍卡片，分析得出两高校的生源比例。其中北京大学城市学生比例一直处于绝对优势。

纽约大学教授 Michael Hout 曾提出“最大限度维持不平等” (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 的假设，指出只有当上层阶层在特定教育阶段的教育需求达到饱和状态的时候，基于阶层出生的优势比才会下降，否则不平等将继续维持和扩大。

高等教育不单称普通高等教育，还包括成人高等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因为性质有异，社会各阶层有各自的取向偏好：更偏向地位取向的本科教育会使优势阶层扩大他们的相对优势，在更偏向生存取向的成人高教领域，则在大学扩招使中下层群体积累更多必要的技能。

“大学无用论”的盛行也源于此，倾全家之力再咬牙坚持四年甚至更久？习得某个傍身的职业技能尽早投入社会？都是整个家族的和年轻人之间的权衡。

## ■ 自主招生成为历史，它曾带来什么？

2020年1月，教育部公布《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也称“强基计划”），明确今年起，不再组织开展高校自主招生工作。至此，持续17年的自主招生政策退出历史舞台。从轰轰烈烈到戛然而止，这一政策曾经带来了什么？

2003年，经过两年试点，教育部正式启动自主招生改革，希望能通过自主招生的试验来改革高考过程中的“应试教育”、“唯分数论”弊病。到2019年，全国共90所试点高校有自主招生资格。2018年，自主招生报考人数达到了83.7万，最终通过率约为4%。

各大中央部署高校的教育经费主要来源于中央财政，在招生时理应关注区域公平，但是通过分析五所东部重点大学（清华、北大、复旦、上海交大、浙大），研究者发现自主招生名额在不同区域间的投放不平衡，东部地区获得的名额多，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获得的名额少，个别省份甚至为零。

“公平”和“效率”一直伴随着针对高考的争议。高考更着重于在统一的试题和分数线下选拔“成绩优秀”的学生，自主招生则更在乎“综合”、“特别”，希望借此能让让偏才、怪才脱颖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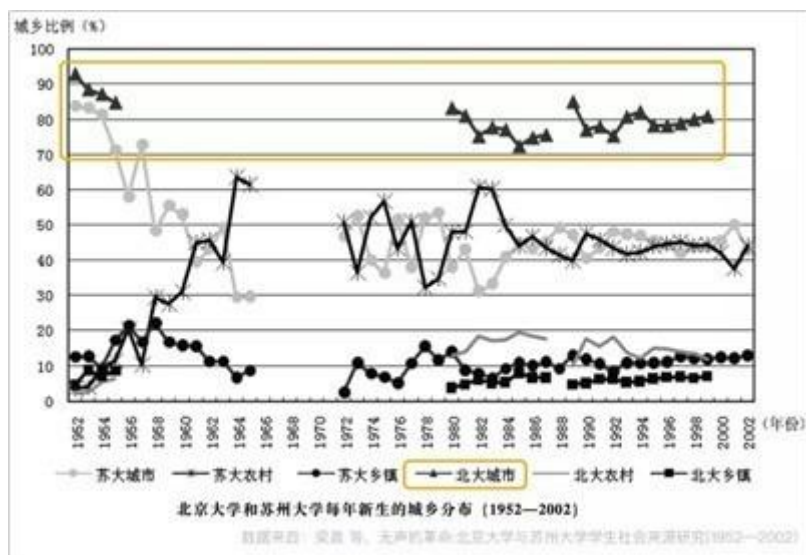
一些高校将发表论文、文学作品、专著以及在学科竞赛中获得名次纳入报名条件，但时有学生论文抄袭、造假的新闻爆出，几所在自主招生中录取名额较多的高中名校也“集体沦陷”，“每一个学校都存在着不止一例学生论文涉嫌造假（的情形）”。学术不端的问题向中学蔓延。

对比北京大学2005-2009年共5届分别通过“自主招生”和“统一高考”录取的一万余名本科生，研究者发现，“自主招生”录取的学生中，来自农村的比例远低于本就很低的“普通高考”这一渠道。

5年中，该校通过普通高考录取的学生中，约有16.4%为农村户籍，自主招生平均仅为5.4%。对比同时期农村户籍人口比例，统一高考和自主招生都远未达到城乡均衡，且在自主招生中的失衡更为严峻。此外，该校自主招生中还存本地生源较多的问题，录取比例平均比普通高考还高4%左右，达到20.4%。甚至该校管理者也意识到，自主招生的题目和考核类型对于农村学生更困难。

为什么农村学生这么少？因为甚至还在义务教育阶段，很多人就退出了关于高考的竞争。“农村教育行动计划”曾在贫困农村地区就学生入学问题开展了8次大规模的调查，追踪了近2.5万个学生。结果显示，2013年，贫困农村地区37%的人完成高中阶段的学习，而城市学生基本超过90%。

我们在高考这几天看到的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是有的人甚至没能到达河岸边。



农村教育行动计划的调查发现，差距在高中之前就出现了。初一入学的时候100名学生，到初三的时候69人，其中23人没有再上高中，读到高三的就只剩下37人。

## ■ 谁最不可能考上大学？

1998年底开启的大学扩招，既赶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成果验收期，也赶上了第一代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进入高等教育的适龄阶段，既带来了辐射宽广的各种利好，也引起了喧嚣不止的争议。

如今中国的城镇化率正在向60%迈进，现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却还在影响着随迁子女的教育。直到2012年，才终于发布了《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

这份由教育部、发改委、公安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布的《意见》指出，随迁子女升学考试工作的主要原则是坚持有利于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公平受教育权利和升学机会，坚持有利于促进人口合理流动，统筹考虑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升学考试需求和人口流入地教育资源承载能力等现实问题，积极稳妥地推进随迁子女升学考试工作。

《意见》发出后，各省市相继推出了具体的地方政策，其中人口输出地和高考大省制定的条件都比较宽松，比如江西省对随迁子女父母的职业、住所等都未做要求，外省籍的学生在江西省高中阶段具有一年以上学习经历，并取得学籍之后便可就地参加高考，享受与江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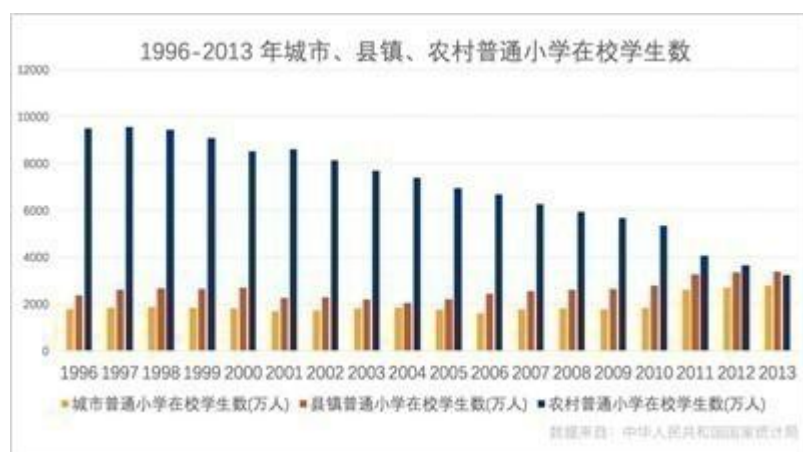
籍考生相同的招生录取政策。山东则求外省籍学生具备山东省高中段学校学籍，并有完整的学习经历。

人口流入地的条件则严格许多。比如北京、上海等地一直都在慎重考虑、稳妥推进，依然专注于治理开墙打洞等关乎民生的事务，对随迁子女父母的要求也极为严苛。

但比随迁子女还艰难的，是依然留在农村的学生。

“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发现，在贫困地区，父母双方都在家的孩子，营养、智力等指标整体上最差，“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出去找工作，所以收入是在最底层的。”

在贫困的农村，屋舍凋敝，教育资源极其匮乏。留下来的，只有 37%能在千辛万苦之后高中毕业，对比城市那傲人的 90%。



也许有人会说，“高考是目前最公平的制度了，如果将政策倾斜给农村学生，定额降分录取，且不说如何继续保证程序正义，他们和‘真刀真枪’由分数线录取的学生都不在同一个水平，高校怎么上课？”

是，机会、过程、结果，它们的公正与否各有侧重，是保证基础教育资源的公平合理？还是保证中考、高考制度的透明公正？还是在最后通过各种支持“计划”来确保固定群体的录取比例？

最好的状态当然是既保证基础资源的公平合理布局，也确保录取流程的透明公正，因为这样，就无所谓谁“窃取”谁的教育资源、谁“侵占”谁的录取机会了。

我们也许什么都做不了，还要挤破头去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教育资源。但是在这过程中，也许得停下来想一想——如果你恰巧不幸出生在那样偏远的地区，你希不希望自己被落下？如果你幸运地避开了那样的匮乏，是否还会用一句“不够努力”来轻松地对他人的失败作解答？

## 从延安的撤点并校看中国现代教育的世纪争论

乡村问题和中国本土化的问题既贯穿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轨迹，也同样贯穿了中国近代以来的教育试验和变革。

### 1、中国现代教育的开端——新式学堂

中国现代化的学校体制始于清末 1904 年，举国建立新学堂，包括乡村。1905 年废除科举，断了旧式知识分子的仕途，新学成为唯一的官方教育制度。但因乡村并无足够人力财力和新文化基础，新学普及率很低。

中国在现代教育初始便尝试了多种舶来的模式。1904 年的新学堂体制模仿当时日本的现代化教育方式；很快随着清朝灭亡进入民国时期，民国教育部引入德国教育的经验，例如对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做出区分。德国模式并没有在民国时期延续太长时间，1922 年一群留美学生主导政府的教育方案，开始美国模式，即：小学 6 年、中学 6 年（初中不区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最后大学教育。美国模式在国民党统治区一直持续到 1949 年。

就入学率而言，1930 年适龄儿童初小（小学 1-3 年级）的入学率达到 22%，其中男生为 33.4%，女生为 7.6%。而初小升入高小（小学 4-6 年级）人数有大幅减少，能升入初中的人则就更加少了。我们下面看这张表格：从 1911 年-1931 年，学校的数量和学生人数有了很大提高，但即使到了 1930-1931 年全国一共才有各类现代学校 2992 所，学生总量为 514609 人，而 1931 年全国的适龄儿童大约有 800-900 多万。所以在民国能读书的人很少，能读到中学的人更少。

The republican era

Table 4.3. Secondary schools and students, 1911-1931

	1911		1922-1923		1930-1931	
	Schools	Students	Schools	Students	Schools	Students
General	438	38,881	547	103,385	—	—
Senior	—	—	—	—	554	44,371
Junior	—	—	—	—	1,320	336,851
Vocational	—	—	164	20,360	272	39,647
Teacher training	—	—	394	43,846	846	93,540
Total	—	—	1,105	182,804	2,992	514,609

Sources: 1911 - S. C. Liao, "Middle School Education in China," *Bulletin*, no. 12 (1923), p. 5, in CNAEE, *Bulletins on Chinese Education*.

### 2、20 世纪 20 年代对新学教育的批判

新学推行不久，即暴露出尖锐的城乡差别和水土不服。虽然新学名义上普及全国，但是当时农村的学校主要还是私塾。新学对课程、师资、以及经费的要求远比私塾高，在乡村推



广无力。尤其是师资，新学普及需要大量的教师，而当时接受过西方现代教育的师资数量远远不够。因此乡村地区大部分的新学堂，乃挂羊头卖狗肉，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依旧延续私塾的传统。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时候，教育体系已经呈现出城市和农村的差别。

此外，自1920年代，一批留日留美的“返乡”精英都发现了西式教育的内在问题，对此进行了很多批判：（1）教育精英化与城市导向；（2）盲目照搬西方教育，教学内容脱离中国实际的生产生活；（3）新学是个人社会地位晋升的途径，造成学生重理论，轻实践，鄙视体力劳动。

针对诸多问题，他们提出两个教育方针：（1）促进平民教育，尤其是促进乡村教育；（2）改造教学内容，停止盲目照搬西方的课程和科目，要使得教育内容和中国的实际需求相结合。自此，如同中国革命的历史轨迹，乡村问题和中国本土化的问题同样贯穿了之后的教育试验和变革。

### 3、20世纪20—30年——乡村发现与乡建运动

所谓发现乡村，即部分城市知识分子觉悟到中国问题根源来自乡村，而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在乡村。乡村进入城市知识分子的视野，成为中国问题的核心。陶行知在南京晓庄发起乡村师范，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教育观念，比如：生活即教育，小先生制（孩子在学堂学习，放学后在家里当先生传播文化知识），以贴近乡村改造乡村。晓庄乡村师范在1927年被蒋介石关停，但一些晓庄乡村师范的学生把这种教育理念带回自己的家乡，相继成立了本地的乡村师范学校。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则针对农村进行成人教育。梁漱溟的思路是自文化而后政治，组织上依靠政府支持。晏阳初的平促会带有美国背景、经费源自国际慈善机构，所以并不完全自主。晏阳初招很多志愿者去农村开展扫盲，让农民认识一千个字。然而农民对扫盲并不积极，更迫切的要求是减租、减息，而平促会所到之处却忽略农民的经济和政治诉求，成为“维稳”的力量。

蒋介石关停了晓庄师范，但转头却把乡村师范作为制度推向了全国。为争取乡村，乡村教育也进入了国民党执政任务之中。此外，蒋介石皈依了基督教，把乡村教育重建的部分任务交给了外来的基督徒，而这些老外的做法就是我们今天常见的志愿者去农村支教。他们组织留学生或者国内的热血青年志愿者到乡村去，教农民识字，在村里设立文化中心。然而，他们遇到的问题和今天的志愿者运动一样：志愿者对乡村不熟悉，所学的理论知识和乡村的现实脱节，不能学以致用解决村民生产生活中的问题。最后，志愿者在乡村里也留不下来。志愿者乡建运动百年来终究是隔靴搔痒。

当然，众所周知，此时毛泽东通过湖南农民调查也发现了乡村。毛泽东曾经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当过一年的校长，当时也进行了诸多校内改革，此外毛泽东在长沙尝试做自修大学。青年毛泽东对比了西方教育与中国私塾教育。他认为西方教育的优点在于知识体系完善、科目齐全，而缺点在于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制度性强因而容易呆板，教学阶段划分死板，师生之间不能有很好的互动。毛泽东在批判私塾的基础上同时也发现私塾相比于西式教育也有一些优点，如小班教学师生互动方便，教学进度安排灵活。梁漱溟和陶行知等乡建运动的失败，让毛泽东得出一个结论：教育的改变必须要有政治（政权）的支持，没有政权支持的体制外尝试都将十分脆弱，因此自文化而政治的改革方案不能救中国。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实践虽然失败，但之后的乡村教育体系的变革奠定了实践的经验，奠定了理论上的认识。

#### 4、江西革命根据地的乡村教育

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共产党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土地革命时期的教育已经呈现出来一些现代教育根深蒂固的问题，而当时的革命政权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

土地革命时期井冈山红色教育中很重要的问题是一一知识分子的阶级位置，这一问题在几十年后成为文革的核心问题。根据地里文盲太多，受过教育的人太少，农民也没有自发接受教育的意愿。因此，如果农民和工人要摆脱没有教育没有文化的现状，产生工农阶级内部的“有机知识分子”，必须让旧知识分子给工农启蒙进行教育。

可是知识分子当时来自于地主、富农、民族资产阶级或者城市精英，他们在阶级立场上可不可能成为农民和工人的朋友？这在井冈山的中央政权里面形成了很大的争议。毛泽东在这场争议中间没有取得领导的地位，左倾的声音占据了上风——他们认为知识分子无法成为工农的朋友。这个认识导致农村学校的师资短缺无法得到缓解，乡村教师依然主要来源于旧私塾。师资水平不高，且须自付教育开支，所以村民对于学校教育的积极性并不高。

#### 5、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正规教育实践

江西红色政权忙于土改和应付军事围剿，并未能够深入分析和解决教育问题。红军长征抵达陕北之后教育工作才逐渐提上了日程。红军到达延安之后，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学校扩张。1935 年陕甘宁边区初小（三年制的小学）大概只有 120 所学校，2000 名学生。到 1938 年的时候已经扩展到了 705 所学校，约 12000 名学生，3 年间学生人数大概增长了五倍，学校数也是翻了六倍。卢沟桥事件之后，延安吸引了全国大批知识分子，他们到达延安之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感受就是教育体系太落后。《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斯诺 1936 年访问延安的时候，认为延安的教育状态在很大的程度上还不如井冈山时期。

数量增加之后，1938 年，教育质量的问题提上了日程。从 1938 年到 1942 年延安地区经历了一个教育正规化的过程。教育政策以正规化为目标，要求权衡数量和质量，保证质量控制数量。所谓教育质量和“正规化”的问题，即数量和质量的竞争，从此开始贯穿了革命党教育方针的争论。

1938 年开始教育正规化的时候尚未关停村小。村小关停之后上学不方便，会导致学生辍学，村民就近入学的要求还是很强烈，所以在 1938 年的时候，虽然要质量控制数量，却没有提倡关停村小。但是之后两年，教育质量越发被重视，对于学生升学率与教师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村小的学生升学率达不到要求，学制也不规范。比如各个村小每天上学的时间和放学的时间都不一样，学制也不一样长，有的是两年有的是三年，有的可能农忙的时候要去帮忙，所以村小在学制、学日和教材方面都不统一，教学质量也参差不齐，学生完成学习后很多达不到升学要求。在教师队伍方面，大量教师没有教学计划、课程不标准，因此学生所学往往不符合升学考试的内容。因此 1938 年之后的教育改革向着如何提高升学水平来

制定要求，加强规范，统一教材，统一课程，统一教学计划，对教学过程进行控制，要求当地的政府对学校进行检查。

1940 年，在追求升学质量的影响下，开始关停人数少于 20 人的学校，最后保留了 47 所完全小学和 50 所中心小学，这些学校在当时叫做模范学校。而所谓的模范学校就类似我们现在的重点学校。集中力量办出的这些优质学校，是作为其他学校的教学模范。当时的口号是“办好一所模范学校，可以激励十所其他的学校办得更好”，所以把经费和师资等等资源都倾斜到模范学校里面。这时候建立的教育体系基本上和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的教育体系相同。

学校与学生数降低比例，1942		
县乡	学校（%）	学生（%）
盐池	44	30.5
合水	70	33.8
延安	50	
甘泉	53	
胡安	56	
安塞		48

可以想象，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学校数量下降导致村里的学生上学困难，因此辍学率攀高。从上面的表可以看到，有一些县乡 70% 的学校都被关停了，即使在延安市内也关停了 50%。上表展现的市县学校关停比例基本上是 40% 以上，最严重的乡县有 70% 的学校被关停，学生人数下降 30% 左右。

面对入学率下降和辍学率的提高，政府又开始思考怎么能够进行调整，既要入学率增加，但是又不要使得公立学校数量增加太快。其结果是实施办学双轨制——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并举。公办学校是一百所左右前面提到的模范学校，而民办学校由村民和乡民组建成立，其办学经费、挑选师资、学制长短等等一系列事务的决定权都交给本地居民。然而，农民对于民办学校的热情不高，因为他们知道民办学校教学质量低，相比之下，公办学校上学成本更低，老师更好，所以他们都愿意去公立学校，而不愿意去民办学校，而且认为民办的学校给自己增加了经费的负担。双轨制是 1942 年开始进行的，不久整风运动就开始了，整风运动之后民办学校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正规化运动也整改了师范教育。当时的中学只有六所，其中有四所是师范学校。教育正规化之前，师范学校主要承担短期培训，以较短的周期（两三年）产出教师，短期的培训之

后就分配下去担任小学老师，以应教师短缺之急需。1941 年教育正规化运动修改了师范课程，包含了普通中学的所有科目，并在 1942 年进一步规定，普通中学的学制是六年，师范为五年。并且对中学招生，包括师范学生，执行严格的入学考试。入学者必须有完整的小学生学习经历，通过考试才能进入。这一系列的正规化举措，目的是为提高教育的质量，而实质是在困难条件下放弃了普及教育平民路线，转而拥抱质量为先的精英教育！

## 6、延安整风运动与教育改革

1942 年之后进入了延安整风运动，持续到 1944 年，主要纠正左倾思想，也包括教育政策。正规化教育制不符合当时根据地的实际，所以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提出教育要和群众结合，而不是脱离群众。教育部提出：“正规化教育只适合和平时期，适合城市生活以及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高级阶段；正规教育是未来的教育，它不适当当下的现实。陕甘宁边区的现实是战争期间、是武装斗争、是非常贫困的农村。”这种批判的口径是条件论，并没有对正规的教育体系本身提出批判。

抗日战争时期边区学生的出路只有三条：回家务农、做干部、继续深造。而批评者发现，正规学校体系不能实现任何一个目的。回家务农？所教的内容对于回家务农一点帮助都没有，不实用。做干部？它也没有能够培养学生能够做干部的能力。继续深造？没有那么多的中学，没有那么多的高校，基本上高小（四至六年级）数量都不够，既没有师资，也没有经费让学生继续深造。所以所谓的正规教育体系不能实现任何一个目的。

整风运动主张群众路线，教育方案也要贯彻群众路线方案，因此教育改革遵循因时因地制宜的原则——即教育不是为了适应某一套所谓正规的形式，也不是为了适应某一套从国外学习而来的这个模式，它不一定需要固定的课程，不一定固守所谓某理论体系，它要因时因地制宜解决当前生产生活中的直接需求。每一个阶段的学校，初小、高小、中学、大学都不以升学为目的；学习形式也是灵活的，可以有夜校，可以有流动课，可以有半日校，可以有全日校，可以有扫盲组，可以实行小先生制等等；它是全民参与的学习，面向实践的教育。这就是延安道路群众路线指导下的教育方案。

小学的形式由公办民办双轨制变成了公助民办模式。公办的模范小学先改为初小，然后逐步改为全部民办。所谓“民办”是什么意思呢？民办就是把这个学校交给本地的村民或者是乡民管理，他们可以自行决定学校的所有事务，例如学校的选址、经费来源、聘请谁做老师、教师的工资、学生人数、每天的学日长短、学制的长短、科目的选择等。民办的初小不要求统一。有的学校可能只学识字不一定要学习数学或其他科目，村民和乡民对此有决定权。政府可以推荐教师，但是聘任教师的最终决定权在村民。但是有一点明令禁止：儒学的经典，如三字经等等一系列的著作，四书五经这些以前的封建课程不可以作为学校的教材。“公助”主要是引导群众对教育的认识，检查学校教学。

在民办公助实施的一两年之后，也发现了很多的问题，主要是以下三方面：师资的问题，领导的问题，经费的问题。领导的问题在于教育改革是自上而下命令式的，并且所有学校事务交由乡民全权管理，执行公助的县干部觉得自己能管什么呢？乡民不都已经管完了吗？需要领导什么呢？因此有的干部就在两个极端中徘徊，要么大操大办，要么就是不作为、什么都不管。针对这个问题，教育部指出，干部的领导作用关键在于引导群众认识教育的重要性。

然而当时民众的办学意愿不高，当时文盲率还在 70%左右，有的地区更高，群众不认为学校教育是必要的。某些民众甚至憎恨学校，因为之前的正规化教育会削弱家庭所需要的劳动力，学生在读完书以后不愿意回到乡村、不愿意回家务农。一方面学校教育培养出“三年不认爹和娘”的“白眼狼”学生，一方面农民又要自己出钱建学校，所以他们认识不到学习的意义，甚至觉得学校在抢占家庭劳动力，所以乡民对民办公助建立小学的方式很有抵触！而干部的领导作用就是要帮助学校联系农村实际生活，引导群众的正确态度，让群众懂得，我们不一定需要医院，但是我们需要健康；我们不一定需要学校，但是我们需要文化；要让他们知道学校对于他们生产生活的意义。

此外师资和经费也是办学过程中持续存在的问题。解决师资短缺，当时主要是通过短期教师培训方式扩大教师队伍。对于经费问题，解决途径可以通过给予小学一块公用的地，这块学校用地可以由家长来耕种，也可以由小学的老师同学自己来耕种，耕种所得可以用来支持学校。

小学的目的是为了学生回到农村，回到家庭，进行农作，教学知识是为了服务于生产生活。而中学和大学则是为了培养干部和专业化人员。在群众路线的教育方案下，中学和大学的录取并不严格要求学历，地方干部和工农子弟可以优先获得学习机会。中学的课程进行了很大的精简，由六年减低到三年，并且减少至八个科目，音乐、体育、美术、军事等等都设为课外活动，专门有一个学期用来进行职业培训，每年学生要从事一个月左右的生产实践劳动。大学也注重生产实践，而且以自修为主，教学为辅。这与毛泽东在长沙开办的自修大学一脉相承，发扬毛所认为的中国私塾教学中的优良传统，每个学生的进度可以不同，学习注重自主性，老师的教学作为辅助，而不是像正规化教育体制里那样必须执行统一的教学计划、完成统一的教学进度，跟不上进度的学生就变成差生。自修为主、教学为辅的方式照顾了学生的不同能力，同时因为没有了升学的要求，所以不会出现差生淘汰的现象。

## 7、新中国的早期教育制度

延安教育模式并未持续很长。解放前夕，1949 年在北平召开教育大会，即制定了教育要回归正规体系的方针，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教育路线被完全抛弃。因为整风运动中，对于正规教育的条件论批判，并非从根源上批判其精英化问题、脱离实际生产生活的问题、脱离中国实践的问题。延安道路只是临时性的、应急性的经验，当条件好转，即应该恢复正轨。

1948 至 1949 年，质量和数量的争辩又浮出水面，民办学校被取消，恢复全公立体系。新中国成立早期，教育目的又重新回到“为了升学”、“为了出人头地”，各级基础教育都为升学做准备，取消了教育要服务于当地生产生活的目的。在这种正规化体系下，教学质量与教学数量的矛盾，即精英与大众的矛盾重新出现。对教学质量的重视占了上风，重点学校、升学考试、统一的教材、统一的科目、统一按照年龄和学生的考试成绩而进行分班等等一系列的规范又重新回到教育体系中。

很快这种正规教育模式就表现出两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第一，教育性质的问题。正规教育以升学为目的，升学是为了成为知识分子，成为干部，这样的教育是给个人提供“变成精英”、“变成人上人”的通道，并且有利于建国前的资产

阶级、地主阶级的子女。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文盲率至少在 80%以上，工农子女长期以来没有接受过教育，在应试教育的考试（分数）选拔下必然是原先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子女占有先天优势。所以这样的教育必然会加剧社会不平等，有利于建国前的统治阶级，而不利于广大的工农群众。这种教育的性质是为了培养少数的、脱离人民群众的、享受特殊待遇的精英，而不是服务于工农大众。这促使毛泽东认为“前十七年的教育是资本主义的教育，是被资产阶级控制的教育”。

精英化的正规教育从课程和制度上有三个表现：一是脱离了生产和生活；二是脱离了工农；三是脱离了师资不足的条件。这种教育主要教授理论知识，而这种理论知识服务于考试和选拔而不是服务于生产生活，最后升学选拔的功能又不能惠及工农群众。因为经费和师资不足，连初小一、二、三年级都供给不足，升学的学位也不够，毕业生非常少，工农群众被挡在学校门外。

第二，教育性质的偏离自然带来教育不平等的问题。首先是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平等，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情况之下，还存在很大的区域差异、农村和城市的差异。农村是低质量的教育，城市是高质量的教育，其中城市还有重点中学和重点小学，这就形成了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等级体系。其次是选拔考试的不平等，考试和升学对于家庭文化的要求就很高，工农群众的文盲率有 80%，他们受教育机会少，通过层层考试晋升到中学，最后考上大学的机会很少。区域的差异和家庭文化的差异，就造成了工农在教育领域被排挤。所以毛泽东在往后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中着重强调教育和工农结合、和实践结合、和生产劳动结合。

## 8、大跃进和文革期间的教育实践

后来在大跃进中实施了两条腿走路，重新开始实施半日制学校——即刘少奇提出来的半工半读、社来社去。社来社去就是指公社来、公社去，把非正规教育和正规教育结合起来，在农村地区开办农村学校，这其实是恢复教学双轨制。农民清楚地知道社来社去的半日制学校是不能够实现个人晋升的，只要存在一条正规学校的晋升通道，这种次等的学校是不会受到欢迎的，因为双轨制代表的是两个不平等的社会等级，没有民众愿意被划入次等的轨道。

在大跃进条件下，看起来比较激进的半工半读、两条腿走路等一系列措施对于突破当时正规教育的弊端有重要意义，虽然实际上的作用有限。而文革中发生了更加激进的教育革命，才颠覆了正规教育体制的僵化等级模式。

首先，重点学校和大学考试被取消。国家大力鼓励非正规学校，并且在农村兴办民办学校。那么师资从哪里来，经费从哪里来？师资也就是新的文化资本和知识分子的再分配。知识分子和青年下乡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民办学校、村办学校等一系列农村学校主要的师资来源。知青下乡后来被许多人诟病，但这的确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大规模的城乡逆向人口流动！

取消大学考试后，工农兵学员选拔依靠集体推荐，推荐的机制各地不同。当时在推荐的问题上发生了很大的争论。一部分人认为推荐会导致腐败，会把权力都集中在当地的干部手上。干部会通过关系，依靠自己的权利，把自己的亲戚朋友推荐上去，所以推荐是不公平的。另外一些声音认为，推荐制度是否有效取决于群众监督是否有力。如果地方的群众监督机制



不强，那么干部就可以操纵推荐的制度，实现自己个人和小团体利益。但是在群众监督机制比较完善的地方，（比如）陕甘岭的贫下中农委员会力量比较大，干部不能一人说了算。在这种情况下，工农兵学员的推荐相对来讲就公平很多，能够基本上符合当地普通人民对他们的评估。



其次，缩短学制、重视实践。小学变成5年，中学变成4年。以前是12年，现在中小学合起来变成了9年，精简了课程、缩短了学制。这对于节俭教育的投入，教育的师资经费等一系列问题都是很重要的。在大学里面，不再由知识分子的精英管理大学，而派驻了工人委员会领导和管理大学。因此，大学里面更加注重生产实践，减少理论的教学。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维度就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脑力知识和体力实践相结合，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劳动实践的具体要求。大学要办工厂，有的工业院系和工厂合并，把理论和实践直接结合在一起。脑体结合的一种方式是由大学办工厂，院系和工厂合并。还有一种路径是工厂办学校、公社办学校，产生了劳动大学。有个电影叫《决裂》，就是把劳动大学办到农村去，把课堂搬到田野里，和农村的生产生活直接结合起来。这个电影批判了所谓正规体制理论和实践脱节，产生脱离劳动脱离群众的知识阶级。而工人办学校和公社办学校要求学校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都和生产生活紧密结合。

此外，在大学里面取消知识分子和干部的高级福利待遇和特权，并采取集体学习、互助学习的教学方法。当时大学里的工农兵学员不是按照年龄和学历考试一层一层筛选上去的，所以工农兵学员在一个课堂里面可能年龄、知识结构、能力相差很大。在这样一个多样性的学员体制里，采取的教学方式就是集体学习、互助学习。有的学校提出的口号和后来美国小布什的教育口号非常相似，叫“不让一个同学落后”。先进的同学帮助落后的同学，互助学习。现在的大学，拿到文凭之后，大家希望的是加工资、换工作、晋升头衔、晋升阶层。当时的工农兵学员推荐进入大学，学习结束后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理论和实践知识，而不是为了个人晋升。



上述这一系列教育领域的革命，推翻了整个源自西方的正规学制、正规课程、正规师资，以及整个评估体系。对于它的效果有两种争锋相对的意见。一派传统的知识分子，即所谓的专家认为，虽然学校增加了很多，学生入学率和升学率大大的提高，但是结果导致了教学质量的降低。这仍然是质量和数量的权衡。在专家那里，他们看到的是质量的降低，尤其是知识分子认为大学课程的水分太大了。然而，站在阶级立场，虽然知识分子和干部子女获取的知识质量降低了，但是我们要看到在扫盲方面、在农民和工人阶级教育普及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因为这些成就，七十年代中国的教育制度成为联合国表彰的发展中国家典范。

至今文革的教育革命依然引起重大的争论。我们对于学习成效方面争论非常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教育机会的公平得到了大大的改善。工人和农民入学和升学的机会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教育不再仅仅是抽象的理论学习，不再是为了升学和个人晋升。教育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回应了当地生活生产的需要，为当地培养了很多农业和工业技术人才。只有他们直接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生产生活当中去，而不是为了去考试升学，他们才能够把精力放在解决实际问题上面。八十年代初，当教育重新回到正规化的道路上，重新成为社会地位晋升的通道，处理本地的、社区的生产生活中的实践问题，就不再是学生和老师的重点，也不再是学校优先考虑的问题。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西方引进的正规化教育模式，其内部隐含着城市与农村、精英与工农大众、理论与实践、资本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在国民党和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没有群众路线。只有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目标下才产生了群众路线，才产生了精英教育和群众路线教育模式之间的矛盾。数量和质量或者所谓的普及和提高，反应的实质是不平等的社会等级，对应的是精英和平民的阶级对立。这种现代教育模式引入中国之后，重复并且加强了中国传统教育下教育作为社会晋升阶梯的功能。传统的科举制就长期忽视实际生产和生活实践需求，宣扬蔑视体力劳动等一系列的价值观。在新的现代学校教育模式下，这些价值观和社会晋升功能取得了新的内容。中国近现代在突破正规化教育模式、争取阶级平等、改造教育目的上所做出的种种尝试，为我们今天反思、批判、和解决教育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思想资源。

## 9、问答环节

**问：为何现在有很多人会感谢恢复高考？**

恢复高考好不好，这取决于你站的位置。如果站在农民和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你会觉得取消高考是个好事情，因为可以通过推荐，获得上学的机会。但是如果站在专业知识人员、专家的角度，就会觉得取消高考是糟糕的。大学招生的时候，都希望招到北大清华，甚至美国最顶尖大学的学生，因为他们的知识结构完整，水平高，在学科领域里，创造新知识的可能性大。但精英学校的学生往往都来自精英家庭，这又促成和维持了阶级的不公平、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的不公平。

高考恢复到现在 40 年，我们看到一波又一波底层工农的知识无用论。为什么？因为他考不上。对他们来讲，恢复高考是一个绝望的事情。即使他认为还有一点希望，那也是非常零星的。很多人在小学，最多到初中，就已经放弃了。但对于旧的知识分子阶层、资本家阶层、地主阶层，后来的干部阶层来说，他们在高考中获利相对容易，当然会支持。而在文革当中，他们的家庭优势被剥夺了，知识分子被迫到农村去，考试制变推荐制，他们也得不到入学推荐，家庭文化资本得不到发挥。恢复高考的时候，这些阶层的人当然很欢迎。所以，恢复高考，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这取决于你的立场。

**问：在人才大战里，中小城市无法有效吸引人才是一大问题，尤其因为子女教育难以跟一线城市竞争，那么教育资源不平等如何破解，有希望吗？**

今天我集中谈的是农村与教育的关系。事实上，历史上的群众路线也好，乡建运动也好，这些教育变革都是受到中国农村的刺激，所谓的发现乡村。因为农民问题，刺激人们去反思农村教育的问题。但农村问题并不只是农村的问题，其实质是反映了社会阶层的不平等关系。今天的农民已经跟解放前的农民很不一样了，从生活条件、生产条件、知识文化水平上都大不相同了。但是，社会不平等的阶梯却仍然存在，这一点没有改变。

你提到中小城市的问题，它无非就是这个不平等体系中的一级阶梯，它处在农村的上面，可能比农村能够吸引一些人才，但是他跟更大的城市、更发达的经济地区相比，它又显得有劣势。所以我们在考虑农村问题的时候，可以一叶知秋，看到整个教育体系的层级，它表现的实际上是一个更深更大的社会等级体系，地区差异也好，阶级差异也好，这是社会不平等的问题。

教育内部的不平等，例如落后地区吸引不到人才，还有经费的问题等等，它只是更大的社会不平等或者更大的区域不平等的一个表现而已。所以你问有没有出路？出路当然有。就像历史经验所呈现的，在延安时期，有局部的、小规模激进尝试，在文革时期当然更加的激进，以克服现代教育（实质上是现代阶级社会的教育）内置的不平等倾向。需要用激进的方式打破正规化教育模式的桎梏，使人才能够往回流，否则通过学校这条路一路往城市去、往社会阶梯和职业阶梯的高处去，没有往下的制度设计，很少有人会自愿地选择向下流动。只能通过政策，甚至在文革当中是行政的手段，使城市人力资源能够回流到乡村和欠发达地区。

文革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有史以来唯一的一次大规模逆城市化的人口迁徙，没有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出现过这么大规模的逆城市化迁徙。我们今天看到的农民工问题也好，留守儿童问题也好，农村家庭陪读等等，都是一个农村向城市迁徙的运动。只有在文革期间实现了一次逆向迁徙，这是通过行政命令来实现的。在今天的条件之下，我想没有这个政策的可能性，没有相应的政治环境。

**问：历史的经验对于我们当今的农村教育问题有什么启示？**

刚才我们讲到民国时期和文革期间对于正规教育体系的批判。大家可以考虑在今天的教育体系里面，这两个问题还存不存在？第一个问题就是三个脱离，脱离实践、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还存在不存在？二是教育成为个人晋升的主要途径和主要阶梯，即精英化取向，这个问题存不存在？目前，基础教育普及率，甚至高等教育普及率，都远非昔日可比。但是整个教育的内容脱离实际，尤其是脱离农村实际，这个问题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当然这个历史对我们是有启示的。

第二个就是不公平的问题、不平等的问题存不存在？目前一样存在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存在工农阶层的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教育体系内部也存在层级差别，重点学校、非重点学校，现在还包括公立、私立、国际学校，还有包括中国的 211 大学、985 大学，一层一层的教育体系，这些教育层级之间内部的不平等，它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历史的经验对于我们是有启示的。

那么，历史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我们现在的全民教育水平已经比以前高很多了，从之前 80% 的文盲率，降低到 3% 的文盲率，普及九年义务制教育。这些都是进步。但是为什么现在的大学生到农村去，往往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为什么即使打工仔回到乡村也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毕业生从事农村生产，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还不如他们的文盲父辈。为什么？如果我们的教育知识水平已经比以前高了那么多，如果教育没有脱离实践，为什么受了教育的人，他回到实践当中，会没有用武之地无事可做？

历史的经验对现在有什么启示？我们要看当时的问题在现在还存不存在，如果存在，那么当时的一些解决思路 and 办法，在今天就有借鉴意义。

**问：请您谈谈对于农村撤点并校的看法。**

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农村撤并学校在延安不就发生过了吗？

现在的撤点并校是在 90 年代开始的，大概进行了十几年，到 2012 年中央正式喊停，但是停不了。开始是出于节约资源的考虑。农村学校比较分散，随着生育率降低和外出打工人数增多，农村小朋友人数降低，学校达不到规模效应。在县域经费有限的条件下，觉得合并这些学校，取得规模效应，然后把师资经费都集中到中心校或者某几个村几个学校，那么财政效益可能会高一点。但是就像四十年代的时候，合并以后学校减少了，上学的困难增加了。很快上学的年龄自然就往后推，经常会在农村小学看到大龄的孩子，为什么？学校太远了小孩路上不安全。当然在上学不容易的情况之下，由于性别歧视的问题，当然是先保证男孩子上学，所以女生往往上学的年龄就比较大。

撤点并校带来的结果就是村庄里面的学校在很多地方消失了。不到 20 年的时间，大概减少了 90 万个学校，主要是在农村。如果再回到民办公助的延安道路，它不光是为了普及教育，不仅是为了扫盲，很大程度上民办学校是为了给当地的农民赋权，让他们取得知识、学校等等公共事业的管理权。这个作为整个整风运动联系群众、发动群众的一部分，是群众路线的具体方式。现在撤点并校之后，村子里面一个学校都没有，没有公共事业，没有让他可以参与管理的事务。

学校都没有了，当然更谈不上课程如何结合实践，是不是要解决当地的问题，是不是和当地生产生活相联系。学校机构都没有了，发动群众不更是无根的水吗？所以撤点并校，起初的问题当然是行政资源效率，但事实上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一个行政后果，也不仅仅是一个教育后果，而是整个乡村文化机构的消弱。未来的文化与乡村相结合的组织机构在哪里？学校是一个核心文化机构，而现在很多乡村都消失了

# 日月如梭



## 学生接连自杀，向“吃人”的教育制度开火！

作者/乌有之乡@小浪淘沙

集/Venti@red-venti.xyz

---

摘要：只有保障学生的民主权利，保持师生平等的关系，废除应试教育，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教育才能使学生得到解放，才能避免一起有一起学生自杀的悲剧！

---

最近在网上看到两则学生自杀的新闻：

一是山西太原大二学生因为考试作弊被发现后跳楼自杀，校长表示监考老师处理并无问题，同时表示了自己悲痛的心情，目前家长已与学校达成和解。

二是6月4日常州一位五年级小女孩在作文课之后跳楼自杀身亡，学生家长维权被维稳。

在网上随便一搜都可以看到学生自杀的新闻，比如微信公众号“岳阳日报”爆料上海市自复课以来已有20多名学生自杀，真是惨不忍睹的现实的啊。



山水网帖子被删，发抖音封号，微博最开始几个视频也被删了，不拉横幅又有几个人知道这件事。虽是下策，但也没法了。



特警+民警人还怪多，大概有家属的五六七八倍吧。这么多人，天天埋伏在学校周围，有那功夫查案嘛早就水落石出了。可惜，截止6.9晚，5、6天

作为一名学生，都已经习惯了学生自杀的新闻。大家听到类似的消息，或者是觉得这学生有些傻，不值得这么去做；或者觉得应该把老师带走（比如常见的研究生导师欺压学生导致自杀）；或者觉得学生本人心理有问题……

但是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自杀问题呢？每个月在网上都能看到几起学生自杀的新闻，这只是九牛一毛冰山一角，全国每年又有多少学生自杀呢？这么多学生自杀，有关部门又采取了什么措施应对呢？

以中北大学自杀的学生为例，不少人说学校处理的没有问题，舆论不要绑架学校，言外之意就是这学生活该。

老师处理的是没有问题，符合规则，但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就因为一次考试作弊而凋零吗？

他的自杀对他自己无疑是最大的损失，他的家庭抚养他花了多么大的代价，出了这样的事故又是多么的伤心。而对于社会，无疑也是一个大的损失，培养一位大学生，国家也要投入不少资源。



问题不在于学校处理的有没有问题，而是这样的现象是不是合理，原因是什么，该怎么办。

五年级花季少年的陨落则没有什么争议，肯定是老师的责任。如今班主任俨然是一个班级的太上皇，掌握着学生的生杀大权，学生和老师之间毫无平等可言，老师体罚甚至侮辱学生，绝大多数学生只能忍气吞声。钟美美的模仿视频就真实的再现了这类老师的嘴脸，然而却被和谐掉了，这又是为什么？学生连吐槽的权利都没有。

当然学生自杀是极端的案例，相对比例不是很大，但这并不能说明其他没有自杀的学生就没有类似的遭遇或者问题，只是他们表现的不明显。

**这不是个例，而是普遍的现象，这是整个教育制度的问题，我们必须反对这种残害学生生命的教育制度。**

为什么说当下的教育制度吃人？

当下的教育体系下，老师对学生拥有无限的权力，而学生不得反抗，如果学生和老师过不去，老师有一百种方法给你穿小鞋，这在研究生导师和学生的关系中表现的最为明显。这是把学生培养成奴隶的制度，美其名曰“尊师重道”。

**老师批评学生，学生有没有反驳的权利？**老师让学生往东，学生能不能往西？

再加上市场经济拜金主义的泛滥，教育成了赚钱的生意。笔者老家的小学乃至幼儿园，家长给老师送礼已成为不成文的规定，过个教师节，不送张购物卡，你孩子在学校就没有好果子吃。有的天真的学生在教师节精心为老师准备了自己制作的礼物，却被老师丢到一边（老师看不上，想要点更实在的），这对学生是多么大羞辱和伤害！再比如老师利用课外补习班或者订购各种学习资料牟利，有哪个学生敢不从呢？

当然我们不排除有很多良心老师，但是这些良心老师能改变学生奴隶一样的地位吗？

**不能！**

而且不少老师也成了当下教育制度的受害者，学生极端的反抗杀掉老师的新闻也屡见不鲜。当下的教育制度使学生成为奴隶，而老师被迫成为奴隶主，学生没有一点民主的权利，而老师则是握有绝对权力的独裁者。

列宁对这样腐朽的教育制度看的很清楚：

“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教育工农的年青一代，倒不如说是对他们进行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训练。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使之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

在当下的学校，不就是这样对学生进行灌输的吗？制定各种严苛的学生守则，如有违反，轻则教育，重则打骂，还有叫家长、回家反省，这不是把学生当奴隶吗？

在这方面，衡水中学是高手，驰名全国。在这样的环境中浸染十几年的学生的奴性有多强，大家自己去体会。**当然学校是个小社会，社会是个大学校，学校的这一套，根源在社会，无法多讲。**

学校扼杀学生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应试教育制度。把千百万的学生倒进同一个模子里，像流水一样的生产出来，学生的各类天性基本都被扼杀，成为了一架做题机器。

有的为高考制度辩护，说这是唯一公平合理的选拔制度。且不说城乡贫苦家庭的学生在学习条件方面无法和有钱人家庭的孩子竞争，这次疫情不是曝出很多山区儿童无法上网课的新闻吗，他们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有的甚至连参加高考的机会都没有。

一个营养不良的儿童和一个身强体壮的孩子同台竞技，你告诉我这公平吗，结果不是在比赛开始之前就已经注定了吗？有钱的或有权的有一百种方法把他们的孩子送进清华北大，这也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了。





应试教育的“唯分数论”，扭曲了学生的价值观，高分就是一切，高分就是爹，低分就是弟弟。一次考试尤其是高考失利，就足以让不少人动跳楼的心思。另外学习压力大，学生精神紧张，身体健康由于高强度的学习受到损害，也有不少学生直接或间接因此丧命，**这不是吃人是什么？**

毛主席早在六十多年前就指出了应试教育的严重弊端和吃人本质：

“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學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

中北大学的学生不就是被这样的教育制度摧残摧毁掉了吗？可惜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后来没实行下去。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两会期间有人提出了让孩子接受“挫折教育”。什么是“挫折教育”呢？这就是给孩子们灌输奴隶思想，遇到问题要逆来顺受，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嘛，就不用跳楼了嘛。

学生在学校受到压迫为什么不让他们接受“反抗教育”或者消灭压迫的土壤，却要搞什么“挫折教育”呢？



**这是培养彻底的奴隶思想！**

只有保障学生的民主权利，保持师生平等的关系，废除应试教育才能使学生得到解放，才能避免一次又一次学生自杀的悲剧。

如何实现这一解放呢？

**没有什么救世主，只能靠我们自己。**

手段有很多，虽然不见得能一下子解决问题，但是也能解决部分。做了丑事就怕曝光，比如学校利用学习资料赚钱、老师性骚扰学生、校园霸凌等等问题，通过网络曝光，是可以得到部分解决的。

在当下的教育制度浸染多年，很多人都已经习惯了，如果改变不了，那就去适应它，这是很多的“阿 Q 精神”。人们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更好的教育制度。那我们就来看看被废除的毛主席教育路线是什么样的，一个 17 分钟的七十年代教育问题小纪录片中里面老师对待学生的错误是这样的态度：

问(采访者)：你们会惩罚学生吗？

答(老师)：不惩罚不惩罚(连连摇头)，大家开个会解决解决思想问题，提高认识就可以了。以前(CR 之前)我们有权力惩罚他们，让他们到墙外边站着去，听两节课，需要的话，把家长请来，甚至还可以开除他们。现在就不是这样了，师生平等了，办事讲道理。

学生：把我们的意见和老师交流一下，发扬民主。

# 结束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救救工人的孩子！

作者/@新工号 51  
集/Venti@red-venti.xyz

摘要：资产阶级的学校让教师处于绩效考核的高压下，变成碎片知识的传声筒，教师为了自己的一口饭吃，死命地从学生身上榨出成绩。除了以分数取人，教师还主动迎合主流思想，维护旧秩序，用所谓“正能量”去打压孩子对社会的批判性思想，把孩子逼死！

**编者按：**这是一位基层中学教师的来稿，长期的教师工作让他目睹了目前教育制度对下一代的种种摧残，而社会主义的觉悟又让他能够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做出批判，最宝贵的是文章饱含着对工人阶级的情感和对压迫阶级的愤恨。

我们热切期待更多工友及社会各界人士揭露资本主义的黑暗！

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从多个方面摧毁无产阶级后代的身体和灵魂！

首先，教科书编排程序把知识体系打乱，没有系统性，也就是知识碎片化，使得更多的孩子无从归纳总结，更谈不上理解掌握！

比如数学课本，加减乘除按照顺序来，这既符合知识层次递进由浅入深的规律，又符合孩子大脑发育的特点，然而资产阶级是这样做的：先学加法，突然来个几何三角形，又来一个统计，不一而足。

人教版一年级上册 数学目录	人教版一年级下册 数学目录
1.准备课	1.认识图形(二)
2.位置	2.20以内的退位减法
3.1~5的认识和加减法	3.分类与整理
4.认识图形(一)	4.100以内数的认识
5.6~10的认识和加减法	5.认识人民币
6.11~20各数的认识	6.100以内的加法和减法(一)
7.认识钟表	7.找规律
8.20以内的进位加法	8.总复习
9.总复习	

新工号51

比如历史按照时间编年体学习，就是历史学科的特点，也是大众学习知识的习惯，可他们却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古今中外，文化政治，胡乱穿插！非得把一般人的大脑搅混。

## 历史必修1

### 第一单元 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第1课 夏、商、西周的政治制度

第2课 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

第3课 从汉至元政治制度的演变

第4课 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

### 第二单元 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

第5课 古代希腊民主政治

第6课 罗马法的起源与发展

探究活动课 “黑暗”的西欧中世纪——历史素材阅读与研讨

### 第三单元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第7课 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建立

第8课 美国联邦政府的建立

第9课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欧洲大陆的扩展

### 第四单元 近代中国反侵略、求民主的潮流

第10课 鸦片战争

第11课 太平天国运动

第12课 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

第13课 辛亥革命

第14课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崛起

第15课 国共的十年对峙

第16课 抗日战争

第17课 解放战争

### 第五单元 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第18课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第19课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 第六单元 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与祖国统一

第20课 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第21课 民主政治建设的曲折发展

第22课 祖国统一大业

### 第七单元 现代中国的对外关系

第23课 新中国初期的外交

第24课 开创外交新局面

### 第八单元 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

第25课 两极世界的形成

第26课 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出现

第27课 世纪之交的世界格局

附录一 中外历史大事年表

附录二 重要词汇中英文对照表

附录三 历史学习推荐网站

后记

新工号51

在这样的教育之下，占社会人口极少数的官僚和资产阶级，利用最昂贵的教育资源，另辟蹊径，学得更好更精；而大多数底层百姓的孩子却学得迷迷糊糊，最后只能变为浑浑噩噩的产业工人！

其次，资产阶级的学校让教师处于绩效考核高压下，变成碎片知识的传声筒，教师为了自己的一口饭吃，死命地从学生身上榨出成绩。除了以分数取人，教师还主动迎合主流思想，维护旧秩序，用所谓的“正能量”去打压孩子对社会的批判性思想，把孩子逼死！

## 《三打白骨精》读后感

今天，我读了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三打白骨精》，出自罗贯中的《西游记》。

这篇故事讲了唐僧师徒四人来到了白虎岭，家又累又渴，悟空就去远处摘桃子给大家吃，悟空的祥云惊动了山中的白骨精，她早就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就想把唐僧给捉来吃了。可是唐僧有徒弟保护，不敢轻举妄动。便化作一个美若天仙的村姑，左手提着青砂罐，右手提着绿瓷瓶，向唐僧走来。这时，悟空回来了，他一眼就看出这女子是妖怪，一棒就打死了她，可妖精用了解尸法，真身化成轻烟飞走了，留下的是假尸首。可白骨精一不做二不休，又变成寻女儿的老太太和找妻子和女儿的老爷爷，可都被悟空识破了，唐僧见孙悟空一连打死了三个人，非常生气，便写下贬书，赶走了孙悟空。

这篇故事告诉我们：不要被表面的样子、虚情假意、伪装的一面所蒙骗。在如今的社会里，有人表面看着

新工号51

小学生缪可馨作文，被老师批评没有“传递正能量”

另外，各种补习资料的推销员无孔不入，他们只关心年度销售业绩，从不在乎孩子的身心健康，死命地让孩子处在题海中不能自拔，让工人阶级的家庭背上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为了增加销售业绩，甚至对教师进行贿赂。机构领导不会容许例外员工的出现，而希望多赚点钱的老师常常无法拒绝这种形同犯罪的行为。

工人阶级在子女教育这个问题上，绝对显得盲目急躁，只能在疲惫不堪的工作之余，加紧对孩子的无限催促，变相地制造悲剧！孩子因为学习压力太大而自杀的新闻屡见不鲜。

社会上经常有人呼吁家长不要给孩子报这么多补习班、培训班，给孩子减负，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和无产阶级没有什么关系。想想，这些奥数班、美术班、舞蹈班、钢琴班、武术班等等学费动辄几千上万，有哪个工人家庭能付得起？这些艺术培训班实际上是为了小资产



阶级和资产阶级家庭准备的，他们的孩子到这些培训班里学习各种技能，提升综合素质，以后就能在职场竞争中更有优势，就能维持自己的阶级地位，甚至实现阶级晋升。这些教育资源，根本不是无产阶级能享受的！



这种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使得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与老师严重地对立起来了。

学生大多数是沉默的，但也有人会跳起来反抗，然而他们看不清问题，只能打老师甚至制造悲剧性事件！而老师也是惶惶不可终日，看不清这一切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教育市场化的恶果，只能悲叹一声：“唉，现在的孩子啊！” 家长也看不清，总是把老师作为直接反抗的对象，摇头说：“唉！现在的老师啊！”

近年来，学生和家长利用官僚阶级对教师的压迫，用偷拍，威胁，钓鱼等办法让很多老师吃尽了苦头，甚至丢了饭碗，可也没解决问题，反倒让自家孩子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两败俱伤！



安徽铜陵教师周安员和班上一名学生起冲突后，被学生家长扇耳光、索要赔偿，校方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周安员不堪压力而跳江自杀

**可怜啊！这个荒唐的资产阶级教育，把教学相长的师生关系闹得水火不容！可恨啊！这个吃人的资产阶级制度，让局中人不自觉地对着比自己还弱势的对方狠下杀手！**

最后，经历过这些机器般磨损的无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躲过了不堪重负而自杀，躲过了神经衰弱而痴呆，躲过了被顶替上大学，躲过了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躲过了人生路上的汹汹恶魔……——经受了长时间和高强度的摧残，他们终于加入了产业工人熙熙攘攘的大队人马，加入了他们从未涉足的被永远压迫着喘不过气来的未知生活！

鲁迅先生曾经呼喊：救救孩子！

**今天我们也要大喊一声：救救工人的孩子！**

——这一点绝不是危言耸听！

**让我们的后代拥有幸福的明天，就必须打破这资本主义制度，实行社会主义的教育路线！**



前几月与友人聊起高考移民的问题，发掘其中有颇多话题值得深思，比如其与教育公平的关系。我们想到，虽然大家都在就这些话题讨论教育公平，但“公平”的所指却总有微妙的差异。那么，高考移民维护或是打击了什么抑或谁的教育公平呢？前几日有人告诉我他正好将自己的思考撰写成文，与我分享。在我建议下，决定在自己拖更已久的公众号上登出，希望抛砖引玉，激发一些讨论。

今年4月份，“深圳富源学校现衡水中学高考移民”的消息刷爆了微博和朋友圈。网上流传出一份深圳市高三年级第二次模拟考试学校成绩分布单，在这份成绩单中，民办学校宝安区富源中学进入前十的考生人数为6人，远超深圳最好的四大中学，随后有家长质疑富源学校违规进行高考移民。最终深圳教育部门证实了富源学校进入此次“二模”前100名的学生中，有10余名学生均从河北衡水第一中学转入，查实富源学校2019年高考报名考生中，有32名考生属“高考移民”，他们被取消了在广东的高考报名资格[i]。



这次事件再次引发了关于“高考移民”的全民讨论。高考移民一般是从录取比例较低的生源大省，向录取比例较高的地区迁移。考生迁入户口之后，大多仍在原籍念高中，而在迁入地只是空挂一个学籍，或每逢学业水平考试等重要节点回来“应卯”，其余时间均在原籍就读。这样一来，在迁入地参加高考时相较其他考生就具有更大的优势，更容易考上理想的大学。直观上理解，如果迁入地区接纳的高考移民越来越多，势必加大当地高考的竞争烈度，降低当地的高考录取比例，从而损害当地其他考生的利益。所以这次事件中，有很多广东的家长在为他们的下一代“发声”。

而高考出分后，又有“河北8000多人高考0分”、“辽宁高考分数线大幅提高”等消息，这让很多网民产生了“大量高考移民从河北移民至辽宁”的怀疑。虽然官方解释8000多人缺考或被取消成绩等情况属于正常现象，由河北移向辽宁的高考移民也不可能达到6万的量级，但这些或真或假的统计数字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心理反应，让矛头几乎都对准了主要来自河北的高考移民。

其实高考移民在河北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在这样的竞争残酷的生源大省里，“高考移民”早就形成了大大小小的产业链，这些产业面向的群体则各有不同。对于经济实力雄厚的家庭，子女在中学阶段就可以参加英语等培训课程，直接避开国内的高考，移民去国外读书。

对于中产及以下的家庭，主要有两种途径可以走，第一种就是通过家长的社会关系及民间的高考移民中介来进行移民，移民目的地包括内蒙古、甘肃、辽宁、天津等，这些地区可能经济较落后、在录取分数上有所照顾，也可能人口较少、教育资源相对充足，总之共同特点就是录取分数线低，而且有一些政策上的漏洞可以利用。这就催生了大大小小的移民中介这样的灰色产业。2014年就有“衡水街头惊现江西辽宁高考移民房广告”的报道，类似广告在河北甚至随处可见。很多情况下对于这样的高考移民都要求购房落户，这就为高考移民带来了很高的成本，随着各地的政策收紧，高考移民的成本也在不断提高。在这样的移民过程中，可能也伴随着金钱、权力交易的过程，2015年“内蒙古自治区清退上千高考移民”的消息指出，这些“高考移民”的家长多为河北省公职人员，各种“移民”手法也在不断翻新，近40名经过重重闯关、在内蒙古参加高考的“移民”考生，手中甚至持有由内蒙古当地学校和教育局出具的连续就读的假证明[11]。



另一条途径则是由类似于衡水中学这样的教育集团主导进行移民。超级中学一方面收取高额费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移民，另一方面靠这种手段提高学校的名气，扩大教育集团的产业，可谓名利双收。但这样的过程造成了众多恶果，最明显的就是大幅度提高了本省的分分数线，增加了那些不经受“魔鬼训练”的学生考入更好大学的难度，也迫使省内的其它中学不得不效仿“衡水模式”，这是导致河北出现大量高考移民的最主要原因。在这样的过程中，超级中学主导的教育产业是唯一的受益者。通过省内异地掐尖，大量招收高价生、复读生等违规操作，超级中学在近二十多年来快速壮大，导致省内的市场已经不足以支撑其高速的扩张，于是“衡中模式”开始跨省输出，终于导致了这次的富源事件。

在这次全民声讨高考移民浪潮中，提到最多的关键词就是“教育公平”。深圳教育局在处理富源学校事件时在通报中也用到了“坚决维护教育公平”这样的表述。但是在当下的中国，“教育公平”的真实含义又是什么呢？为什么大家普遍感受到的是教育不公平、“高考移民又来抢我们的名额了”呢？

教育不公平表现在很多层次上，城乡差异和阶层差异是最明显的体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市场经济高度繁荣，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但相伴而来的也有城乡差距不断拉大与阶级的重新出现。在这个进程中，教育从一种事业逐步变化成了一种产业，教育资源也从相对均匀的分布状态逐渐向东南沿海、大城市、重点中学集中。



教育的稀缺性被不断地制造出来，在城市中出现学区房的问题，就是家长想让子女获得更优质的教育，在小城市中如果教育质量低下，家长则会想办法把孩子送到省会城市的重点学校读书，而在农村地区要想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就必须向“县一中”或者城市的中学靠拢。

表 2 流向等级与家庭阶层

		家庭阶层地位					总计
		下层	中下层	中层	中上层	上层	
初中后的流向%	最差职校	20.5	14.7	9.3	8.3		11.1
	一般职校	17.9	19.0	23.1	21.4	11.3	18.6
	较好职校	7.7	12.9	11.1	6.0	1.0	8.0
	较差高中	35.9	24.1	19.4	16.7	5.2	21.1
	一般高中	12.8	14.7	25.0	27.4	13.4	18.2
	最好高中	5.1	14.7	12.0	20.2	69.1	23.0
	总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有学者曾经分析了某地市区初中学校毕业生的流向[iii]，从简单的统计表格中就可看出不同阶层间教育的差异。在这样的格局之下，几乎没有人会认为“教育是公平的”。但是同时又有很多人会认为“教育（高考）是相对公平的”，因为大家考的是同一张卷子，凭的是“自己的能力”，这也提醒了我们，在当下的中国仍有一些维持教育公平的机制，比如九年义务教育、公办中学、高考制度，虽然教育资源的集中与产业化在不断侵蚀着教育公平，但

这些机制仍然给大部分人留下了继续“发展”的希望，于是高考录取机会的相对平等对于每个人都弥足珍贵。高考移民破坏的正是这种“相对公平”，于是招致了广泛的声讨。

然而除了城乡与阶层的维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地域公平。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人口密度以及教育资源丰富程度的不同，即使大部分地区的考题已经统一，在录取分数线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王后雄在其博士论文《我国高考政策的公平性研究》中指出，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分布存在京津沪和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差距拉大的现象，且90年代后期鼓励部分地区优先发展的政策导向影响了高校招生指标的投放，全国重点高校在属地的招生指标较大，出现了严重的“本土化”倾向。2004年，北京大学在北京招776人，清华大学在北京招373人，而其他省份一般不足100人。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在上海市的招生比例分别是51.94%，47.72%，中山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中南大学、四川大学分别在广东、山东、湖北、湖南、四川的招生比例分别高达67.29%、61.07%、53.85%、20.81%、39.12%，这种“本土化”倾向严重破坏了高考公平[iv]。

我国实行的高考分省定额录取制度虽然考虑了对欠发达地区的政策性照顾，但分数线与招生名额反映出的是各地区教育资源的结构性差异，这种差异又不单纯是教育本身的问题，背后折射出的往往是各地区人口数量的差异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这样的差异造成了像河北、河南这样的人口密度高、高等教育资源稀缺、经济上处于中等水平的省份具有很高的录取分数线，这就催生了高考移民的大潮。



2018全国各省一本上线率排行					
地区	报名人数 (万)	一本分数线		一本上线数 (万)	一本上线率
		文	理		
北京	6.3	576	532	2.15	34.13%
天津	5.5	554	527	1.85	33.64%
上海	5	502		1.45	29.00%
江苏	33.2	337	336	8.34	25.12%
辽宁	18.5	553	517	4.59	24.81%
黑龙江	19.04	490	472	4.17	21.90%
福建	20.09	551	490	4.19	20.86%
海南	5.88	655	602	1.21	20.58%
青海	5.1	475	403	1.02	20.00%
重庆	25.05	524	524	4.77	19.04%
安徽	49.9	550	505	9.41	18.86%
陕西	31.9	518	474	5.66	17.74%
浙江	30.6	588		5.31	17.35%
内蒙古	19.5	501	478	3.16	16.21%
山东	77.51	550	517	11.68	15.07%
四川	62	553	546	9.32	15.03%
湖南	45.2	569	513	6.78	15.00%
宁夏	6.95	528	463	0.92	13.24%
吉林	15.03	542	533	1.99	13.24%
河南	98.4	547	499	12.26	12.46%
山西	30.5	546	516	3.72	12.20%
贵州	44.17	575	484	5.23	11.84%
广东	75.8	550	500	8.77	11.57%
广西	40	547	513	4.22	10.55%
河北	48.6	559	511	5.07	10.43%
湖北	37.43	561	512	3.58	9.56%
江西	38	568	527	3.38	8.89%
云南	30.02	575	530	2.34	7.79%
新疆	20.74	500	467	—	—
西藏	2.53	460	445	—	—
甘肃	27.3	502	483	—	—

随着高考移民问题的逐渐曝光，各地教育部门对此问题逐渐重视起来，高考移民的门槛也在不断提高。但本质上高考移民可以说是一种市场经济行为，在各地录取分数相差极大的情况下，高考移民不可能被完全禁止，只是门槛在逐步提高，而不在乎这些经济成本的家庭完全可以更早做打算，从初中甚至小学阶段就开始移民，到高考时所有手续都完全是合法合规的。对高考移民政策的收紧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大型教育集团的资本扩张，但可见的是衡中模式在全国范围来说仍有广阔的市场。而且对于移民迁出地的人来说，移民具有一种天然的“正当性”，在地域不公平的结构下，移民可以说是一种对抗教育不公平的手段。

深圳教育局的“坚决维护教育公平”这样的表述，受到了当地家长群体的广泛支持，但这样的“公平”仍是一种狭隘的公平，本质上也只是维持现有的不公平的秩序。在处理高考移民时，仿佛整个广东省被视作了一个整体，大有让所有的广东家长都为之摇旗呐喊之势，但实际触动到的也只是广东当地少数重点中学及中产以上家庭的利益，这就造成处理高考移民的实际意义是相当有限的。高考出分后又有“富源学校未有学生进入广东高考前50名”的消息，意在表明高考移民没有影响到广东的“教育公平”，但潜台词也是：广东的优质教育资源牢牢地被当地的精英阶层把控着。而那些无法享受到本地优质教育资源的家庭，也有可能进行“逆向高考移民”，即花高价去外省接受“高强度的应试教育”，再回本省参加高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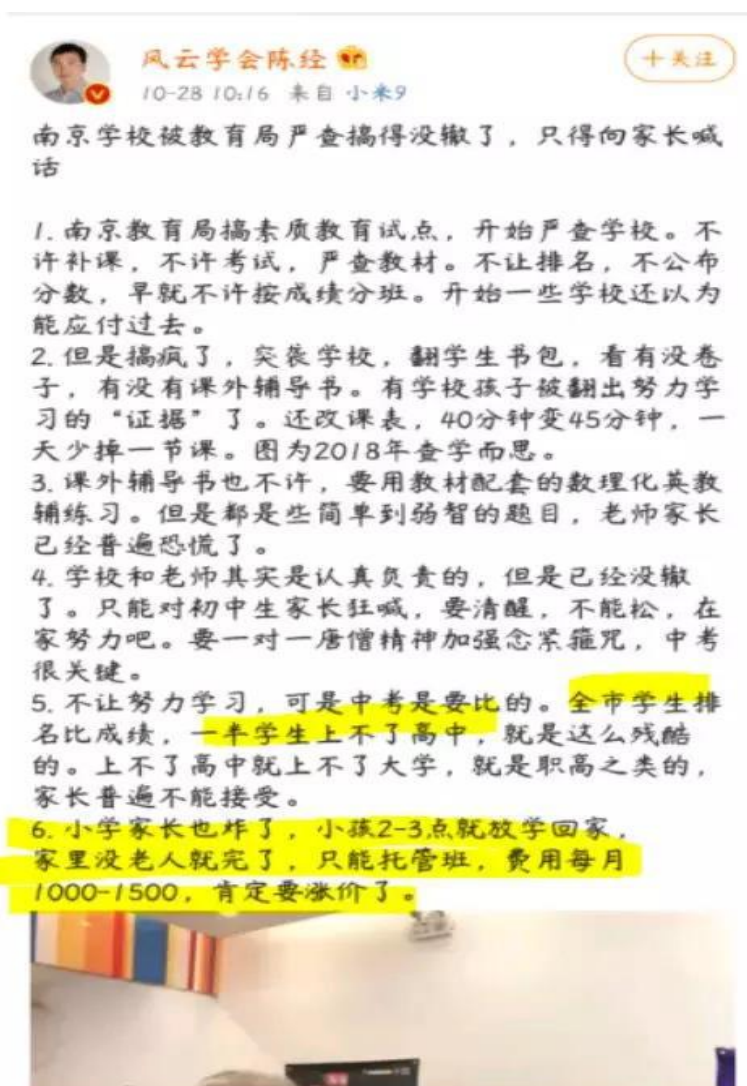
对于高考移民的治理当然是必要的，但从根本上说，教育不公平的问题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而是不同地区之间经济不均衡发展、阶级分化与固化的表现，想要解决这些问题，从教育考试技术与教育政策本身出发是远远不够的。在打击恶化教育生态的超级中学的同时，也必须警惕优质教育资源被精英权贵们垄断的趋势，在治理高考移民的同时，也必须要考虑教育资源在结构上的不平等。



## 素质教育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素质教育是一个好词。应试教育被认为是“训练考试机器”，相对于此，素质教育这个词涵盖人的思想道德素质、能力培养、个性发展、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等方方面面的提升，满足了对于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所应具备的主要特征的想象。

也正因为这个词的好，它也成了许多家长、学校和教育局官员推崇的对象。家长们让孩子从小就上各种辅导班，参加各种夏令营，培养各种各样的兴趣爱好；许多学校大力宣扬自己的教育模式是素质教育，吸引学生前来就读；教育局也紧跟时代潮流，用各种政策推行素质教育，甚至演变成了一种简单化的一刀切，于是有了近期成为一个热点的“南京严查学校减负逼疯家长”的事件。



风云学会陈经

10-28 10:16 来自 小米9

南京学校被教育局严查搞得没辙了，只得向家长喊话

1. 南京教育局搞素质教育试点，开始严查学校。不许补课，不许考试，严查教材。不让排名，不公布分数，早就不许按成绩分班。开始一些学校还以为能应付过去。
2. 但是搞疯了，突袭学校，翻学生书包，看有没有卷子，有没有课外辅导书。有学校孩子被翻出努力学习的“证据”了。还改课表，40分钟变45分钟，一天少掉一节课。图为2018年查学而思。
3. 课外辅导书也不许，要用教材配套的数理化英教辅练习。但是都是些简单到弱智的题目，老师家长已经普遍恐慌了。
4. 学校和老师其实是认真负责的，但是已经没辙了。只能对初中生家长狂喊，要清醒，不能松，在家努力吧。要一对一唐僧精神加强念紧箍咒，中考很关键。
5. 不让努力学习，可是中考是要比的。全市学生排名比成绩，一半学生上不了高中，就是这么残酷的。上不了高中就上不了大学，就是职高之类的，家长普遍不能接受。
6. 小学家长也炸了，小孩2-3点就放学回家，家里没老人就完了，只能托管班，费用每月1000-1500，肯定要涨价了。

然而，当我们考察素质教育的实际实行情况时，这个词的“好”，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词义上的“好”，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却不可避免地被“现实”的因素所决定，现今的条件下，素质教育是一种“空想”的素质教育。

## 谁的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从哪里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人的头脑里固有的吗？

不，素质教育只能从金钱和教育资源的大量砸入中得来，这也就使得它实际上是一个仅有少数人才能享受的教育，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能沦为“空想”。

一个让孩子增长见识的游学夏令营，往往需要花费 5 万+，随便一个辅导班，都需要几千元，课外辅导，一节课常常花费几百元，大量月薪三万的家庭尚且难以负担孩子的天价暑假，更不用说月薪 3000 的工人能用什么撑起孩子“全面发展”的需要。

当然，还有一些用金钱都买不到的资源，如华东师大二附中高一的谈方琳得到了参加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的机会，可以和顶尖科学家面对面交流。而从她的父亲正好是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院长谈胜利。想必明眼人稍微想一下就能知道，一个“从未参加过数学竞赛”的高一学生是如何得以参加顶尖科学家的论坛的吧。这样的捷径也只可能属于少数精英的子女，是绝大多数人不可能得到的。

## 素质教育最终还是应试教育

应试教育的大行其道，是由于社会竞争压力巨大，学生希望自己能够在将来的职业发展中更具竞争力。如果不应试，就难以获得较好的职位，也就难以获得较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应试教育的盛行是由现在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决定的。

而素质教育开始在实际推行开来，它就由于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而丢弃掉原本的对应试教育的外衣，实际上则做着应试教育的事情。

从近期由于素质教育而推行的减负政策来看，学校推行的“减负”政策名义上是希望减轻学生负担，让学生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而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由于竞争的压力却不会由于减负而削减分毫，学校的“减负”带来的不是学生课余生活的全面发展，而是学校之外教育的“增负”。学校教的东西少了，作业少了，但是竞争仍然这么激烈，家长会在学校之外给孩子找各种辅导班和培训机构，对家长和学生构成了新的负担。所以，只要竞争的大前提不改变，教育便不可能走出应试教育的泥淖。

另一方面，家长们让孩子参加的培训班，大多数也是为了增加孩子在将来的竞争力，即名校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参加奥赛获得奖项，进入游学营增长见识，学习乐器培养兴趣爱好，参加辩论锻炼思辨能力，这些都能在日后的简历中写下光辉亮彩的一笔。而素质教育中的首要的一块——思想道德素质——却因为进入名校时无法考核这一项而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孩子进行素质教育为的是在择校或者就业这样的“考试”中获得更大的竞争力，表面上是素质教育，骨子里却仍是应试教育。而且这样的素质教育缺失了思想道德素质这一块，所培养的学生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 空想素质教育被哪些力量推动？

前文已经说过，由于素质教育的高投入，所以仅有收入较高的家庭能够负担起素质教育的费用，这些家庭中有很大部分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而实际上，中产阶级也是最需要素质教育的阶层，这也是由于中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中产阶级在社会中处于不上不下的地位，他们往往是通过自己的知识和技术获得一个较高的工资收入。一方面他们不能像上层一样把实打实的资产传给后代，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维持相对低收入群体的优势地位。但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知识技能并不能实现在代际中的传递，他们陷入了焦虑当中，也因此对于孩子的教育有着极高的要求。“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成了家长们彼此绑架、推高投入的心魔，中产阶级的家长们只能通过寻求大量的素质教育来提升自己孩子的竞争力，使孩子能够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

《起跑线》中的米塔作为一个中产主妇的说法很有代表性，她希望她的孩子进入好的学校，害怕自己的孩子在将来的竞争中失利而进入底层，也因此绞尽脑汁地希望自己的孩子进入 top5 中。而进入这些学校的必要条件则是孩子接受了大量的素质教育。



中产家长对于孩子教育的焦虑，推高了在各种培训班、夏令营等的投入，素质教育的价格也就水涨船高了，大量的教育机构，打着“您来，我们培养您的孩子；您不来，我们培养您孩子的竞争对手”的广告语，围绕着竞赛奖项、自主招生、游学经历等各项指标开展生意，从焦虑家长口袋中赚取大量的财富。

此外，推行素质教育会成为当地教育局官员的一大政绩，也是一个学校进入“一流学校”的必要条件，所以不管实际效果如何，由于这些教育局和学校的官员对于自身政绩的寻求，素质教育还是会被推行开来，于是就有了前文提到的南京查减负的事情，也出现了一些学校为了争创“一流”而硬生生地增设了素质教育的内容但实际上却仅是一个空壳子的情况。

### 素质教育如何实现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素质教育在现行的经济制度下，注定是由少数人享有的教育机会，也注定需要被社会的竞争压力推动着实际成为应试教育。素质教育的“现实”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

所以，在思考真正的素质教育应当如何实现时，我们应当认识到，一切教育制度的发展方向，“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

只有改变相应的经济制度，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素质教育！

改变少数人对教育资源的垄断特权，使得教育惠及人民，素质教育才能避免成为加强阶层固化的工具，才能真正起到提升社会整体的受教育水平的作用。

那个时候，孩子不再是为了将来更好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接受教育，而是真正能够做到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自己的特长，才能让素质教育真正促进一个人更加充分的发展。

另外，需要说明一点，目前仅能够给出素质教育从空想到科学发展的大概轮廓，由于还不具备实现的相应经济基础，没有考察的对象，所以现在仅能回答“科学素质教育不是什么”的问题，而对于“科学素质教育是什么”的问题，则有待于我们之后去努力探索。

### 导言：中国教育的冰山之下

6月下旬，随着2019年高考成绩的发榜与各省分数线相继出炉，有关成绩优秀的“学霸”考生和“精英”高中的话题每年惯例地占据了媒体热点，“某某省理科高考状元分享学习经验！”，“2019某某中学高考喜报，惊呆了！”一类的新闻标题在网络媒体上层出不穷。

就在高考的“人生赢家”们纷纷炫耀高考成绩的另一面，新一轮没有硝烟的“暗战”也悄悄打响，一方面是国内顶尖高校纷纷伸出橄榄枝，不惜以丰厚的物质奖励吸引各地的优秀考生前来就学（“某大开出重金‘抢生源’？教育部：立即纠正违规招生宣传行为”）；另一方面向顶尖高校输送了大量“学霸”的“精英”高中也在不动声色地物色新一批生源与师资力量，为三年后的另一场“争过人生独木桥”的无声战役做着准备。

但就在光鲜的宣传与残酷的竞争背后，另一批默默无闻的高考考生也选择了与普通本科教育截然不同的另一条教育路径——高等职业教育。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18年，我国的1418所高职（专科）院校共招收368.83万名新生，占普通本专科招生总人数的46.6%。另外考虑到同年正在我国1.03万所中等职业教育中学中接受教育的，占全国高中阶段在校生总人数39.5%的1551.84万名学生[1]。最终在义务教育结束后的两次教育分轨中选择了职业教育的学生绝对占据了我国受教育人口中的大多数。



然而与人数的优势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相比于考入“985”、“211”这些顶尖大学的极少数“学霸”学生，媒体和公众为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所分配的关注实在是成比例的寥寥无几。媒体的冷淡也正体现了当代职业教育在中国社会中所处尴尬境地。虽然对于现在的高考考生而言，职业教育受轻视仿佛是天经地义，但他们的父辈却依稀尚能回忆起80、90年代初中毕业生争相选择职业教育，以至于职业高中入学名额“一票难求”的火热场面。这



就证明了职业教育当下地位的获得不是某种“从来如此”的自然结果，而是一系列悄无声息的社会变化的产物。正就是在如是种种普通与职业，历史与当下的多重反差之中，我们才能够勾勒出专属于改革开放历程的一部“微观历史”图景，其揭示的正是 40 年间中国教育公平乃至社会公平领域所发生的影响深远的变化。

## 1. 改革开放后职业教育的恢复与发展时期

虽然当代的职业教育体制是在恢复高考后的 1978 年重新建立，但职业教育对中国社会来说却不是一个陌生概念。建国伊始，新中国就通过接管和接办的方法掌握了原有的公私立学校，随后通过逐步改造的方式使之适应于新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建设。经过几年时间的重整，大多数原设专科学校拆解、合并、重整，高等专科学校数量减少，而中等专业学校与技工学校教育力量获得极大扩充。但 1958 年的“大跃进”和 1961 年国民经济调整打乱了职业教育体制原有的发展步伐，至 1964 年，全国范围内的专科学生仅占本专科学生总数的 3.4%。[2] 在随之而来的文革中，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的二元分轨制在平等主义热潮下更是遭到了批判，各种形式的职业技术教育也因此停办，普通高中几乎成了初中毕业生继续升学的唯一选择。

在文革结束，高考恢复后，职业教育的重新设立也显得势在必行，1978 年，邓小平就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应当“扩大农村中学、各种中专、技校的比例”。1983 年，政府出台了《关于改革城市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意见》，加强了对职业教育的政府投入，仅就中等职业教育而言，其政府经费投入占教育总经费比例从起初的不到 3% 逐年增长至 1992 年的 3.65%。[3]



与此同时，政府也鼓励教育部与原有学校之外的社会力量参与到职业教育建设中，将职业教育办学面向市场，对企业、民主党派、工商联、公社、连队、生产大队集体乃至私人开放。吸引了大量社会资金进入到职业教育领域。在资源投入的推动下，80 年代的全国职业教育，尤其是农村职业教育的规模获得了持续的快速增长，不仅仅是新建学校的不断增加，就连原有的不少普通高中也翻牌为职业学校。在 1982-1992 年的十年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数



量从 3104 所增长到了 9860 所，招生数从 42.6 万人增长到了 152.14 万人，在校生数量更是增长了近 5 倍，从 70.4 万人增长到了惊人的 347.76 万人。[2]

这段时间内职业教育体现出了毕业生就业与学校招生的双向优势。80 年代，对职业教育毕业生有需求的不限于城市用人单位，也包含了大量方兴未艾的乡镇企业。企业需求的旺盛一时导致职业教育毕业生供不应求，甚至出现了提前预定的争抢场面。受到下游毕业生就业形势刺激，职业教育在上游招生中也成为热门，1985 年在如长沙、常州等地区甚至出现了职业技校在校生数量超过普通高中在校生数量的状况。普高招不满，职业学校成热门也成了 80 年代中期北京、武汉等地区的常规现象。一时间中等职业教育学校职业门庭若市，大受初中毕业生的欢迎。至 1993 年，职业教育发展达成了 1986 年定下的中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级中学招生数量相当的目标。

## 2. 职业教育的发展停滞、衰退时期

90 年代中后期，中国职业教育规模到达了顶峰。1998 年，全国职业中学招生人数和毕业生人数都到增长到了历史最高点的 194.14 万人和 177.0 万人，随后在 1999 年，招生人数与毕业生人数双双开始下降。至 2001 年，职业中学的招生情况已经不比 2005 年，反观普通高中，则是招生数量逐年增加，一举逆转了 80 年代形成的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各占半壁江山的状况。[2]

此前常年的高速增长与 90 年代末期的跳水式规模下跌使得 20 世纪末的职业教育市场呈现出异常凄惨的景象，以至于大批新生没有抵达学校报道。以 1999 年的北京市为例，中专学校未报到新生达 2500 多人，职业高中未报到新生达 6200 多人。已有的大量职业教育学校更是不得不分享急剧收缩的生源，导致职业教育的规模效应低下。1998 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约 2200 所，除普通中专平均尚有约 1200 名学员外，其他几类学校均规模都只有 500 人左右。[2]

## 3. 成也市场，败也市场

为何看起来红红火火的职业教育在中国社会中突然就遭遇了断崖式的衰退？一般观点常将这一现象的产生归咎于 1999 年开始的高校招生规模扩大。在 1998 年到 2005 年之间的这段时间内，全国大学本科招生人数从约 100 万人急速飙升到了约 500 万人。[3]大学本科招生量的增加不仅严重压缩了高等专科教育的生源，实际上因为从职业高中考入大学本科的机会寥寥无几，大学本科入学机会的增加也带动了普通高中招生的增长，进一步在中等教育层面挤压了职业教育的发展空间。从下游逆向影响了整个职业教育体系。



厚此薄彼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虽然教育政策调整毫无疑问地确实极大影响了职业教育的发展,但只要将视野稍作拓展,不局限于教育体制内部,而将教育系统纳入到更广泛的国民经济体系中去理解,就会轻易发现职业教育衰退在时间上与另一场更为重要,影响更为深远,波及范围更大的社会经济变革——国企下岗潮高度重合。正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至 21 世纪 00 年代初期这段职业教育极具滑坡的时间段内,在 1990 至 1997 年间数量稳定在 11000 万人的国有企业员工中的 5000 万人失去了工作。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大量国有企业的倒闭和未倒闭企业的有计划下岗(实际上的裁员),国有企业员工的数量几乎腰斩。这两个现象之间的关联也就提示了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兴衰与劳动力市场之间深刻却往往被遗忘的关系。

首先,需要将视野拉回到 80 年代,并看到这一阶段内逐渐建立的劳动力市场如何从根本上带来了职业教育的繁荣景象。必须要注意的是,在 90 年代中后期之前(也就是国企改革与“下岗潮”之前),中国的劳动力就业并不是完全市场化的。在此之前就业包分配制度仍然限制着大学本科毕业生就业流动性,而与此同时,正如前文所述的那样,政府以减免税收,政策扶持,出面牵线搭桥等方式尽早将职业教育推向了市场,使职业学校和市场直接面对面,从招生到毕业生就业都以市场导向为主。这就导致 80 年代到 90 年代中后期阶段大学本科毕业生并没有实现对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市场竞争压力潜力,职业教育毕业生可以较为稳定地与同等学力竞争者竞争岗位。同时,80 年代乡镇企业的兴盛也为农村出身背景的职业教育毕业生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总之,相比于大学本科教育来说,职业教育更早的市场化为其毕业生创造了宽松的求职条件。



以上的证据就表明,90年代中后期之后职业教育的衰落就不仅仅是教育制度内部变革的结果,而应当被视作教育系统对波及社会各部门的90年代市场化改革的合理反应。在1998年职业教育开始衰落后,21世纪早期日趋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不久就接收到了人才供给端的反馈,突然产生的巨大专业技术人员缺口促使政府不得不采取政策调整,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其结果就是,职业教育经费来源中,财政性经费的投入从2005年对中职教育的53.09%和对高职教育的32.01%,一路增长至2016年对中职的87.67%和对高职的62.51%。[2]其中颇为讽刺的是,市场自我调节的神话在劳动力市场化并不完全的80年代至90年代中后期阶段尚能自我维持;而到了就业市场化与国企改革不断推进的21世纪,市场与劳动力再生产体制之间的良性循环互动反而难以维系。市场与职业教育体系之间的情投意合随着国企改革,收入差距的加大,与劳动力就业市场化的完成一去不复返。职业教育如今成了一门不得不依赖国家经费投入维持的“苦差事”。事实证明,市场自我调节也只不过就是个痴人说梦的神话而已。

#### 4. 教育公平视角下的职业教育分轨

更进一步的,这场归根结底由全面市场化引发职业职业教育体制震荡除了对劳动力市场的负面反馈之外还产生了更为深入的后续社会影响。教育体制内部的不平等还参与了社会不平等的循环生产。根据一份对1978-2008年范围内的数据的研究,省会或直辖市居民在中等阶段的教育分轨中比农村居民更可能进入普通高中的路径。这就意味着省会或直辖市居民会通过普通高中获得更高的进入大学本科继续深造的机会。[5]



最为重要的是,这份研究同时发现,父母受教育年限对子女在教育分流中的路径选择有显著的作用。当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父母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子女升入职高(相对于普高)的几率下降约4%。[5]这个的结果表明,子女在高中阶段职普分流中的路径选择更多受父母教育(家庭文化资本因素)的影响。父母的教育程度越高,表明家庭文化资本越丰富而子女更可能选择普通高中(学术教育路径),而持有中等职业教育学历父母的子女则更有可能再次进入职业教育路径,这基本就断绝了他们进入本科高校,乃至接受研究生教育的

机会。教育资本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代际传递有阻挡阶级流动，将与社会阶层分化捆绑的收入不平等长期延续下去的危险。

## 5. 结语：职业教育是否真的无路可进？

在全世界范围来看，职业-普通教育的分轨并不是所有社会的必然选择，虽然经济发达的德国所实行的严格教育分轨常被视作典范，但同为发达经济体的美国却在教育体制中尽力推迟教育分轨的产生。一种为教育分轨辩护的观点声称，分轨本身不是歧视性的，而旨在因材施教，根据学生能力的分化提供多样化的教育路径选择。正视这一论调中包含的少许真理与尖锐地指出其中的谬误同样重要。虽然职业教育自身抽象地许诺提供更多的可选择的平等教育路径，但职业教育作为具体的市场经济中的劳动力生产部门却再生产了经济与社会领域内的不平等。关键不在于在教育体制之内探讨职业-普通教育单轨制与分轨制哪一个对教育公平更加有利，因为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教育公平程度并不是在教育系统内部，而是在整个市场经济网络之中得到决定的，不平等的就业环境和薪酬分配注定无法支撑公平的教育体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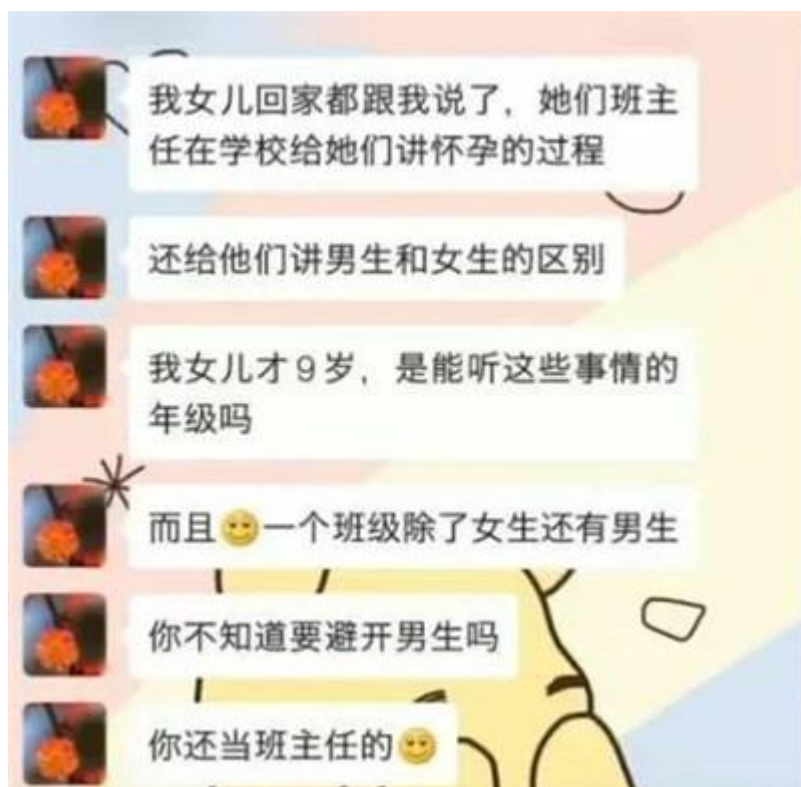
一方面是劳动力市场对专业技术人员的大量需求，另一方面却是学生和办学单位对职业教育的冷落，职业教育自身的困境所揭示的是当代中国劳动力市场中深刻供求不平衡，但随着市场的发展与教育的不断深化，我们却看不到不平衡关系在未来短期内得到解决的迹象，国家的财政倾斜虽然能够暂时缓解职业教育产业的困境，但长远看来却无法扶持其可持续的健康运转。这种无法解决的困境是否提示我们：市场化或许并不是教育产业的万应灵药，其逐利本性与社会的良好发展之间可能存在着不可调和的裂隙？职业教育市场化大张旗鼓推进近 40 年后的今天，也许我们应当稍微放慢脚步，重新思考这一行业的未来。

近日，“老师教孩子怀孕知识被家长吐槽”的话题被推上热搜。一段老师上传的聊天记录中，家长连珠炮式“怒斥”老师——

“我女儿还小，希望您不要教给她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女儿回家跟我说了，她们班主任在学校讲怀孕的过程，还讲男生和女生的区别，我女儿才9岁，是能听这些事情的年纪吗？”

老师认为，只是因为班里有老师怀孕，有同学在问，她想正好借机向同学们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没想到招致家长不满。



这一次，绝大多数网友站队老师，“都9岁了还不普及吗？我家孩子4岁就知道哺乳动物怎么生娃了。”还有人直言不讳，“这样的家长占大多数才可怕，愚昧无知，还拒绝接受新的教育方式。”

也许，在这位对性教育高度敏感的家长眼中，只要给孩子创造一个与“性”绝缘的真空，捂住孩子的眼睛和耳朵，孩子就永远不会接触到性。



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诸如此类动辄“谈性色变”，戴着有色眼镜，将“性教育”视作洪水猛兽，羞于启齿、避而不谈的家长不在少数。



2017 年，小学二年级性教育读本《珍爱生命》被家长举报尺度太大

西方有句谚语，叫房间里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指的是，人们在私密生活和公共生活中，会对某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保持沉默，装作看不见。那些耻于谈性的家长，正是将本该高度重视的儿童性教育，变成房间里的大象，看作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殊不知，性教育被部分家长看成洪水猛兽，针对未成年人的性侵害却层出不穷。9 月 22 日，有三则新闻先后登上热搜，颇为耐人寻味——分别是：

“三年超 4 万人涉嫌性侵未成年人”

“男主播疑似强奸幼女直播，自称 9000 元买的破处验货”

“老师教孩子怀孕知识被家长吐槽”

性侵害未成年人数字的增长，并不是近些年坏人越来越多，而是社会对于性知识的认识更为清晰，借助微博、微信、短视频平台，曝光求助的手段越来越多，从而将一些原本难以发现的性侵害暴露出来。



然而，即便在 2017 年到 2019 年检察机关起诉的相关侵犯未成年人犯罪中，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总人数加起来超过 4 万人，这一数字背后，仍有很多未成年人，正是家庭性教育的缺位，对性侵害行为缺乏认识，无法向外界求助，沦为沉默的羔羊。

还记得 2017 年，有一则猥亵女童的新闻曾轰动全网。在南京高铁南站候车室，一名 18 岁的小伙子，将一名 10 岁小女孩抱坐在大腿上，将手伸进女孩的裙内，上下其手，摸女童的胸部。这则新闻让围观者愤怒不已，甚至引发全网人肉该男子。事后证明，女童为猥亵者父母的养女，猥亵行为发生时，其父母也在场。

然而，与围观者的愤怒形成鲜明对比的，正是被侵害女童的冷漠，可见她对“哥哥”这种猥琐的行为，已经习以为常，不知道何为性侵，更不知道面对不法行为如何保护自己。

现实生活中，家庭内部性教育的缺失，往往成为压垮未成年性侵受害者的最后一根稻草。为人父母者，本该是孩子性启蒙的首任老师。如果父母自身的性观念都不端正、无法脱敏，用对性知识三缄其口，来当作对孩子的保护，反而可能让孩子因性知识的无知而遭受侵害。

更有甚者，一些父母对性话题避之不及，视为家中讨论的禁忌。让孩子产生错误的性观念，在受到性侵害时，也不敢向父母求助，本身是性侵的受害者却背负强烈的道德耻辱感，一旦揭发兽行，不仅无法得到父母的支持，反而成为家族的耻辱。



性教育读本《珍爱生命》节选

进一步讲，信息化时代，孩子很容易通过网络获得与性相关的信息。此前，媒体数次曝光过，犯罪分子打着“个性交友”“童星招募”等幌子，诱骗、胁迫未成年人进行“裸聊”或发送“裸照”“裸体视频”等方式进行“隔空”猥亵的网络侵害，直至发展为线下侵害。

是让孩子在泥沙俱下的不良信息中，获取错误的性知识，在受到性侵害时不知如何保护自己，还是让家长端正性教育的观念，不再将性话题视作洪水猛兽，做好儿童性教育的第一任老师，这样的选择题，相信每位家长都知道何为正确答案。

性教育是孩子成长道路上的必修课，家长们应当改变旧有的观念，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学会两性认知，不管是对于性别认识，还是自身保护都大有裨益。未知才会尝试，已知才能保护。对于性知识有多无知，孩子面临性侵害就有多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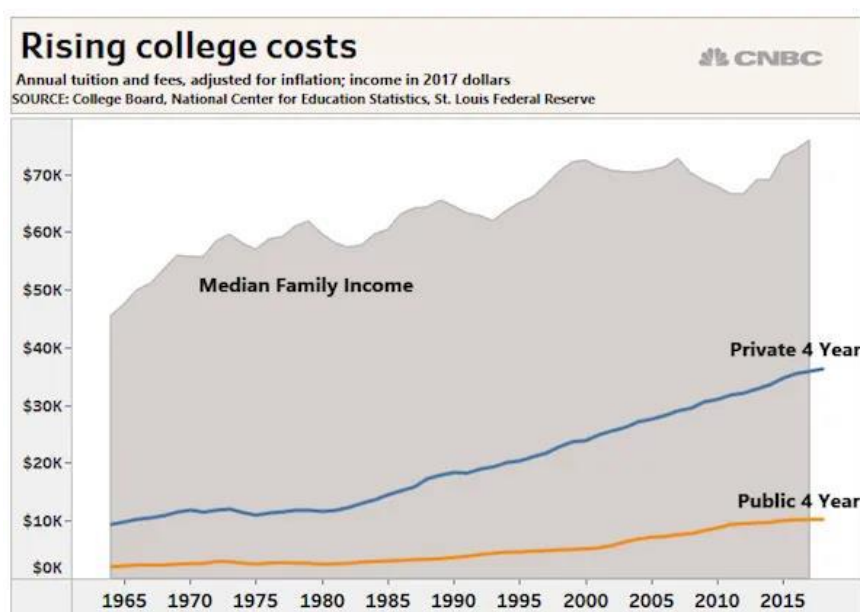
希望“谈性色变”的中国式父母越来越少，坦诚与孩子沟通性知识的家长越来越多。

## 学费飙升、文凭贬值、精英机制失灵——美国高等教育深陷危机

2020 年新冠疫情下的美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层出不穷。一方面，高等教育内部危机重重，高校对职工教员的裁员已屡见不鲜，早在五月俄亥俄大学宣布将对非终身教职轨道上的教授进行裁员。另一方面，网课的教学形式让支付高昂学费的学生难以满意，因此美国发生了多起学生因大学关闭而不能提供诸如面对面课外活动、实验室、图书馆等服务设施为由的对大学发起的法律起诉事件。国际学生作为近年来美国高校收入的重要支柱，也面临着是去还是留的困境。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学生的排外态度，不景气的经济与就业市场，美国居高不下的新增病例与一波未去一波又来的疫情都让不少国际学生望而却步。这些都让人不免疑问：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人才吸引地其魅力还能否一如既往？而这波疫情又反映了美国高等教育哪些深层次危机与未来可能的变革的动机？

### 飙升的学费：美国中产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由三个部分组成：公立学校（包含两年制的社区学校与四年制大学），私立非营利性大学，和私立营利性大学。其中公立学校拥有最大的教学系统，包含了四分之三的美国大学生。根据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8 年的报告，美国学生在大学教育上的花销占全球首位。美国人人均一年大学开销为人均 3 万美元，高于其余发达国家此项花销平均数的两倍。三分之一的发达国家提供免费的大学生教育，而剩下三分之一的发达国家提供低廉学费的大学教育（一年不超过 2400 美元），而 2018 年美国人均国民收入为 33706 美元，仅略高于大学的人均开销。而美国这个高昂学费的数字也并非从来如此，而是过去几十年不断增长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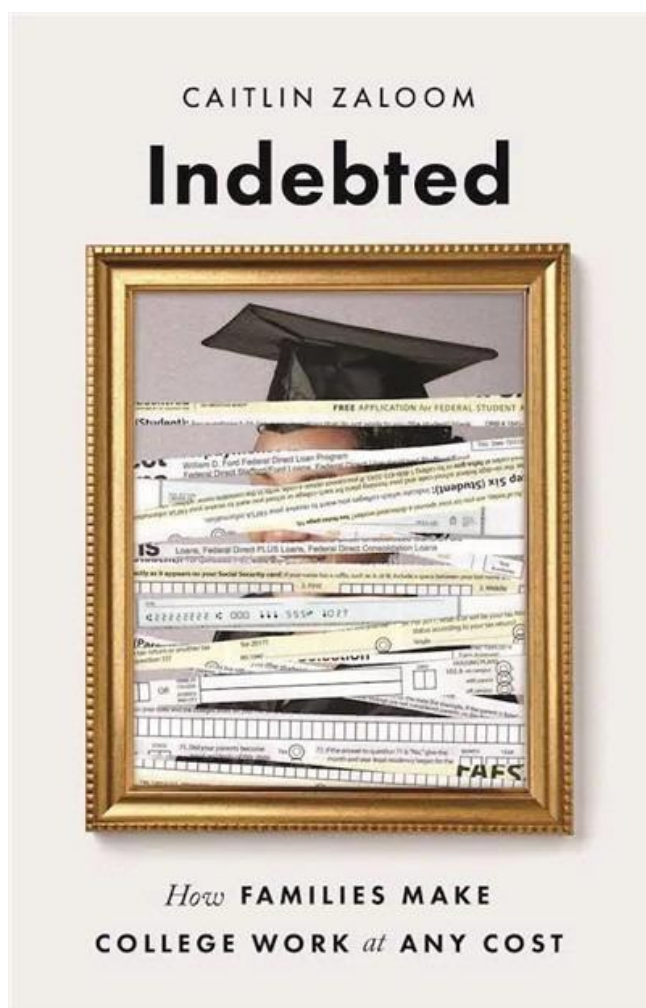
从 1965 年到 2015 年公立、私立大学以及中等收入家庭变化。来源：大学理事会

飙升的学费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对大学的财政支持不断减少。根据大学理事会的数据，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公共资金下降导致学费飙升。在过去的十年中，私立四年制学校的平均学杂费增长了26%。遭受重创的四年制公立学校的学杂费在同期增长了35%。

根据CBPP（预算与政策优先中心）分析发现，截至2018年，在对通货膨胀进行调整后，美国国家对公立两年制和四年制大学的整体拨款比2008年经济衰退完全爆发之前减少了66亿美元。现在学费约占大学收入的一半，而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供了剩下一半的大学收入。这和在三十年前完全不同，那时学费仅占了大学收入的四分之一，而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则承担了大学所有其余收入。

州政府对公立大学教育经费的不断减少促使公立大学持续寻找富裕而具有支付能力的学生，而国际学生和外国学生就成为了州立大学的主要收入源。比如普渡大学在过去十年间将本州学生数量减少了4300名，而将外国和国际学生数量增加了5300名。

这笔高昂的大学学费支出很少有家庭能够负担，于是越来越多的家庭依靠联邦和私人援助来负担费用。每10个家庭中就有超过8个家庭使用奖学金和助学金（不必偿还的钱）来支付费用。根据萨莉·梅（Sallie Mae）在最新的“美国如何为大学付款”报告中指出超过一半的家庭借款或贷款，使未偿还的学生债务达到惊人的1.6万亿美元。有将近70%的学生采取贷款的方式上学，而临近毕业，学生平均负债近30000美元。



为了解负债累累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纽约大学人类学教授 Caitlin Zaloom 在过去的七年中和她的研究团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 160 个深度访谈，采访了那些依靠借贷来支付四年制私立大学学费的学生和家长们，并最终将研究成果在 2019 年出版成为《负债》（Indebted: how families make college work at any cost）一书。尽管中产阶级家庭一直都希望帮助孩子支付教育费用，可近年来飙升的学费却是对他们支付能力前所未有的考验，同样教育投资转变成了一项“高风险”投资活动，从而深刻地改变了他们的家庭生活。

Zaloom 教授对中产家庭的界定标准是家庭对大学学费的支付能力。她对中产家庭的定义是他们既没有能力不借贷就能支付大学全部学费，同时又达不到有资格申请联邦政府高等教育补助的贫困标准。Zaloom 发现，对于中产阶级父母来说，帮助支付大学学费不仅是一项对他们经济预算的挑战，而且还被视为是父母的道德义务。他们的经济支付既是无奈之举又心甘情愿，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负责任的父母的道德义务。可这种“义务”在几十年前却是难以想象的。几十年前，当制造业工作数量充足，就算没有四年制的大学学位也能过上中产的生活。大学文凭曾经是靠学生自己争取而来的价值体现，而现在却成了跻身中产必不可少的条件，不仅因为学位是找工作的必要证明，同时它还赋予他们参与中产阶级社区生活所必备的知识和社交技能。于是中产阶级家庭开始了在道德义务与财务现实之间一次次的冲突。

Zaloom 认为，这主要导致了三个道德困境。首先，当他们的孩子还年轻时，父母就要面临家庭财政支出之间的艰难取舍：是为孩子的大学教育存钱还是满足当下的家庭需求开销。当孩子还小时，很少有父母选择为大学做储蓄，大多数人都倾向于在这个阶段把投资花在小孩的发展上。只有少于百分之五的美国人拥有小孩的大学储蓄帐户，而这拨人也比一般人富裕很多。对于那些从事中产阶层工作的人，为孩子存够足够的上大学的钱就意味着对其他活动的妥协，比如音乐、教育、旅行、运动、课外辅导。这些活动既能丰富孩子的生活，又能让他们与同龄人保持同步，锻炼他们的自律意识，并训练他们的社交技能。矛盾的是，给孩子报名多参加这类活动就会消耗这些家庭的高等教育储蓄金。

第二个道德困境发生在孩子们开始申请大学时。几乎每个家庭，都砸锅卖铁地要让孩子去对他发展最有利的大学。家长对选校有很多考虑，不仅是找到一个负担得起的学习场所，更是要找到最有可能建立社交网络，创造生活和职业机会的环境。因此哪怕存在诸多风险，父母和孩子都会优先考虑最优选项的学校，然后再寻找解决费用的办法。

第三个道德困境被 Zaloom 称为“社会投机”，它的含义是今天的父母必须为教育投资下注，以确保他们明天在中产阶级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很可惜，父母并不能保证这笔赌注能为父母自己或孩子带来回报，并且通常他们并未得到期待的回报。相应的，父母的储蓄计划从此后通通打乱，在日后遇到健康紧急情况，诸如失业、家庭破裂等十分普遍但无法预料的境况时显得捉襟见肘。同样，许多孩子在大学毕业后也找不到高薪工作，这迫使他们在成年后最清贫的十年中承担着还清债务的重担。支付高昂的大学费用还意味着危害父母的长期财务安全。父母花在子女教育上的钱越多，他们退休帐户中的钱就越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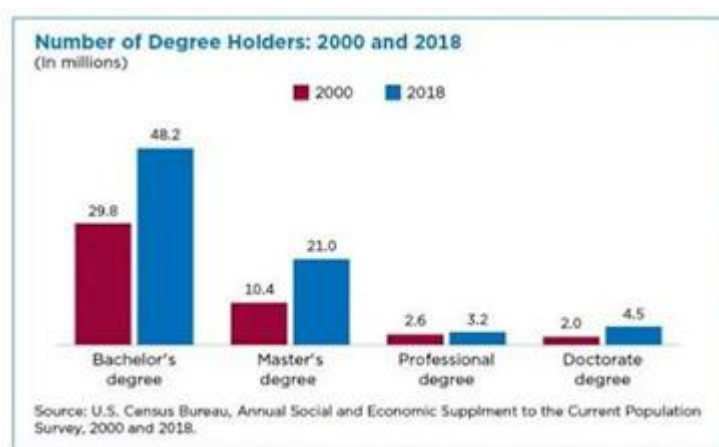
针对这一现象，Zaloom 犀利地指出一个潜在的悖论：父母在教育方面进行了巨额投资，以使子女能够维持或达到中产阶级的地位，但与此同时，他们增加了自己退出中产阶级的风险。通常财务顾问给父母的理财建议是，想象他们和孩子同时在一架失重的机舱里，他们应首先确保自己的氧气面罩（退休储蓄），然后才帮助孩子（上大学的花费）。但是实际上，父母的行为就像在飞机上一样，他们选择首先照顾孩子。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全国的家庭财



务储蓄状况少得可怜。美国家庭存款储蓄的中位数只有约 12000 美元。这些家庭开玩笑说唯有中彩票才可能将他们从困境中解救出来。Zaloom 对这样的美国教育制度感到悲观，当大学教育掏光美国中产家庭的一切，美国梦脆弱得遥不可及。

## 日趋贬值的文凭与失灵的精英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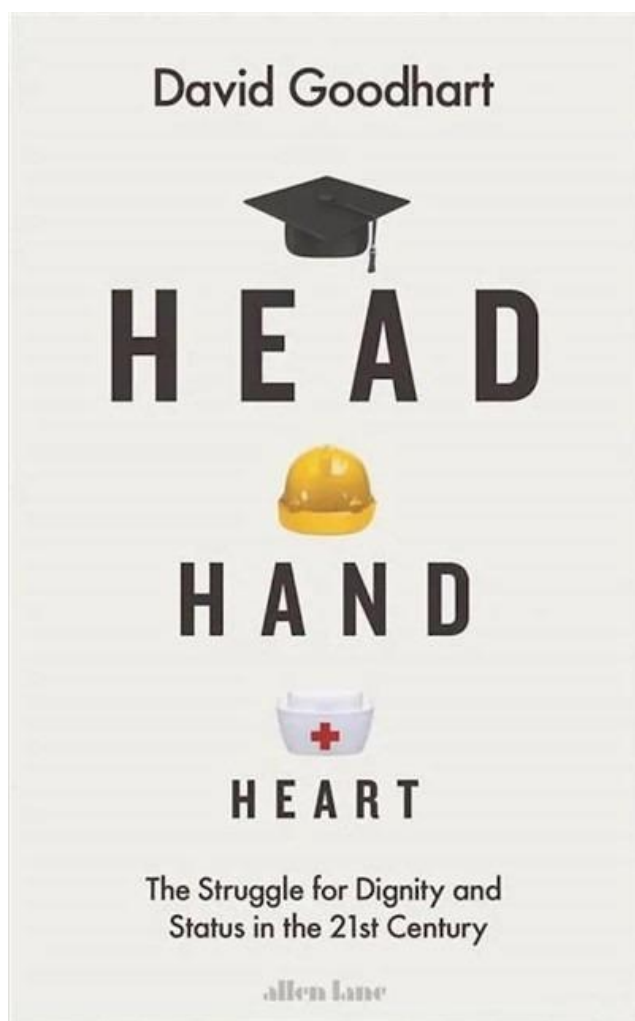
早在疫情发生前，对美国高等教育泡沫的批评声就不绝于耳。高昂学费的上涨伴随着大学不断扩招，而和国内最近甚嚣尘上的对文凭贬值的讨论一样，美国的文凭缩水在近十年也非常明显。根据美国人口统计数据，从 2000 年来，美国拥有硕士和博士文凭的人数翻了一倍，而本科文凭也是大幅上涨。这样的人数扩招所带动的水涨船高不难解释在劳动力市场上越发贬值的文凭。



早在 2017 年，就有评论指出 “大学文凭可能正在成为新的高中文凭”。在过去几十年里，大学生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上优势明显，从 1980 年以来，随着大学毕业生从高中学历的人中脱颖而出，高中生和大学生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但在 2016 年国家经济研究局 Robert Valletta 教授关于学历溢价的研究中却发现，近年来这两者间增长趋于平稳。尽管拥有大学文凭的员工和只拥有高中文凭员工的收入差在 1980 年代迅速增长，但这两者间的收入差在 1990 年代开始放缓。在 2000 到 2010 年之间，这收入差只略微浮动增长，而在 2010 到 2015 年期间，收入差就一直没变过。Valletta 认为，驱动高等教育高回报的因素这些年已减弱了不少。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技术的发展。一方面，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的技术投资刺激了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因为工作越来越需要与学士学位相关的更高水平的认知技能。2000 年之后，由于资金开始流向自动化和人工智能领域，这些技术取代了较低级别的工作，但近年来，自动化已开始取代所有行业中具有四年制学位的工人所担任的工作。这样的结果导致具有学士学位的工人被迫从事低工资低技能工作。现在，四年制学位不再是获得高薪管理职位的入场券，而是进入任何工作的最低入场券。Valletta 的研究表明 “教育集团间为高薪工作展开了无比激烈的竞争”。但同时，Valletta 谨慎地指出，这并不表示年轻人可以不读大学。他说，总的来说，高等教育可以为员工带来比高中文凭更高的收入，但专业选择非常重要。

而这次新冠危机之下，当高风险低收入群体比如外卖员、护士成为人们口中 “必不可少的工人”（essential worker）时，又印证了学者们近年来对当代精英体制所带来弊端的批判。长久以来，社会都对 “认知劳动”（cognitive work）推崇备至，也就是看重它背后所

代表的理性、逻辑、分析、对抽象事物的理解等能力。但这次新冠疫情却向人们揭示了非认知类工作的重要性，也会让更多人意识到职业教育的重要性。



在英国政治分析评论家 David Goodhart 的新书《头、手、心》（Head Hand Heart: The Struggle for Dignity and Status in the 21st Century）中，Goodhart 认为新冠危机确认了他之前对世界的假想，他认为当前社会的问题是精英标准的单一化，这一标准就是学术考试水平。日后的物质富足与社会地位，都与在这个单一领域内的表现紧密挂钩，而其他人类能力，比如出色的手工能力、强大的同理心和照顾关怀他人的能力在社会上都没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回报。

这种情况的弊端是多种多样的，并且越来越严重。学位曾经标志着出色的认知能力，或某种文化特权，但随着它们成为人手一张的证书，他们就失去了这种区分功能。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追求高学历，而这些高学历在真实工作中根本用不到，比如从事护理工作并不需要本科及以上文凭。由于拥有高学历的人数越来越多，学历在劳动市场所具有的经济价值就不断缩水。

# 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

MICHAEL J.  
SANDEL

AUTHOR  
OF  
JUSTICE

哈佛道德哲学教授 Michael Sandel 在新书《优绩的暴政》(The Tyranny of Merit: What's Become of the Common Good) 中指出，全球民粹主义兴起和精英机制失灵有很大关系。桑德尔认为目前民粹兴起有两大原因，第一是用技术专家治理的思路与市场机制去思考公共福祉，这使得对公共问题的讨论变成了专家的特权而不在大众参与范围内。第二则是目前对待成功和失败的态度，即成功者傲慢、失败者怨恨的情绪两极化在全球化的催化下造成了不断飙升的社会不平等。桑德尔在这本书里挑战了美国梦的传统，即那种坚信靠个人努力和奋斗就能实现阶层跨越的美国梦故事。桑德尔提出了“精英自大”(elite hubris) 这一概念，这种自大来自坚信自己的成功是因为自己的才华天赋和努力，自己是自己成功的缔造者而完全无视诸如先天的家庭条件、他人的帮助和运气等对于成功至关重要的因素。而精英们的自大使他们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带着嗤之以鼻的不屑，这潜在地拉大了这两个群体的距离，使他们更难以理解和体谅彼此。这也进一步导致了政治两极化，全球范围内右翼的崛起，以及精英对弱者与底层的歧视。

桑德尔认为精英体制强调文凭，靠文凭的累积才有可能触到金字塔顶端，而顶端的含义则完全由市场价值决定，这就陷入了一个死胡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崇拜与美国个人主义的传统结合在一起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这样撕裂的局面让中产及以上家庭更加如履薄冰，拼尽全力将孩子送进好学校，因为进入好学校是保住阶级地位，实现向上阶层流动性的第一步。桑德尔指出了专家政治和市场崇拜在过去的四十年中的失败，而在 1940 年到 1980 年之间，统治美国的精英阶层明显更加成功。他们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帮助重建了欧洲和日本，加强了福利国家体制，消除了种族隔离，并促成了长达 40 年的经济增长。相比之下，过去四十年执政的精英阶层只带来的大多数工人四十年停滞不变的工资，空前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2008 年的金融危机，腐朽落后的基础设施，这些都和民主的初衷背道而驰。桑德尔提出了一种激进的政治理念，强调一切劳动都有尊严。他认为新冠疫情应让我们重新思考的是，如何重塑经济使其重视那些同等重要但根本不需要大学学历的工作，比如护理，送货员。如何让这些工作不仅能获得良好的物质回报，还能获得相应的社会认同和尊严。

### 危机抑或转机：新冠疫情下的秋季学期

秋季学期，所有美国学校都采取了纯线上或是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模式。网课的教学质量与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都是目前最使人担忧的问题。美国疾控中心调查显示在六月，四分之一的介于 18 到 24 岁的年轻人都曾严肃地考虑过自杀。另一项在九月十号发布的由 [chegg.org](https://www.chegg.org) 非营利组织发布的关于美国高中生和大学生在疫情期间的心理健康状态调查报告发现，百分之五十四的学生都有有“轻微”、“非常”、“极其”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一半的学生认为自己非常焦虑，三分之一的学生认为自己正经历着抑郁。而新冠疫情里对心理咨询陡增的需求量则让这些学生更难以获得相应的帮助，而心理咨询医生也不得不思考如何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实施心理救助。

而新冠疫情期间，一些大学还在不断调高学费，与此同时学生则开始质疑这飙升的高学费是否合理与当下文凭的价值。美国高校的未来出来在哪里，有分析人士认为后疫情时代会有少部分高校因资金匮乏而倒闭，而网课又极大地削减了线下文凭的价值，于是大学教育可能会出现被排名靠前的大学垄断的趋势进而淘汰排名靠后的学校。在新自由主义逻辑下，大学提供的不再是教育，而是一纸文凭，而各种网课平台则使学生获得了能买一张哈佛文凭的机会。毕竟在求职中最重要的是这个学校的文凭，而文凭上并不会标记这是在线上还是线下获得的，因此在就业求职时线上和线下文凭的价值区别不大。毕竟早在 2014 年，86% 的美国大学就提供了在线课程，而 33% 的大学提供了完全线上完成的在线学位。但线上学生可能在建立人脉资源上会较为吃亏，毕竟积累社会资本是父母送孩子进好大学的重要目的。

还有另一种更激进的看法来自民主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比如 Bernie Sanders 和 Elizabeth Warren，他们认为拯救美国大学教育唯一的办法是让大学教育免费。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向学生收取大学学费是一种政治行为，而这出于背后是州政府和国家对高校不断减弱的财政支持。在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家的方案里，这部分资金应向华尔街征税获得。但无论如何，对已经困在家里学习了九个月的美国学生和那些困在自己国家的国际学生而言，现在都是一个重新思考美国教育价值的时刻。



2020年，疫情重压之下，我国研究生教育再度祭出了扩招的法宝，试图以此应对严峻的就业形势。不过在18.9万人扩招的大手笔下，研究生教育的弊端也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八九十年代的“天之骄子”们，如今正被抑郁和劳碌困扰着。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一则对全国人大建议的回复信，信中提到，人大建议“改革我国对博士生、硕士生毕业考核体制，给予导师决定博士生、硕士生能否毕业的自主权，释放研发能量”，教育部对此将充分采纳。【1】教育部的这个举措，被媒体解读为决心“强化导师负责制”，进一步将毕业的决定权移交到硕导、博导们手中。

坦承来讲，人大的建议、教育部的考虑，并非无理。一方面，多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一直存在着过“水”的问题。2019年，北大博士毕业生翟天临在直播中，询问网友知网（国内最权威的学术网站）是什么，引发了所谓的“学术门”。的确，拥有博士学位，却不知知网、论文是何物的翟天临，给中国教育打了一记结实的耳光。毋庸讳言，如今的青年学生中，确实有不少，是抱着混日子的心态，过完研究生两年、三年或更长时光的。这样一种教育的弊病，当然是要谋求革除的。

但问题正在于，人大、教育部给出的药方，即强化导师负责制，能否药到病除？答案且先存疑吧，不如让我们先来看看研究生导师制自身带来的结果。近年来，研究生不堪重负，迫而自杀的新闻，屡屡曝光。去年8月，浙大博士王某蕾在寝室内烧炭自杀身亡【2】；今年5月，中传硕士生黄静怡跳楼身亡【3】；就在前不久的9月19日，南京大学博士卓某也以跳楼的方式结束了生命【4】。



综合上述新闻报道，读者不难发现，无论研究生自杀者们的个人原因多么特殊，但舆论的矛头、亲朋的伸冤却总是指向他们的硕导、博导。在浙大王某蕾的案件里，博导戴某已是众矢之的，他曾亲手写下不再骚扰王某蕾的保证书，这是怎么洗也洗不掉的禽兽铁证【5】；根据黄妹的爆料，黄静怡的自杀，与学业无法完成、硕导不行方便多少有着联系【6】；至于9月自杀的南大卓姓同学，导师虽在表面上撇清了关系，但却解释不清卓同学为何要去参加所谓的“身心灵”课程【见4注】。

上述三位同学绝非个例，正如王某蕾案的相关问题下，一位匿名的知乎网友所爆料的那样，“同样985一流大学，同样是女博士，同样的遭遇。还没有到肢体接触的地步，我已经被逼迫地崩溃了。”在回答结尾，这位女博士甚至写下了“求学不为娼”的悲号。【见5注】

在部分导师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眼中，研究生自杀的唯一可解释原因，就是新一代年轻人的“心理脆弱”。他们自满于下述这样的解释，并从中获得一种“老成”的优越感：现在的年轻人，从小娇生惯养，一点儿波浪都经不起。我们当年吃过的苦，他们现在还能吃吗？这样的遁词无比荒谬，因为他们恰恰忽略了当代中国教育的最大现实：学术市场化。

学术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导师作为研究生连接外部资源的主要渠道，自然掌握着学生们的生杀大权。在市场逻辑的经年浸泡下，所谓资源互换、“平等”交易的观念已经深入导师们甚至是研究生的潜意识中——在导师看来，我为你提供学历、实习、工作，那么你理所应当回报予我若干对等的东西。可那些还未进入社会的黄毛小子、黄毛丫头们能提供些什么“对等”的资源呢？答案不言而喻，男生最可能提供的是钱财，女生最可能提供的便是身体——这也是为什么，研究生导师性侵频发的原因之一。

当然，尽管有着越来越多、也愈发触目惊心的导师性侵案曝光，我们还是不应将所有导师都捆绑在道德的火刑柱上烘烤。毕竟，敢于违反道德的衣冠禽兽还是极个别，也并非所有学生都是挨宰的绵羊。但是，隐藏在极端背后的，却也不是一派阳光和煦的春生景象，而是更加残酷的经济现实。

“产学研”一体融合，已是教育界最大的政治正确。在这种思路的指引下，学术变现，成为各行知识分子趋之若鹜的发财之道，尤以理工科为甚。举一例子，某博导教授想要拿科研基金、受企业资助，必得有所谓可应用的“学术成果”。而要有可应用的“学术成果”，必离不开大量实验、测算之类的基础科研工作。而科研类工作者培养成本高、劳动报酬高，又是大多数博导教授无法从劳动市场雇佣到的一类高端人才。那么钱不得不拿，实验不得不做，雇佣又雇佣不得，人从哪里来？只能从学生中来。由此，本是来求知、进步的学生，在学术市场化的洪流中，成为了替人打工的工具，赚着近乎没有的“工资”，却干着高端劳动力才能做的，极耗费精力的沉重科研工作。而本应教书育人的导师呢？不知不觉间，也成了资本家似的“老板”，他们贪婪地从研究生身上，榨取着剩余价值，美其名曰“帮助成长”，却不要脸地摘取着成长的果实。

研究生面临的“苦”是如此之重，已经不下于流水线工人。想想流水线上那些辛勤作业的工人吧，念及此种情形，还有谁能恬不知耻地说一句“心理脆弱”，就把问题搪塞过去呢？

论到此处，又会有人跳出来指责，“那像翟天临那样的研究生，不也大量存在？他们的‘懒惰’又如何解释？”

这同样是学术市场化的恶果。站在学生的角度看，上大学是为了更好就业。无论本科也好，硕博也好，文凭不过一张纸，若是对就业无作用，它还不如厕纸有用。本来，学习是为了取得知识进步，是为了投身社会建设、为劳动群众服务，可你若把学生都一股脑地投入到就业市场上去，把本该成为知识分子的青年变为雇佣劳动者，那么无怪乎学生如是想。拿翟天临举例，当他能在明星行业获得关注，那么请想，对他来说，知网、论文重要吗？因为这些陈年老朽才玩弄的东西，并不能使迷人的翟帅哥收割更多的女粉。换言之，社科、艺文学术，并非市场的需要，所以无论汪海林老师如何大声疾呼，翟天临们也不会对这种东西多留一心。

因此，回到开头的问题，想要解决研究生教育的弊端，呼唤什么强化导师责任，或是反其道而行，约束导师行为、强调可更换导师（实际上这是教育部强调的另外一個工作方向），终归都只是在人身上下功夫，无济于事。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更换导师，诚然是个进步有限的好事，可在市场化的环境约束下，哪位导师能对学生宽容些呢？即便宽容了，又能够宽容多少呢？这是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要真想解决问题，还是应着力去市场化。现在备受追捧的西南联大受人铭记的原因之一正是那个年代有抗战的烽火，有救国的理想，唯独没有金钱的铜臭。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更是为我们展示了高等教育的另一种可能性。所谓的“学术市场化”，只是部分人满足私欲的幌子，而绝非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必须。

教育改革，应在更深、更广、更切实的制度上打进楔子，去改变资本主义市场逻辑在教育界构造的规范。如果不反市场，不反金钱，不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只弄人、只玩人，那么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就永远只能是字面上的理想，纸面下的肮脏了——它的这种肮脏，是以无数王某蕾、黄静怡、卓同学，还有那位“求学不为娼”的女博士的青春生命为代价的。

日有星長

## 张春桥 1999 年 3 月 28 日家书

维维<sup>1</sup>：

你好！又到月底了。

你们来的时候，忘记告诉一件事：这个月，我把《论语》通读了一遍。

说来似乎好笑，我从小没有学过《论语》却是一个反对孔夫子的人。孔夫子是山东人。有人说山东最光荣，文武两圣都是山东人。但是孙子的名声却远远赶不上孔子。大城小城都有孔庙。那时没提创建精神文明的口号，也没有规定往路上丢纸头要罚款，但是，人们都知道要把字纸丢进写着“敬惜字纸”筐子里，以示对孔圣人的尊敬。整个统治阶级，从袁世凯到蒋介石，没有不尊孔的。我虽然没在学校里读过《论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之类的话却是知道的。但是，孔圣人说的“学”指的是什么？是天文、地理，还是  $x+y$ ，就从来没有想过。鲁迅说，那些提倡尊孔读经的人，很少有人真正读过经的。据说真正读过十三经的，只有章太炎一人。我是十三经一经也没读过，这倒不算什么错误，但是，却跟着别人说“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没有问过“为什么？”即便我没有把这类圣人遗训挂在嘴上，总不免是一个缺点。

我这次读的《论语》，是北京大学哲学系 72 级工农兵合写“批注”本。这大概是孔学问世以来，第一本工农兵的批注本。以前都是属于学者群体的人批注。于今工农兵来批了。我很佩服这些年轻的工农兵大学生。他们没有学究气，也不像一般的书生，他们是新中国培养出的工人、农民、战士，充满了革命的朝气，在这位被封为“至圣先师”面前，无所畏惧。更可贵的是，他们的批注是动了脑筋的，工作做得比较细。比如，对《学而》的“学”，《批注》说，主要是指学习西周奴隶时代的《礼》、《乐》、《诗》、《书》等典籍。——这样，就具体分析了孔子教的是什么是，学生学的是什么是，他的教育目的，就不是培养抽象的“人”，而是为奴隶主服务的人。“人”在那时不包括奴隶，奴隶不是人。同样“三人行，必有吾师”，这三人也只能是统治阶级，即奴隶主阶级的人。——诸如此类的批注，我认为是批得好的。他们把那些杂乱无章、枯燥无味的说教“批注”活了，活像一个孔老二在讲话，一个现代人替他当翻译。这些工农兵学员，吸引着我不觉疲惫地读完了《论语》。——不是孔老二“诲人不倦”，而是工农兵学员诲人不倦，真该谢谢他们。

读完《论语》，一方面感到实在是杂乱无章、枯燥无味，一千多年来统治阶级强迫人们学习，用周天子的一套桎梏人们的头脑，实在可悲。另一方面，又感到要批倒孔夫子也确实不易。孔是以“克己复礼”维护奴隶制为目标的，秦始皇是早死了，如果不死，封建制建立起来以后，说不定他也是要尊孔的。因为奴隶制、封建制都是私有制，都要处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内部各派之间的关系，孔老二比较集中地总结了夏商周以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即“周礼”，这对封建主也是“有用”的，甚至对于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主资产阶级也是有用的。这就是为什么刘邦还在用儒生的帽子撒尿，到了汉武帝就尊孔了，而且竭力加以改造，使它适合自己的需要，增加了许多“包装”，增加了欺骗性。以至我们每天都能听到孔夫子的声音。北京大学的这些学生的工作远远没有完成。用孔夫子的话来说，任重道远。我想，总会有人来继续努力吧。

读完这本批注，我就想继续读读赵继 bin 教授的《论语初[新]探》，也许有助于了解中国古代思想史，进一步了解中国思想通史，使自己的头脑对这些问题有一个正确的了解。

这几天天气总不好。我们还过得去，没有什么新变化。花浇足水以后，又复苏了，鱼也活得不错。（下次来时带一个针管来，不然，换水太勤太费事）。

你们出去踏青吗？从电视上，扫墓、踏青的真多。

小妹、海娃、毛弟、儿媳不另。

祝大家好。

爸爸

1999 年 3 月 28 日

<sup>1</sup> 维维为张春桥长女；小妹为张春桥次女；海娃为张春桥三女；毛弟为张春桥之子。





蒙以养正